

中國之春

CHINA SPRING

- 哭黨
- 方勵之教授在澳洲演講
- 一個「倒爺」和市委書記的對話
- 大陸高校改革之怪現狀

- 民主牆：十年後的反思
- 回憶李一哲：活着，清不要忘記



Dec. 1988 No. **67**

中國民聯

致中國和平促進會的一封信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理事會：

從『人民日報』上獲悉貴會成立的消息，我們感到非常高興。和平統一祖國是我們大家的共同願望，希望今後我們能為實現這一目標共同努力。

根據貴會章程第七條：「本會願與各地同類組織取得聯繫。台灣、香港、澳門和海外各界人士、相關的民間團體，凡贊成和平統一，願與本會聯繫者，可為本會聯繫人士、聯繫團體。」我們特致此信，希望成為貴會的聯繫團體，並滙上美金一百元作為贊助。

中國民聯主張自由、民主、多元、人權和法治，主張以對話代替對抗。我們相信，非如此不能完成和平統一祖國大業。遺憾的是，去年十二月，上海市公安局未經任何法律程序，單方面宣佈中國民聯為「反動組織」，並判處中國民聯成員楊巍兩年徒刑。這件事造成了很惡劣的影響。試問，如果中國政府連中國民聯這樣一個和平民主的組織尚且不能容忍，人們如何能相信他會容忍別的人和別的組織？全國政協副主席閻明復先生談到要加強往來、對話與合作，消除誤解、隔閡，增加瞭解與共識。很好。請從中國民聯始。

貴會成員，多半曾經深受政治迫害之苦，諒必對中國民聯目前所受之不公正待遇抱有同情，希望貴會能為消除這一錯誤，促成民族的真正和解而積極努力。否則，和平統一大業不成，而貴會同仁的清譽亦蒙污莫辨矣。

中國的政治，自是複雜微妙，但不悖良知，盡力而為，當是我們共同的行為準則。

盼復。

此致

敬禮！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總部

一九八八年十月十五日於紐約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成立

人民日報北京九月廿二日訊 以聯合海內外各屆人士，發展台灣海峽兩岸的民間往來，促進中國和平統一的實現為宗旨，由大陸各界人士組成的民間團體——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今天在京召開了成立大會。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經過多方推薦與協商，產生了由一百八十九位理事組成的理事會，為該會最高領導機構。他們中有各民主黨派的領導人、著名無黨派愛國人士，有少數民族和宗教界的代表人物，以及有關人民團體和部門的負責人，具有較廣泛的代表性。經各方面協商推舉，盧嘉錫、孫越崎、吳國楨、榮毅仁、侯鏡如、官鄉、錢偉長、程思遠擔任會長。

全國政協副主席閻明復出席成立大會，並講了話。他說，今年以來，海峽兩岸關係不斷趨向緩和，兩岸統一的前景較之以前清晰多了。但統一的道路上還有很多障礙和困難。台灣同胞同大陸長期分離，對大陸存有誤解、隔閡，需要加強往來、對話和合作，增加瞭解，增進共識。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可以全方位、多層次、多渠道地同台灣各界人士接觸，推動祖國的和平統一。

又訊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九月廿二日就國民黨中常會開除胡秋原黨籍一事發表聲明，表示十分遺憾，並致電正在西安探親訪問的胡秋原先生，對他被開除國民黨黨籍表示深切的同情和慰問。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章程

第一條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是由贊成中國和平統一的各界人士組成的民間團體。

第二條 本會的宗旨是：聯合海內外各界人士，發展台灣海峽兩岸的民間往來，促進中國和平統一的實現。

第三條 為實現上述宗旨，本會致力於：①廣泛聯繫大陸、台灣、香港、澳門和海外各界人士及相關的民間團體，共同探索統一的途徑，促進兩岸對話、談判，推動統一的進程。②努力促進海峽兩岸人民之間的探親、旅遊、經貿往來，科技、教育、學術、文化、藝術、體育等方面交流之發展。③創辦「統一論壇」雜誌，為各界人士呼籲統一，交流見解，討論問題之園地，藉以求得相互理解，增加共識。

第七條 本會願與各地同類組織取得聯繫。台灣、香港、澳門和海外各界人士、相關的民間團體，凡贊成和平統一，願與本會聯繫者，可為本會聯繫人士、聯繫團體。

第八條 本會經費接受海內外各界人士和團體贊助。

第十條 本會設於北京。



產權、人權、秩序

很多迹象表明，中共最近又要「收」了。「一收就死，一放就亂」。這出傳統的劇目自中共上台以來已演了將近四十年，至今久盛不衰。不過這一次也有人懷疑，中國目前這個局面，中共是否還「收」得住。

最近一段時間，人們紛紛從國內「逃」出來。每當被問及大陸的情況他們的回答異口同聲一個字：「亂」！

「亂」首先表現在權力失控。現在國內的局面是黨中央指揮不了國務院，國務院管不住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管不了企業，企業管不住職工。趙紫陽牢騷滿腹地說：大家都問我要權，我也沒有權，權都上哪裡去了？

「亂」其次表現在整個社會失去了行為規則。信用全面崩潰，合同成爲廢紙，錢能買通一切。貪污、受賄、濫權司空見慣。不久前，一個大陸的企業家到美國來說：「在美國做生意真幸福，人們可以在商品經濟的海洋裡游泳。可是在大陸，根本就沒有任何規則，你要游泳，只能現挖游泳池。」

人民不會容忍這樣的亂局長期地持續下去

，即使有些人（如倒爺、鄉鎮企業家）可以暫時乘亂發財，但是長期看，他們終會感覺到規則是必要的。道理很簡單，少數人投機取巧可以得益，當大多數人都不守規則時，就誰也得不了益了。社會需要秩序。可問題是，這一秩序建立在什麼基礎之上。

任何社會秩序都建立在人們權利界定的基礎之上。在人類社會中，存在着兩種最基本的權利界定形式：一類是嚴格界定產權（或財權）。在這社會中，所有的人作爲自然的人權是平等的，而他們權利的不同取決於產權的不同；另一類是嚴格界定人權，財產是公有的，每個人的產權是平等的，而他們權利的不同體現在人權不平等上。不同的基礎上會產生不同的行為規則。如前者，人們以人權平等的資格交換產權，以產權的轉移來確定人們權利的獲得，以產權的大小來決定權利的大小；在後者，人們產權是不分的或者是模糊的，於是社會中就只能劃分不同的等級，以人權的大小來決定人們之間的關係是領導和被領導，還是主宰和所屬關係。

中共在以往的改革中希望以放權讓利的辦法來調動人們的積極性。可是由於在產權沒有明確界定的情況下放權，反而把原有的建立在等級制度基礎上的秩序給打亂了。邯鄲學步，壽陵失步。新的秩序沒建立，舊的秩序又不靈了。所有的人都濫用自己手中的權利來瓜分那個沒有明確界定的「公有財產」。加之舊有的人權不平等，這種失序就顯得尤其可怕，大官大倫，小官小倫，老百姓學倫，所有的人都倫，不倫白不倫。

面對當前的亂局，中共領導人無非兩種辦法：一種是「收」，用行政辦法控制物價，清查「官倒」，整頓黨風，恢復那個產權平均而人權不平等的計劃秩序；另一種是「衝」，以爲闖過這個價格併軌的亂局，自然峰迴路轉，前面會出現「商品經濟新秩序」。否則拖下去是沒有出路的。

顯然，到了這個年代，「收」的辦法是否行得通已經很成問題了。中共中央政府早已把權放完，利讓光，想收也未必收得上來了。「衝」的辦法也並非那麼簡單，它最終會碰到一個產權界定的問題，即所有制問題。人們的財產界線不劃清，私有財產得不到保護，將沒有秩序可言。今天的「亂」，根子不在雙軌制，而在於產權界定不清的公有制。

也許在舊的秩序崩潰之後，隨着權力的分化和財產的分化，中國經濟的混亂局面還會持續相當一段時間。但人們總會認識到在一個新的基礎上，在人權平等的基礎上建立新規則的必要性。當這一天到來時，中國的民主和法治就有望了。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主辦的第一份中國海外民運刊物

中國之春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七號創刊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號六十七期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一號出版

P.O.Box 701400 Trainsmeadow Station
Flushing, NY 11370-9998
Tel: (718) 429-6777 (718) 507-4739

CHINA SPRING

"CHINA SPRING" (ISSN 0735-8237) is published monthly for \$24 per year by China Spring Research, Inc. 67-17 Woodside Ave., Woodside, NY 11377. Second-class postage paid at Flushing, New York. POSTMASTER: Send address change to China Spring, 67-17 Woodside Ave., Woodside, NY 11377

觀察家

3 產權、人權、秩序

路邊

讀·作·編

6 J-1 學生的出路

傑萬

專題

紀念民主牆十周年：

8 民主牆——十年後的反思

胡平

15 回憶李一哲

——並不孤獨的先驅者

楊益

19 祭

王靖

國內參考

26 令行不止 小官專政

79 被塗黑的飛機殘骸

28 北京的紅燈區

58 海南熱落潮

29 一個「倒爺」和市委書記的對話

30 並非小道消息

李遠
凌英
燕京客

毛石
晨颺

大陸專欄

31 目睹大陸高校改革之怪現狀

比爾

思想論壇

37 哭黨

41 奧運會與政治

44 中國人的雄風到哪裡去了？

——論大陸體育代表團在漢城奧運會的失敗

謝浩然

丁楚
蔡宏

民運人物

46 記方勵之在悉尼「中國問題演講會」上的講話

53 老方，看你的了！

27 方勵之被禁出境

63 北大校長丁石孫將被罷官？

(摘自報刊)

邱垂亮
蘇菲
畔之

編輯手記

民主論，如果她還有幸活著的話，今年該滿十周歲了。當年，為了捍衛她的生存權利，人們曾高呼：「站，站在民主論前；倒，倒在民主論下」。這個悲壯的聲言似乎隱藏著一種不祥的預兆。後來的事實不幸地證實了這個預兆，民主論陷落了，屬於她的勇士和她一齊倒下了。這段歷史，將給我們什麼啟示呢？

人們說，歷史的回聲需要用心靈來傾聽。歷史是「悟」出來的，它在每個人眼裡都是一幅不同的畫面。讓我們來聽聽一些曾經「站在民主論前」，但又有幸沒有「倒在民主論下」的人對於當代民主運動的回顧吧！從胡平的「十年後的反思」、楊益的「並不孤獨的先驅者」以及丁楚的「哭黨」，我們可以看出他們從不同角度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獨到之處。

本期的精彩之處還在歷史的回聲和當代的被風共生。兩個月前，方勵之放風曾經衝擊過澳洲大陸，本刊擁有從這場放風中心傳來的第一手材料，這是目前為止最詳盡的有關方勵之的講演記錄。

五月份的肯塔基風波至今尚未平息。今年的「十一」國慶節，兩個並立的大陸學生學者聯誼會又演出了一場對台戲。兩場活動形成鮮明的反差：一方劍拔弩張，一方輕鬆和諧，由此大家可以看出，是「誰在中國留學生中製造分裂」。而從這個小的縮影中，人們又怎能相信「一國兩制」的領天大謊？

自本刊轉載「河殤」之後，中國大陸的文化反思熱又傳到了美國。本刊收到很多圍繞「河殤」的討論，呼延民的「三思錄」是其中的代表。人們的反思不僅僅局限於民主論、傳統文化，同時也涉及到體育比賽。令中國人黯淡無光的奧運會結束了，在嘆息之餘，也有人憤然發問：「中國人的雄風到哪裡去了？」對於這個問題，蔡宏的文章給予發人深省的回答，誰會想到，體育運動竟然和政治有千絲萬縷的聯繫？

參考資料

民主·法治
自由·人權
多元·縱橫談

留學生欄

特稿

海峽兩岸

文藝爭鳴

封二
封三

中國之春第六十七期

本期總編輯

責任編輯
執行編輯
美術編輯

57 布哈林，我起誓
69 美國的特點：容納和容忍

曉志
鄧之友

59 中產階級和民主政治

王炳章

60 肯塔基：誰在留學生中製造分裂？

舒戈

62 平靜的反叛：中國留學生爭取自由

林芳

64 關於J-1居留的合法性

愛德華·C·Y·劉

獨立、半獨立，變相獨立和自治

丹增朱傑

67 冷眼對熱潮——兼論胡秋原大陸之行

劉安第

72 河殤(中)

蘇曉康
呼延民

78 「河殤」三思錄

77 「河殤」全國讚好，王震說不行

(摘自報刊)

52 身隨書後，可返故里

劉自立

80 略論中國傳統文化

達海

中國民聯給中國民主統一和平促進會的一封信
大陸作家白樺在加州演講

67
中國之春

胡平

丁楚

嘉風

嘉風



J-1 學生的出路

·傑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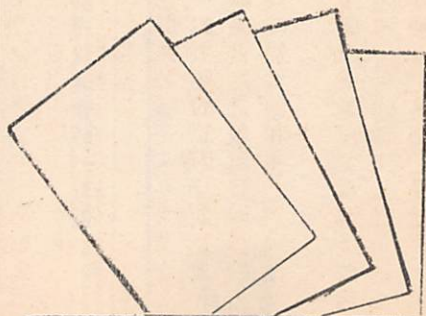
讀了貴刊第八期上的文章「計算機網絡上的自由論壇」後，我特地送了個計算機郵件（E-MAIL）給 SCC（SOCIAL CULTURE CHINA）的轉遞者，請他們把我加在轉遞名單上。隨後，就幾乎每天都收到一個或更多的「新聞包」。每個「新聞包」有十餘篇文章。這些文章的面很廣，不過，可能是篇幅所限，對我們最關心的國內改革情況，有深度有新意的文章不多。次一個最關心的問題，作為大陸出來的 J-1 學生，自然還是關於 J-1 學生的出路。

在八月十五日的新聞包中，有兩篇文章都提到了這個問題。我覺得這兩篇文章對很多 J

1 學生都有用，因此希望借貴刊一角介紹一下。

一篇文章題為「一條有關中國 J-1 學生的新聞報導」，源起於八月六日世界日報的一篇報導。這篇報導談到，有一些從未拿過中國政府的一分錢，僅僅是出國前被強制性地「借」了一張飛機票的 J-1 學生，如今被中國政府列在「政府資助」的名單上。而美國新聞總署（USIA）以這筆借款為依據，不准這些學生轉變身份。這些學生為情勢所迫，準備訴諸法庭。但是 SCC 文章的作者似乎覺得許多準備在美國工作幾年再作最後選擇的學生，目前還不願意在法庭辯論中傷害中國政府的感情，他們希望首先向國會請願，爭取國會議員出面，促使新聞總署改變作法。著名律師 RUBIN 正在指導這些學生採取合適的行動。

作者指出許多希望在美國多留幾年的學生，往往學術上已小有成就，經常在刊物上發表文章。而拿到博士學位後的最初十年，對他們



讀者·作者·編者

從訓練階段脫穎而出為一個獨立的科學家，是關鍵性的時期。如果能生活在一個富有學術營養的環境中，則這幾年的磨煉，可能鋪平他們一生富有成就的道路。如果強迫他們回國，對他們自己當然是個損失。但中國政府又能獲得什麼？他們在美國的收入足夠付還一張飛機票，但是中國政府能夠為他們支付必要的科研經費嗎？如果暫時不能，那麼現在要他們回國，只是浪費他們辛辛苦苦獲得的知識和技能而已。

作者提出一個有趣的觀點，這些博士生當然都是中國最優秀的頭腦，是中國最好的「資產」。但是聰明人決不讓「資產」爛在那裡，如果他本人無法利用這些「資產」的話，相反，聰明人把「資產」借給別人，等以後回收豐厚的利潤。這些博士生在國內暫時英雄無用武之地，何不讓他們在美國多工作幾年，讓他們技能不斷增值，累積為中國今後追趕世界先進水平的巨額資產。只要想一想文革後海外學

者對中國高等教育的重建給了多麼重大的幫助，就可以明白那些博士生對於中國現代化的獨特作用。

另一篇文章也出現在八月十五日，題目為「一組J-1學生尋求公正」。文章指出，儘管全美各國移民律師多次向美國新聞總署抗議，指出按美國慣例機票貸款不是政府資助，但是新聞總署至今尚未改變立場。因此移民律師建議J-1學生爭取國會的支持和同情。一批J-1學生聘請了美國移民律師協會副主席RUBIN 協調各地的信件運動（LETTER CAMPAIN），向議員申訴，在美國是一種維護本身權益的有效手段。信件將由J-1學生直接寄給本州的參眾議員，他們有關心本選區事務的義務。文章建議僅僅借過一張飛機票的J-1學生盡快和RUBIN聯繫，並給出了RUBIN的地址和電話。

ATTORNEY EDWIN RUBIN
STEEL RUBIN AND RUDNICK
744 BOARD ST. SUITE 1300
NEWARK NJ 07102
TELE: (201)623-4444

兩篇文章的作者都給出了姓名和電話。從文章看，他們都是熱心人，想來會願意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關心J-1的讀者不妨向他們瞭解有關律師的詳細情況。

他們是：TANG SAN YEE 交州大學聚地
亞哥分校
電話：(619)534-3521
INTERNET: TANG@SSURF.
UCSD.EDU

SHENG ZHIYONG 俄亥俄州大
電話：(614)267-0494
INTERNET: SHEN-ZOENG.
OHIO-STATE.EDU

教委又出怪招

·王琳·

繼教委收緊留學政策，壓縮赴美名額之後，新近又出怪招：要求赴美進修生只能聯繫去學制兩年的社區學院或職業學校，以免他們來美後轉學學位，滯留不歸。對外派遣留學人員，原本目的是提高知識水平。可現在派一些早已是在國內本科畢業的大學生到美國來上低檔的社區學院、職業學校，非但不能達到進修目的，而且是對國內大學教育水平的一種貶低、自賤，令人啼笑皆非。

筆者以為，出這個怪招無非是既要裝璜「繼續對外派遣留學生」的門面，又要對留學人員進行極不合理的限制。這種不倫不類的辦法，實在是反映了以李鵬為首的教委政策水平之低！

卡留學生太蠢

世寧

留學政策和人才外流是政協委員們討論的熱題。中國科學院數學所所長楊樂提出，留學政策不夠穩定，不利於吸引留學生回國。目前留學生的顧慮是怕一旦回國，將來再也沒有出去的機會了。對這部分人應制定合理的政策，允許來去自由。成都電訊工程學院院長劉盛綱說：「我有一個學生在國外是實驗室主任，為什麼一定要把他弄回來。在美國一城市，台灣學生買下一塊地叫『小台北』，我們也可

以買一塊地叫『小北京』，何必定要他們回來吧！」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研究員鄭承魯說，「我對我國科技前景有點悲觀，主要是人才留不住，即使人留住了，心也留不住。幾千年前，大禹治水還懂得不用堵而用疏導的辦法。用卡的辦法是卡不住的。上海規定出國留學不回來，要罰一到五萬元，說是收培養費。這只能產生離心力。」北京大學校長丁石孫說，不要怪他們不回來，關鍵是能否尊重他們。我堅決反對對出國人員出國時卡他們，出去後又千方百計地讓他們回來，這是本末倒置，在這方面我們不要再做蠢事了。不重視教育，不重視知識分子待遇的人將是歷史的千古罪人！（據「世界經濟導報」等）

鼓勵署真名

陸丙甫

赴美留學之後，看了許多期「中國之春」，感到你們對中國大陸經濟改革和政治民主化的許多討論是富有啓發的，有積極意義的，在此對貴刊存在的合法權利表示支持！

我有一個願望是希望看到更多的好文章能用真名發表（這是我的猜測，許多作者署名令人一看就覺得像筆名）。不用真名會有種種原因，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可能是有政治上的顧慮。這種顧慮當然是很可以理解同情的，但終究是應該同時從客觀和主觀兩方面加以消除克服的。

用真名講真話是民主精神的體現。民主除了一種權利、目的和工具外，她還是一種環境。我們每個人既是她的受益者，又是她的一部分；她又是一種習慣，需要我們自己去培養和適應。中華民族民主精神的發揚，需要我們每個人從自己做起。

民主牆·十年後的反思

胡平



當年民主牆前搶購民刊的情景。

一、創造歷史：思想與機會

每當我回想起民主牆的那段歷史，我總是感到深深的遺恨。

我們失去了一個多麼珍貴的機會。這個機會是一次性的，它一去不復返。當然，在一個動盪不安的世界，新機會是會不斷出現的。但是，一個人不能兩次跨進同一條河流。下一次機會將不同於上一次機會。因此，就每一次機會而言，它都是不可重復的。一旦你沒有抓住這一次機會，你就永遠地失去了它。

人們並不是每時每刻都有可能去創造歷史（就「創造」這個詞的嚴格意義而言），尤其是一個生活在極權社會之中的普通人。面臨着巨大的強權，思想常常是軟弱無力的。然而，存在着這樣一些時機，在此時，思想可以發揮偉大的力量。它好比分水嶺上的一塊石頭，可以決定河流是注入太平洋還是注入大西洋。可是，當着這條河流已經沿着山嶺的一邊奔流而下時，一萬塊石頭加在一起也無力把它再趕回到山嶺的那一邊。這就是思想的偉大之處和渺小之處。這就是機會的價值之所在。

二、自主性公共交往空間

一九七八—七九年正是這樣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在一年左右的時間裡，一小批有膽識的年輕人，借助於自辦刊物的形式，開闢出一塊真正的自主性的公共交往空間。它是對極權主義的社會結構的一種具有實質意義的突破，構成了對極權統治的最深刻的挑戰。

「自主性的公共交往空間」，是已故西方著名政治哲學家漢娜·阿倫特提出的一個概念。這個概念也許比其它概念能更準確地揭示出政治自由的含義。我們不妨對這個概念略加解釋一番。

以選舉為例，現代社會一般都承認了選舉、承認了無記名投票這一形式。從理論上說，既然是無記名投票，每一個投票者就可以把票投給他所支持、贊同的人，因而投票的結果應該說是反映了民意的（把作弊情況排除在外）。這樣看來我們似乎應當說，哪裡有無記名投票的選舉，哪裡就有民主。但實際情況顯然不是這樣，中共九大和四屆人大不是也搞過無記名投票選舉嗎？但誰能說這兩個會議是真正民

主的呢？

中共十三大和七屆人大都實行了差額選舉，不少人斷言這是民主化的重要一步。是不是這樣的呢？

首先，我們要指出「等額選舉」的荒謬性。「選舉」而又「等額」，這在字面上就是自相矛盾的。沒有多餘，何來選擇？一個侍者把只寫有唯一的一種菜的菜單遞給顧客，對他說：「請盡量挑選吧。」在這裡，如果我們硬要說那位可憐的顧客仍是可以有所選擇的話，他只能在「吃和不吃」之間作選擇，因為他在「吃什麼」這一點上根本是無從選擇的。

當然，等額選舉也並不像上面所說的那麼荒謬。在實行等額選舉時，選民們一般總會被告知：除了正式候選人之外，每個選民也可以填上自己喜歡的其他人。這看來該是比較民主了吧。然而，如果選民們在投票前不能就候選人問題展開較為充分的自由討論，彼此交換意見，那麼，正式名單以外的人是極難有機會被選上的。因為他們很難得到大家的瞭解，故而不能為多數人所共同支持。張三選李四，李四選王五，王五選趙六，結果，他們因為票數分散而不能當選。由於一般人都很容易估計得到這種結局，所以他們通常並不在選票上填寫其他人的名字，除非某人是早已廣為人知，以致選民們相信會有很多人不同地給他投一票（如去年北大學生選出李淑嫻）。否則，他們寧肯採取敷衍的態度應付選舉——其結果便是，正式名單上的人選往往能獲得勝利。

我們知道，古希臘的斯巴達是一個專制社會。但我們還要知道，斯巴達一向是實行選舉的（這和秦帝國大不相同）。在那裡，享有最高權力的長老會，除開兩個世襲的王以外，其餘二十八個成員均由公民大會選舉產生。為什

麼斯巴達的選舉制不能使它成為民主呢？原因在於：在每一次選舉中，候選人的名單均由原來的長老會單方面提出，公民大會只有表決權而已（這和目前中共的選舉很相像）。在斯巴達，沒有自由討論，沒有派別林立的俱樂部（政黨的雛型），因此在公民大會上，選民們只是表決機器而已。像斯巴達這樣，名義上允許人民享有公共權力，但由於沒有給他們提供一個比選舉箱更大的活動空間，沒有提供機會讓人們能夠聽到和交換各種不同的聲音，所以窒息了這種公共權力。這個所謂「比選舉箱更大的活動空間」就是「自主性公共交往空間」。

顯而易見，要使選舉真正具有民主的意義，人們必須要擁有「比選舉箱更大的活動空間」。具體說來就是：

(1) 候選人不能由官方單方面提出，「下面」也應有權提出自己認為合適的人選。

(2) 必須有相對充分的自由討論，允許不同的候選人自由競爭。

簡言之，只有採用自由競選的方式，選舉才能名符其實。

有人認為，在去年的全國各地基層選舉中，共產黨員的當選率很高。因此那表明，中國共產黨還是很得人心的。如果現在就允許其人、其它組織與共產黨競爭，共產黨仍有把握獲勝。這種觀點無疑是很膚淺的。因為它把不具備「比投票箱更大的活動空間」的選舉和真正的民主選舉混為一談。基於同理，許多人稱十三大和七屆人大大的「差額選舉」是「民主化的重要一步」也是完全錯誤的。事實上，中國大陸四十年來的選舉從來不具有民主的性質。唯一的例外是一九八〇年在少數大學和工廠搞過的自由競選。其中以北京大學的競選為最典型

。因為在北大，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毛遂自薦，更重要的是，我們有足足一個月的時間，能夠自主地運用大字報、油印材料、答辯會、講演會、民意測驗等公共交往手段展開較為自由的討論。正是這一點，賦予了那次選舉活動的真正民主的含義。

三、形式重於內容

極權社會的社會結構的基本特點是：它完全取消了自主性公共交往空間。任何專制社會都在壓縮自主性公共交往空間，但唯有極權社會才把這種壓縮發展到了極限。遠的不說，明清兩代都搞「文字獄」。然而在那時，官方並沒有控制一切出版渠道。禁書毀版的事時有發生，那當然表明政府的言論控制；可是，禁書毀版的前提是有書有版，也就是說，民間人士可以自行印書製版。這本身畢竟表明了某種自主性公共交往空間的存在。共產黨却是把一切公開發表言論的渠道統統控制在自己手裡，它可以預先防止任何它不喜歡的、變成鉛字、變成書籍。如果我們把傳統的控制言論的辦法比喻作殺人或屠嬰，那麼共產黨的辦法則無異於避孕。

當大陸的人民日報發表了劉賓雁的「人妖之間」時，台灣正在對高雄事件進行公開審判。兩相對比，有不少人以爲大陸比台灣更有希望。在一九八〇年九月份愛荷華舉行的一次有海內外二十位作家參加的討論會上，有人就提出：「你能設想把劉賓雁批評共產黨的話改爲國民黨，說『國民黨什麼都管，就是不管他們自己；國民黨什麼都怕得罪，就是不怕得罪人民。』這樣的話可以在台灣出現嗎？」大概這二十位作家誰也料想不到在八年之後，海峽兩

岸的民主進展竟然會呈現出如此巨大的差異。但是如果我們能運用「自主性公共交往空間」這個概念來看待問題，後來的一切變化就絲毫不意外。因為即使在當時（一九八〇年九月），台灣仍然存在著某種自主性的公共交往空間。高雄事件之後的台灣仍然存在著獨立的非官方的出版物，而大陸的自發刊物——它們在民主牆時代就不曾獲得合法存在的機會——此時已被摧毀。如果我們用一般人慣用的「言論尺度」一詞來描述當時海峽兩岸的狀況，我們似乎應該說，在當時，大陸的言論尺度較寬，而台灣的較嚴；但是，如果我們着眼於比較二者的社會結構，我們不能不承認，台灣的社會結構多少還存在着自主性的公共活動空間，而大陸却沒有這種空間。從演化的角度出發，社會結構要遠比政府的一時的政治風向重要得多。中世紀貧窮的歐洲之所以能在後來大大超過原本比它富裕的中國，原因就在於前者的社會結構中含有刺激發展的自主性因素。小鳥可以在一時比風箏飛得還低，但小鳥終究會比風箏飛得更高。因為前者有着自主性。

在美國康奈爾大學出版的大陸詩人北島的詩集的序言中，編譯者杜博妮女士寫道：「一九七九年三月至一九八〇年底這一期間，官方的文藝政策出現了奇怪的分歧。非官方的文學運動受到了各種名目的限制，最後遭到毫無保留的查禁。但與此同時，官方的文學界却越來越開放，出現了五十年代的作家復出、呼籲黨減少對文學的干涉等現象。」杜博妮認為這兩者是「矛盾」的。這表明她對民主與極權的區別缺乏洞見。出於本能，共產黨領導人比許多自由派知識分子更能體認到自己的「阿基里斯之踵」究竟在什麼地方。當時，政府向民刊人士施加壓力，逼迫我們停刊，他們所持的主要理由倒並不是指責民刊的文字內容，因為民刊

的文字內容一般並不比同時期的某些官方刊物更激進；他們所反對的乃是民刊這種自主地表達意見的方式。換言之，他們極欲摧毀的乃是這種自主性的公共交往空間。在關係到究竟什麼才是極權統治的要害，統治者們照例是清醒的、老練的，而被統治者，包括海內外許許多多熱愛民主的知識分子，遺憾得很，絕大部分却是既不夠清醒又不夠老練的。

無獨有偶。去年，近兩千名留美學生發表公開信，對中共領導反自由化運動提出異議。公開信寫得很溫和，以致於中共當局決無可能把它打成「反動」。但是事後中共領導所據以指責公開信的主要理由仍是說「發表公開信這種方式不好」。這再一次提醒人們：方式（或形式）可以具有比內容更重大的意義。當然，公開信所以能做到公開，全賴於在海外存在着自主的報刊，包括「華僑日報」這種被一些人認為「親中共」的報紙也具有國內最開放的報紙（諸如「世界經濟導報」）所不具有的一定的自主性。請大家想一想，假如國內有一份自主的報刊，它必然會樂於刊載留學生的公開信，而中共很難據此將其下令封閉，那又會造成何等的震撼？如果有這樣一份獨立的報刊，它會刊登出來自全國各地的上百萬、上千萬、乃至上億人的公開異議，這幾乎注定會造成中共上層的巨大危機。反過來，正因為沒有這樣一種獨立的言論陣地，政府就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地一手遮天。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有一批頭腦很開明的人當上了官方刊物的總編輯也無濟於事。兩相對比，你才能體認到自主性的小鳥和他主性的風箏終究是兩碼事，極權主義社會和一般的專制社會終究還是大有區別。

四、民主牆的偉大意義

民主牆的偉大意義在於，它是一次試圖在極權社會中開闢出一片自主性公共交往空間的英勇努力。在如何從根本上改變極權社會本質這個問題上，民主牆的價值遠遠超過了官方刊物的價值。創造出一塊真正獨立自主的言論陣地，要比在官方刊物上發表一百篇批判現實的文章重要得多。如今，略有見識的人士莫不承認，在中國近十年的經濟生活中，最有意義的一點，並不是我們的經濟增長速度有了多大的提高，也不是我們又建成了多少大工廠、大油田，而是我們開始有了（準確地說，是重新有了，因為四九年以前曾經有過）一些獨立於政府直接控制之外的、具有自主性的經濟活動實體。正是後一種因素的產生和發展，才有可能把中國的經濟發展引入一個截然不同的方向。在政治問題上，我們為什麼還不能抱有類似的見識呢？

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逐漸意識到這一點了。今年八月，劉賓雁在愛荷華州的講演中，對於當初他們未能全力支持民主牆一事深表後悔。誠摯的劉賓雁不止一次說過，他並不是先知先覺。他說他對很多重大問題的認識都是很遲的。民主牆問題大概就應算作一例。我們都還記得，劉賓雁曾經支持過當時十三所大專院校學生合辦的「這一代」，那也應歸屬於民間刊物一類的。

事實上，在知名的知識分子和黨內一些擔任高級職務的開明人士之中，對民主牆運動表示同情、關切者不乏其人。白樺在公開場合下為民主牆叫好。黃永玉、嚴家其等曾把自己的文章交民刊發表。團中央研究室的謝昌達等人奉命對北京幾家著名的民間刊物作過細致的調查並寫成一份相當不錯的內部報告。中國青年報曾為民刊「沃土」的一次座談會提供會場，文藝報對這次座談會作了報導。中國青年雜誌

專門邀請了幾家民刊人士，包括已被停刊的「探索」雜誌的繼任主編路林，舉行座談會。于光遠也邀請過包括好幾位民刊人士在內的一批活躍的年輕人開圓桌會議。在一九七九年的夏天，黨內一批自由派人士一度致力於使民刊存在合法化的偉大工作，可惜未能成功。後來中央下令取締民間刊物時，對這些同情支持民刊的頭面人物嚴加責備，其中一些人的仕途顯然因此而大受影響。

但是，總的來說，來自著名的知識分子以及黨內較高層次的開明人士對民刊的支持還是不多的，已有的支持也還不夠堅強有力。應該說，在當時，能夠對民間刊物的存在的深刻意義有充分領悟者十分稀少。一般人都沒有意識到，這些印製粗陋的自發刊物，代表了未來中國新聞出版自由民主化的方向。傑弗遜有句名言：寧可無政府，不可無報紙。這裡所說的報紙，當然是民間的報紙而非政府的喉舌。這就是說，我們可以沒有人民日報，沒有人民文學，但我們不能沒有「北京之春」，不能沒有「今天」。許多人一直在努力把人民日報一類官方刊物辦得更好，更能代表人民的聲音。這種努力當然值得嘉許。但是重要的問題不在於如何把黨報黨刊辦得更好，而在於為民報民刊催生和給予保障。劉賓雁等人當年的失誤就在於他們未能全力支持和保護民刊，未能直接「下海」投入，和我們一同去開闢出一塊自主性的公共交往空間。

五、堅持獨立自主的公民立場

是的，真正有力的支持，就是要自己直接「下海」投入。波蘭團結工會顧問、理論家、戰略家兼活動家米奇尼克說得好：「我們不再

試圖在官方那裡尋找一席之地。」我們「建立了自己的制度，創造適合自己的環境，你不再把材料交給官員中的自由派，你自己去印刷、去發行。當你路見不平，你不再向官方申冤，你自己就聯合起受害者，幫助他們。」

然而，一個人要走到這一步並不容易。缺乏勇氣也許還不是最重要的障礙，更多的恐怕是缺乏見識。

有些人解釋說，當年他們之所以沒有全力支持民主牆，是因為那時他們對鄧小平為首的改革派還抱有很大的希望，以為改革會越搞越好。這種想法無疑是真實的，但認真分析起來却是不相干的。這裡反映出對自由民主的理解有偏差。

不錯，蘇聯的持不同政見者活動也是在六五年以後才興起的，因為在那時，他們認為改革已經停頓，他們不再對當局抱有幻想。米奇尼克既然已經在思想認識上和整個共產制度一刀兩斷，他不再去官方那裡尋求一席之地似乎也是當然之事。但是這中間隱含着一個荒謬的邏輯：一個人，如果他還對當局領導的改革抱有希望，他就應該在官方給予的陣地上去推展他的抱負，而不必去另行開闢出一條獨立的自主的道路。

這是專制主義的邏輯，它強迫公民放棄其獨立的立場而變成附屬於統治者的忠誠臣僕。一個人支持一個政權可以有兩種完全不同的方式。一種是從獨立自主的公民的立場去支持，另一種是把自己視為政府的附庸，把自己捆綁在當權者的戰車上為之效力。民刊人士採取了第一種方式，而那些只知道在官方陣地上幫助改革的人實際上是採取了第二種方式。

大家知道，「北京之春」的政治觀點在最初和「探索」一類是不一樣的。「北京之春」

在起初表現出明顯的堅決支持鄧小平改革派的傾向。但是，像陳若曦那樣，批評他們「把改革的希望都寄托在鄧青天身上」，却是錯誤的。他們對鄧小平的支持，不同於「文革」中紅衛兵對毛澤東的支持，把鄧小平視為自己追隨的統帥，把自己視為鄧小平的尖刀班。他們的支持方式倒更接近於美國那些贊同雷根政府的知識分子對雷根的支持。也就是說，他們始終堅持了自己作為公民的獨立自主性。專制統治者要求人們支持自己，但必需是以它規定的方式表示支持，而它所允許的唯一方式便是由它一手控制的官方出版物。它決不容許人們以自己的方式去表示支持，因為它更忌恨的是這種自主的表達政見的方式本身。最後，迫於壓力，「北京之春」停了刊。可是，「北京之春」的停刊和那些以思想解放著稱的知名知識分子的「封筆」仍有不同，後一類人的「封筆」是因為黨不再允許黨報黨刊發表他們的作品，而他們並不會在官方刊物之外建立自己的言論陣地。換言之，後一類人始終沒有在官方規定的方式之外從事自己的活動，而「北京之春」却一開始就走的是另一條路。

這是一個並不深奧的原則，奇怪的是為什麼有那麼多的人不理解它。

我是一個公民。假定我在相當程度上認同現在的政府，甚至我認為這個政府是一切可能的政府中最好的政府（像萊布尼茲的「一切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因此我決定支持它。但是作為一個公民，我必須是從一種獨立立場去支持它，我不是出賣自己。這意味着，我永遠保留批評它、反對它的不可剝奪的權利。這意味着，我必須有自己的、不依賴於政府的立足點。最起碼地，我必須有一個自主性的言論陣地。也許，我不拒絕、甚至我更樂意

於入朝爲官，把自己的文章交給政府的報刊發表，乃至於去當黨報黨刊的負責人；但與此同時，我必須要有一個真正屬於自己、而不屬於黨和政府的活動空間。如果我放棄爭取這種空間，我無異於賣身爲奴，無異於去充當政府的螺絲釘，即便是一顆很大的螺絲釘。

六、關於民主牆

下面，我們再來談一談民主牆。

當我說，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年間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時，這意味着什麼呢？爲什麼說那時存在着在極權社會中開闢一種自主性公共交往空間的可能性呢？既然我們的努力並沒有獲得預期的成功，我們並沒有建立起這樣一種空間，那麼，又是哪些因素導致了它的失敗呢？

六—A 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年間中國社會的三個特點

在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年間，中國社會具有以下三個重要特點：

(1) 老教皇已死，新教皇尚未確立。

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單一意識形態統治的社會，是一個共產黨一統天下的社會。但是我們要知道，僅憑上述兩點，尚不足保證這個社會必然是極權專制的。

道理很簡單。固然，獨尊一種意識形態，規定唯一的執政黨，勢必排斥了其它意識形態和其它政黨執政的可能性。然而，由於對同一種意識形態可能作出不同的理解或詮釋，而同一個黨內總是存在着不同的傾向和派別；因此，它仍然有可能爲自由—民主留下某種存在的餘地。這就是爲什麼有不少人相信在一四個堅

持」之下仍可建成民主的原因。從純邏輯的角度講，那並不是不可能的。我們完全可以想象這樣一種社會，其中，同屬一黨的多派競爭，起到了其它社會中多黨競爭的功能；對同一種意識形態的多元性解釋，發揮了其它社會中意識形態多元性的作用。這樣一種社會的自由民主當然都會較之於其它社會爲少，但畢竟可以有限地存在。

社會主義社會成爲極權專制的更深入的機制是：它不僅只允許信奉一個單一的意識形態，而且它只允許信奉對這個意識形態的一種單一的解釋；它不僅只准有一個唯一的執政黨，而且這個黨內只准有一個唯一的派。結果便是，由黨內的一個或三五個最高領袖，被認爲掌握着對意識形態的唯一正確的解釋；從而以整個黨的名義，以那個意識形態的原則的名義，對全社會實行徹底的控制，這就造成了空前嚴酷的極權專制。列寧爲這種機制提供了理論基礎，斯大林完成了這種機制的組織架構（當然，藍圖是馬克思畫出的，儘管他畫的很粗糙，似乎有漏洞可鑽）。

不難看出，在這樣一種極權社會中，一個被認爲是真理的最後裁決者的最高領袖的存在是必不可少的。我們不妨把他比作教皇。這就是社會主義社會中總是重復出現個人崇拜的基本原因。即便在所謂集體領導期間，常常也是有一位享有比其他人更高的權威。我們可以把「集體領導」（有人又稱之爲「政治局專政」，它通常不會超過三五人）比作教廷。總之，一個最高權威，一個不允許懷疑挑戰的絕對權力是必不可少的。沒有了教皇，各派力量就很可能避免權力鬭爭公開化，而權力鬭爭公開化的結果，要麼是一方吃掉一方，從而再次確立一個教皇，要麼是各方和平共存和平競爭，那便

可能導致某種程度的民主。不過迄今爲止，在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中還沒有出現後一種結果的。

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年間，中國的老教皇毛澤東已死。按名分，華國鋒應是新教皇，但他面臨着一個強大的對手鄧小平。前者有權杖而缺實力，後者有實力而缺權杖。由於路線與派系分歧及「批鄧」以來的恩恩怨怨，兩者明爭暗鬭不止。一時間中國還沒有真正的新教皇。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鄧派明顯佔據上風。但這並不意味着鄧小平作爲新教皇的地位已經奠定。第一，作爲被毛澤東兩次打倒的人物，鄧小平必須進一步批判極左路線；第二，由於華國鋒依然在名義上是最高領袖，因而鄧小平的權力還沒有達到最高峰；第三，鄧本人確有進行改革的強烈願望。這三點加在一起，決定了此時的鄧小平還需要爭取人心，起碼是不能對廣大民衆的要求採取明顯對立的立場。這就給民間力量的出現和發展提供了一個有限的空間。這種形勢給思想言論的活躍提供了寶貴的機會。首先，是各種先前被打成修正主義的思想有了較充分的表達機會，這就是說，各種打着馬克思主義旗號的思想此時基本上可以發表而不招懲罰。其次，某些非馬克思主義的東西也有了片刻的表現機會。但是，在這一時期，直接地、公開地反對馬克思主義、反對共產黨專政的言論仍然是面臨巨大危險的。教皇雖然暫缺，教廷依然存在，華、鄧兩派在公開的、直接的反黨反馬克思主義的言論面前會採取大體一致的態度。這就是爲什麼魏京生等人的言論要立即遭受鎮壓的原因。

(2) 官方刊物信譽掃地。

經過「文革」的風暴，官方刊物在數量上大爲減少，精神飢渴成了全國上下的普遍病症

。翻雲覆雨的政治變化，使官方刊物在人民心目中信譽掃地。人們已經養成了對小道消息、對大字報文章熱切關注的習慣心理。這就造成了民間刊物一旦出現後，便受到廣大人民積極關切的強烈效果，從而使得有意壓制民刊的當權者，出於怕犯眾怒的顧慮，一時間下不得手。

(3)「文化革命」留下了一個「四大」的傳統。

按照楊小凱關於「文革」三階段的理論，在「文革」第二階段（一九六六年九月—一九六八年六月），人民用「四大」的方式反政治迫害。在這段時期，毛澤東打「人權」牌打倒對手，而廣大民眾真心相信毛澤東，故而，大字報這種自主自發的表達政見的方式與極權統治控制一切言論渠道二者之間的內在衝突隱而不顯。那以後，毛澤東重新壓制人民，人民則繼續用「四大」表示反抗。七四年廣州李一哲事件、七六年北京天安門事件，人民都採用了大字報及油印文章的方式。有了這個傳統，民主牆和民間刊物的出現就是很自然的了。

根據以上三個特點，在一九七八—七九年間，我們有着現成的大字報、油印文章的形式，我們有着全國廣大民眾的熱切關注，我們有着四九年以來最為寬闊的言論範圍。這就使我們具有了開創一種自主性公共交往空間的最好時機。

既然叫時機，它就不是長留永駐的。隨着時間的推移，上述三個特點都會變化。新教皇不久將確立，雖然他可能比老教皇開明一些，權威的絕對性也小一些；官方刊物會越辦越好，從而奪走大部分讀者，使民刊不再是輿論關注的焦點。於是，官方就可能在不引起一般公眾的強烈反對、甚至不引起一般公眾的注意的

情況下，禁止民刊這種迄今為止唯一的獨立表達意見的方式。

不幸的是，以後的事態發展正是如此。

六—B 民主牆失敗的原因

民主牆失敗了。責任是多方面的。

(1)首先，我當然要批評以鄧小平為首的所謂改革派。取締民主牆無疑是他們犯的一個最嚴重的錯誤（去年的反自由化屬於同一性質）。戊戌維新不遭鎮壓，清朝的改革就可能成功；戊戌維新既遭鎮壓，清朝的改革就注定不能成功。至少是到目前為止，戈爾巴喬夫就沒幹這種傻事。事到如今，中國社會已是危機重重，面臨着崩潰解體的巨大威脅。這對於中國人民是災難，對共產黨人自己何嘗又不是災難。中國共產黨已經失去了自我改造（變為社會民主黨）的最好的一次機會。中國不改革是不行的，也是辦不到的。然而，當年榮祿稟告老佛爺的話「改革能救中國，救不了大清」，是不是一已經適用於共產黨了呢？當然，如果中共領導人並不關心民族，並不關心明天，他們一心一意追求的不過是昔日毛澤東的那個無限權力，如果他們抱定了「我死後哪怕洪水滔天」的心理，那麼他們所做的一切就都是對的。我不想對他們多加批評，因為這種批評太容易了。

(2)其次，我要批評那些具有自由民主傾向、但當時未能有力支持我們的人。本着春秋責備賢者之議，我不能不為他們當年的失誤深感遺憾。有人說，民主牆不值得重視，因為參與者沒什麼名人。這剛好把話說反了，我們不能責怪民主牆的參與者不是名人，我們要責怪的

倒是那些個名人為什麼不去參與民主牆。請大家想一想：如果這衆多的有名氣、有地位而又熱愛自由民主的人們，當時都能出現在民主牆下，如果他們的用心之作都發表在民間刊物上，民主牆的地位又將是如何？民間刊物的命運又將是如何？既然一小批當時籍籍無名的熱血青年尚且能在那特定的歷史時機中，把民間刊物這個自主的陣地創造出來並維持了長達一年以上，那麼我們就該相信，憑借着一大批著名的自由派知識分子的投入，這塊獨立自主的陣地就完全可以鞏固下來，最終演變為民主運動的可靠基地。這裡並沒有一般人承受不了的危險，而危險又總是和影響、聲勢、規模成反比的。他們缺乏的主要不是勇氣，而是見識。

不錯，借助於官方給予的位置，借助於現成的官方言論陣地，你可以輕而易舉地贏得更廣大的名聲，你可以使自己的思想更迅速更廣泛地傳播開去。但是，倘若中國的知識分子要真正獲得獨立，倘若中國要真正實現自由民主，我們就一定要放棄這種「搭便車」的思想，寧肯用自己的腳一步一步地走路。獨立自主是要付代價的，它的代價就是使你不能迅速地成功成名。所以索爾仁尼琴要說：「要做一個獨立的人，需要的條件是太多了！」

有人說，在大陸的情況下，一個人要想成功成名，要想做一些好事，甚至包括你想更有力地爭取自由民主，你都必須進入既成權勢集團之內才行。不對。要知道，那正是極權制度給你設下的誘餌和陷阱。我們的責任正是要去改變它而不是去適應它。唐太宗在視察考場時不是說過一句很得意的話嗎：「天下英雄，盡入彀矣。」科舉制下的知識分子，建功立業的捷徑是去考試做官，否則只好當一名隱士與草木同朽。其實，要是有稍多一些人是

那個試，做那個官，皇帝不可能把天下之才絕大部分網羅在自己手下，他也就不能長久地壟斷全部政治領域了。更何況，古代的隱士還可以憑詩文傳世，極權統治下的人要想立言，似乎也非要經過黨的過濾不可。爲什麼不去努力衝破這種約束呢？索爾仁尼琴說：「魚群從來不會爲反對捕魚業而集體鬪爭，它們只是想怎樣從網眼裡鑽出去。」我們真的都是魚嗎？當着時機不允許的時候，選擇那種借用官方規定的方式去活動，或許不失爲一種明智之舉；然而，當着我們有了開創自主性公共交往空間的機會時，我們却不去開創它而依然熱衷於借助官方規定的方式活動，那就是愚蠢的過錯了。爲什麼中國的歷史總是在循環而絕少突破，原因就在於：即便到了可以選擇的關頭，大多數人仍然樂意走老路。我要強調的是，七八一七九年間分明是一個絕好的機會，可惜大家沒去充分地把握它。

前面說過，官方刊物的信譽掃地是民間刊物應運而生並得以發展的一個條件。這反過來也就是說，官方刊物的信譽回升會造成對民間刊物生存的巨大威脅。杜博妮認爲是「矛盾」的東西其實決非矛盾。讓官方刊物有更寬的言論尺度，正是逼死民間刊物的最巧妙的一着。一旦官方刊物能發表不亞於民間刊物的尖銳文字，誰還會對民間刊物格外關心呢？在那段期間，官方刊物越辦越好，這使民間刊物處於兩難的困境：如果你要提高你的尖銳性，你會贏得讀者，但會失去安全；如果你不去提高你的尖銳性，你會保持你的安全而失去讀者。可是，失去輿論的普遍關心，意味着失去民衆的保護，到頭來仍然會失去安全。畢竟，民刊的參與者人數不多，他們不足以自己保護自己。他們必須吸引民衆的廣泛注意，那是弱小者唯一

的自衛手段。由於官方刊物日益奪走了市場，民刊的生存愈益孤立。在民主牆民間刊物初起之時，它幾乎是北京等大城市關心政治的人們的共同的熱門話題。然而，到了最後一份民刊「責任」被封閉，王希哲、徐文立等若干人被捕時，連最敏感的首都知識界都很少有人知道，更談不上引起普遍的異議了。民間刊物的最終消失幾乎是無聲無息的，因爲廣大民衆在此之前許久就對它不大關注了。不用說，唇亡齒寒，在民間刊物被取締後不久，官方刊物就收緊了。

在七九年夏天，政治氣候轉暖。說來有趣的是，在那些較有地位的知識分子中間，肯參與我們搞民刊的人極其個別，勸說我們拋開民刊而在官刊上發展的倒不少。他們說，既然你們能在民刊上說的話，略加修理後在官刊上也可以說，何必還要在那裡慘淡經營呢？那時我寫了一篇「試論同仁刊物」的文章，力圖爲民刊的存在辯護。我提醒說：越是在民刊看來沒必要的時候（那意味着官刊的言論較開放），我們越是要關心和加強民刊的存在地位。否則，等到民刊消失後，官刊的控制又再度加緊，人們要重新恢復搞民刊就更困難了。不過在當時，考慮到這一點的人很少。

(3) 民刊參與者自身也不是沒有弱點的，他們的弱點基本上是在策略上而不是在原則上、方向上。大多數參與者對當時形勢的特點缺乏冷靜而周詳的思考，對於我們在現階段的基本目標沒有明確、準確的共同認識。雖然大家都在從事開創自主性公共交往空間的英勇努力，但是大多數人對此並沒有足夠的自覺意識。換句話說，大多數人並沒有把開創自主性公共交往空間這件事本身當作我們當時奮鬥的主要任

務。一個缺乏牢固地基的建築是經不起風暴襲擊的。

我在民主牆期間寫的文章，幾乎全都是圍繞同一個主題——言論自由。自從七〇年我完成了自己的思想轉變後，我所苦苦思索的問題就不再是什麼是民主自由、什麼是極權專制，不再是對現實中各種醜惡現象的批判，而始終是集中於一點：那就是，我們怎樣才可能擺脫極權統治？我們將有什麼樣的機會？我們應當從何處取得突破？我在民主牆所作的一切，實際上都是在那三年前準備好的。我相信，在歷史提供的千載難逢的機會面前，我們有可能做成兩件事：一是讓言論自由的原則深入人心，使之成爲普遍的共識；二是讓自辦刊物這種形式鞏固下來。這樣，我們就好像是下圍棋做成了兩個眼，從此贏得了一片自主的活地。政治，在我看來，重要的問題不是我們要說些什麼，做些什麼，而是我們要先說些什麼，先做些什麼。

我在「論言論自由」和「論同仁刊物」兩篇長文中，盡可能詳盡地闡述了我的思想。這兩篇文章引起了民主牆朋友和讀者，包括一些黨內高層知識分子的贊譽。但可惜的是，對於我在文章中透露出來的戰略設想，讀懂者寥寥。說來有趣的是，正如我估計的一樣，在當時，連那些「左王」們也沒有注意到這些文章。至於海外，據我所知，在評價民主牆的諸多論著中，都沒有提到它們。一般人顯然更關心的是那些披露了若干小道內幕的文章，是那些批評更直接、更尖銳的文章（照不少人的看來，越直接、越尖銳就是越深刻），是那些提出了某種特殊概念、驚人論點的文章（我一向主張在論據上下功夫）。我和民主牆的朋友們也曾有過一些討論，不過，等到有較多的人開始接受

井底孤獨的先驅者

楊益

我的想法時，那已經是民主牆被封閉之後了。事實上，我的觀點受到較多注意，包括「左王」們的批判，乃是在八〇年競選之後。到了一九八六、八七年，爭取言論自由（包括出版自由、新聞自由）成爲大學生遊行的最主要的口號，許多知名的理論家也主張應把爭取言論自由作爲爭取民主的第一步，我並不感到特別受鼓舞，因爲我認爲，贏得這種自由、也就是創造這樣一種自主性公共交往空間的最佳時機已經不可挽回地過去了。

我還清楚地記得，在七九年底八〇年初那段時間，民間刊物已一蹶不振，我是何等的惆

悵。如此大好的時機，竟如此白白地丟掉。以後我們要做同樣的事就要困難多了。就像我「言論自由」中說的：「歷史並不缺乏機會，但現實中缺乏認識機會的人。」在那段沉悶的時期（也許還有許多人認爲當時形勢大好呢），我腦海裡常常浮現出辛棄疾的詞句：「把欄桿拍遍，無人會，登臨意。」

七、不結束語

要講清楚民主牆的歷史，那需要不止一本專著。十年來中國民主運動的進程，不是一個

始終如一的參與者，是不可能瞭解清楚的。在專制機器依然控制了一切傳播媒體的情況下，多少有價值的東西被隱沒不彰！直到今天爲止，一般人對於中國的民主運動又知道些什麼呢？有些人也許掌握了譬如民間刊物的全部文章，但是，他能知道在文章背後發生的事情嗎？他能讀懂這些在特殊歷史條件的特殊作品嗎？我們不能迷信歷史。因爲歷史學家只能知道實際出現的事，很難知道可能出現的事。而人生、政治，却正是可能性的藝術。

讓我們緊緊抓住現在吧，趁未來還是可能的時候。



歷史的先驅者總免不了孤獨的命運。這點早已爲歷史本身所證明。

如今，我們早已知道了「文革」中許許多多的先驅者的故事。無論他們有着什麼樣具體的政治、社會主張，只要他們的思想和言論衝破了「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的藩籬，他們的命運便是千篇一律：他們的文字和言論遭到追查、禁止；他的本人則被捕、挨鬥、受刑，以至於有人最後被剝奪了生命。而他們周圍的人，他們爲之奮鬥乃至犧牲的那些人，如果還沒有去助紂爲虐的話，則必定是噤若寒蟬。他

們走的是一條光榮的荊棘路，孤獨，便是他們背負的十字架。從遇羅克到張志新，無一例外。然而，「李一哲」却是一個例外，一個難得的例外：他們曾經準備好在孤獨中渡過漫長而寒冷的冬天，却意外地發現周圍已然是早春二月。人民和大地一同開始蘇醒了。於是，他們越過了孤獨。

一、

十四年前，當「李一哲」——李正天、陳一陽、王希哲——決定在廣州市的北京路街頭公開張貼他們那張後來在廣州市、廣東省，甚至在全國範圍內引起了不小的地震的大字報——「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獻給毛主席與四屆人大——時，充分意識到了事情嚴重性的陳一陽向大家發問：大字報貼出後，我們該有什麼樣的打算？王希哲當即給了一個斬釘截鐵的回答：「布朗基坐了三十八年牢，我準備坐上它三十九年！」

平日，王希哲有時雖言過其實，這一次他却沒有誇大其辭。在當時的形勢下，爲了這樣的一紙大字報，他們不僅有坐三十九年牢的可能性，弄不好，命也會送掉。他們做好了坐牢甚至送命的準備，雖然他們和所有的普通人一樣，都不那麼喜愛坐牢，也不那麼願意送命。「李一哲」——由李、陳、王等人組成的一個小團體，是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戰鬥洗禮」中結成的莫逆之交。在一九六六——一九六八年的風暴中，他們曾是廣州群眾組織中的活躍人物。

如果有人要問：中國當今的思想解放運動是從什麼時候萌芽的，人們或許可以這樣回答：從一九六六年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場「革命」的到來，使那些歷來高居於普通老百姓之上的不可一世的官僚們成了「紅衛兵小將」的掌中物。稚氣未脫的「小將」們一夜之間發現自己竟然也有掌握世界的權力。權威似乎不復存在了。

然而，還有一個最後的、最大的，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大得不可比擬的權威。其它權威的被掃除，正是由於這個權威的存在，也正是爲了這個權威的存在。世界正是在這樣的矛盾中顛來倒去：一方面是絕對的自主，另一方面又是絕對的服從。

「李一哲」以及和他們同時代的人們在這個顛來倒去的世界中逐漸學會了思考——用自己的頭腦去思考。如果說，「文革」既教會了他們自主，又教會了他們盲從的話，那麼，在經歷了盲從所帶來的一切慘痛後果——武鬥的鮮血、人民的苦痛、「小將」們的被出賣、「上山下鄉」後目睹的社會落後與貧窮，等等等等——之後，他們只選擇了自主。

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的發生，證明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獲得了全面勝利」這一神話的破產，同時也證明了所謂「毛主席無產階級司令部」的荒謬。這是「文革」的轉折點。在此之後不久，「李一哲」便誕生了。

研究和目睹了中國數十年來發生的變化，討論了中國社會的現狀和前途，他們打算寫一篇「關於中國社會的歷史變動」。經過不斷的探討與修改，一九七三年秋天，他們寫出了「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的第一稿。

當「民主與法制」的稿子還在朋友圈子中傳閱的時候，一九七四年春夏之際，所謂「批林批孔」運動在全國開始了。

在「批林批孔」這一不倫不類、令人發笑的名稱中，被歷次政治運動磨練得敏感而圓熟的中國人民都明白，「上面」又要借運動之機來打倒一批什麼人了。從報紙上那些雖然荒唐卻來頭頗大的文章中，稍具頭腦的人都能看出，「運動對象」是那些還有點普通常識，起碼還懂得人需要吃飯這條基本道理的黨內務實派。這場運動對於絕大多數人，始終不過是一場鬧劇，是一次「文化革命」的毫無氣魄而又死氣沉沉的翻版。

可是，這場運動同時也給了許多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人們以一線希望。由於「大字報」這一形式重新被毛澤東所肯定，各種感到冤屈的人都有機會在街頭（法庭可憐的替代物

）一申冤枉，一洩憤怒，並向政府和社會要求公正待遇。「文革」中派性的舊怨也因此重提。這樣，自一九七四年春、夏始，各種大字報便紛紛出現在街頭。

「李一哲」的決心超越舊日派性的藩籬，將這場「大字報戰」引向對「文革」進行總結，對中國現狀和未來的探討。自一九七四年四月起，他們便正式用「李一哲」的名字貼出了一系列理論性的大字報：「廣東怎麼辦」、「星火燎原館的始末」、「革命死了，革命萬歲」、「評『陽春三月』」等等。最後，當他們明白自己在社會上已經具有一定影響和號召力時，他們決定公佈自己的「體系」——「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

當「民主與法制」在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公開張貼出來時，「李一哲」們已經做好了坐牢、殺頭的準備。據以往的經驗，他們明白，自己脚下是歷史，前方是孤獨。

二、

這一次他們估計錯了。歷史的道路上依然佈滿荆棘，然而却有許多人願意幫他們一同踏開這荆棘路。

自「民主與法制」貼出伊始，北京路街頭的交通驟然擁擠了數倍。大字報獲得了預想不到的政治和社會效果，一時間，成爲廣州市各個單位、各個階層，以至於各家各戶談論的重要話題。從早到晚，包括深夜與凌晨，大字報前人头洶洶。有不少人，主要是年輕人，拿着小本一字一句地將兩三萬字的全文抄了下來。與此同時，廣州街頭上的「大字報」運動從原先的熱衷於舊日派別間的相互攻擊、個人冤案的申訴轉向了圍繞「李一哲」大字報的內容而展開的大辯論。辯論的參加者，主要是二、三

十歲的青年人。人們開始從討論中國新的「轉權階層」的出現、「社會主義公有制」的質變、不合理的社會分配制度、「林彪一伙」實行的「封建法西斯專政」、「社會主義民主」的實現以及「社會主義法制」的健全等等理論問題上來。北京路一帶成了街頭理論家的大展才能的場所，廣州人民在這裡開始了他們的思想解放運動。

廣州人民在驟然之間爆發出來的政治熱情使許多自詡爲了解廣東，了解廣東政治和廣東人性格的人大爲震驚。的確，近幾年來，廣東人，特別是廣州人，是以缺乏政治熱情著稱的。廣東政治的活躍人物中，外省人占了很大的比重。尤其是自七十年代初以來，從香港刮過來的「南風」已經使廣州人民得後日風氣之先，開始「崇洋媚外」，嚮往「資本主義世界」的物質文明，而將「無產階級政治」擠到了盡可能不起眼的地位，可是這一次，廣州人民却因爲「李一哲」而激動不已。也許，他們意識到了這是自己的政治。

「李一哲」們忙了起來。

最忙的，是要接待絡繹不絕的來訪人群。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在這張明顯「反動」的大字報貼出來之後，人們並沒有像過去對待一般「反革命」或「準反革命」一樣避之唯恐不及。相反，每天都有來自各個地區（甚至外省市）、各個階層的熱情的人們前往廣州美術學院李正天那間僅七平方米的小屋，找「李一哲」們討論他們的大字報、討論馬克思主義、討論文化大革命、討論中國社會的現狀、討論中國與世界的前途和命運。「李一哲大字報」點燃了許多人的思想火花。在一定的限度之內，這裡成了關心中國命運的人們的自由論壇。另一件令人着忙的事，是各地向他們索取

大字報印稿的要求多不勝數，窮於應付。於是，在大字報貼出後十天，他們又在旁邊貼了一張小字報，說明印刷紙張不夠，希望大家能支援一些白紙。從此以後，他們不僅不斷地收到人們一批又一批送來的紙張，還收到了不少匯款。匯款單的落款往往都是些無法退回的假地址，而在那簡短的留言條中總有一些「支持你們！」「向你們致敬！」之類的話。

那一段時期，「李一哲」們，特別是專門負責出頭接待人的李正天可真是出盡了風頭。各種各樣的人從早到晚包圍着他，一天下來，精疲力盡。

這哪裡像是一個「無產階級專政」之下的「反革命份子」的遭遇呢，分明像是一個當今的電影或體育明星的故事。然而，這些明星們還不一定受過他們的崇拜者那麼大的尊敬呢。

三、

對於這種情形，很難想像當局會不聞不問。可是，怎麼問，如何問，却是一大難題。

還在大字報貼出來之前，廣東省委便從輾轉傳抄的手稿中得知這篇文章的存在了。按照慣例，對這樣的「反革命」應該「格鎮壓勿論」，但如今正是「運動當頭」，他們必須三思而後行，以免落個「鎮壓群眾運動」的罪名。猶豫間，大字報上了街。

省委的第一個反映，便是將其定性爲「反革命大字報」。但不幾天後又改爲「反動大字報」。據說二者之間的區別在於：「反革命」者，指大字報作者爲反革命，屬於「敵我矛盾」；「反動」者，則是大字報本身反動，人呢，還是「人民內部矛盾」，「可以教育」。這就給以後的「批李」定下了基調。傳言這是當

時的廣東省委書記趙紫陽的主意。

不知是由於在「運動高潮」中而有所考慮，還是出於對「李一哲」的一點同情甚至好感（後者的可能性很大），廣東省委決定對「李一哲」採取一種自一九五七年「反右」之後便聞所未聞的批判方式——全省開展「批李」運動；與此同時，作爲「批判對象」的「李一哲」們仍然可以自由活動，可以參加自己的批判會，甚至可以在會上發言——「言論自由」嘛。

於是，自七四年底始，廣東的「批林批孔」運動變作了「批李一哲」。先是由省委宣傳部拋出了署名「宣集文」的指導性「批李」長文，之後便在各工廠、機關單位進行「批判」。

然而，「李一哲」們與從前那些被封住了嘴的批判對象不一樣，他們具有還擊能力。因此，自「宣集文」的文章一出，「李一哲」們便連續在北京路街頭貼出了一系列的反擊評論。有意思的是，廣東省委宣傳部竟然印發了一大批「李一哲」的文章，包括「民主與法制」以及對「宣集文」的反駁，同「宣集文」的文章一起發放到各單位「供批判用」。也許做出這一決定的人有着某種「不可告人」的目的，否則很難設想一個有正常頭腦的人會不明白「李一哲」的大字報有着怎樣的影響力，而「宣集文」的批判又是怎樣的強辭奪理，漏洞百出。更有意思的是「批李會」。各個單位都必須召開「批李大會」特別是那些大單位，更可獲得傳喚到「李一哲」中某個人來當場答辯的殊榮。於是，這樣的批判會便成了最有好戲看的地方。

習慣於開「鬭爭會」的人們對這樣的批判會毫無精神準備。他們甚至從來沒有作過被批

判者還會說話的假設。「李一哲」們的反擊，底下群眾的起哄，使這些批判會一次又一次地陷入尷尬場面。然而，戲還要往下演，於是，便出現了也許是空前絕後的鬧劇——批判會彩排。準備開會的單位在幾星期之前便預先物色好一個扮演「李一哲」的人，研究「李一哲大字報」，設想他們會如何回答某個問題，等等。然後，由安排好的批判者和假扮的批批者進行數次「彩排」，直到領導人認為滿意為止。自然，替別人思維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所以這類彩排的結果往往總讓人啼笑皆非。

當時，有「李一哲」們出席的批判會成了廣州許多青年人最愛湊熱鬧的地方。會場上的一陣騷動，一陣轟笑，都成了人們對「李一哲」鼓勵與支持的信號。「李一哲」們在批判會結束之前便被送離會場，以免會後像凱旋的英雄一般被一些不怕死又不知天高地厚的人們包圍起來。

「批李」成了一場不折不扣的鬧劇。

※ ※ ※

到一九七五年五、六月份之後，熱鬧了一陣子的「批李運動」開始悄然無聲了。這一運動不僅沒能消除「李一哲」的影響，反而使這種影響擴大了數倍。看來，哪怕是稍微給予對手一點點可憐的發言權，「偉大的毛澤東思想」也就很難「戰無不勝」。因此，廣東省委最後也只有按照「無產階級專政」的傳統辦法，將「李一哲」弄到工廠農村去改造了事。這已是一九七五年八月的事了。

早春儘管寒冷，但北風已經不那麼可怕了。

獨主、市獨主、夜相獨主和自治

丹增朱杰

編者按：

前不久，一位剛從西藏參觀訪問回來的美國人說，在西藏，民族仇恨已經達到了一觸即發的危險地步。漢人們整日提心吊膽地過日子。他們說：「不定哪一天晚上，藏人就會衝進屋裡，把我們漢人全殺光。」

衆所周知，藏族從來是一個愛好和平的民族。如果不是長期的受壓迫，何以致此？

藏人絕大部分都虔信宗教。照我們這些一向缺乏宗教感並受過現代自然科學教育的人來說，我們很可以輕而易舉地指出他們所信仰的宗教的荒謬。但是我們不應忘記的是，宗教信仰畢竟是一種十分強大的精神力量，它能驅使千千萬萬的信徒具有一種超越自身眼前利害的追求。達賴喇嘛是藏人公認的精神領袖，即使在他流亡國外三十年後，他的一句話對於虔誠的信徒們仍具有巨大的感召力。不止一位藏族朋友對我們說，假如達賴喇嘛號召藏族人民從事暴力反抗，整個西藏地區很可能頃刻變成一片血海……

但是，達賴喇嘛是一個非暴力主義者。他一再勸誡他的同胞冷靜、克制，用堅定而溫和的立場去爭取自己的權利。這一

點可以從他最近向中共提出的和平談判條件中看得很清楚。

近些年來，西藏爆發過多次舉世為之震驚的抗議和流血事件。對這些問題應當怎麼看？我們一直主張要把人權的問題和主權的問題區分開來。我們反對對西藏人民採取高壓政策，我們也反對西藏獨立。基於這一立場，我們認為，達賴最近提出的幾點主張是值得大家認真對待的。我們希望中共政府能夠和達賴喇嘛進行真正有誠意的談判，從而實現一種既維護國家統一、又充分尊重藏族人民意願的長治久安的局面。

我們並不否認，昔日達賴治下的西藏也有許多問題，我們也並不否認近些年來中共在西藏的政策已較過去略有改進。對於目前西藏地區藏漢之間的民族對立情緒，我們是深感不安的。我們相信，要真正解決好西藏問題，必須遵循和平民主的途徑。高壓或許可以得逞於一時，但必將造成不堪設想的嚴重後果。

今天，中國面臨的各種問題很多，解決這些問題的前提是我們必須首先創造一種寬和的氣氛，用對話代替對抗。這是我中國民聯的一貫立場。

達賴喇嘛今年六月十五日在德國斯特拉斯堡的歐洲議會就西藏問題提出了他的新建議。其中最引人注意的主張是，西藏（包括衛藏地

區，即今西藏自治區；康區、即川、滇的藏區；和安多地區，即青、甘的藏區）以一個「自治的民主政治實體，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聯系」

(In association with)，中國政府負責西藏的外交政策，西藏政府則應通過她自己的外交部門發展並保持非政治性的對外事務。西藏可以參加與此相關的國際組織。在通過推行非軍事化，從而實現真正的地區性和平之前，中國可以有權在西藏駐札數量有限的軍事力量和設施，但是這只能以防衛為目的。

達賴喇嘛認為，他的這些想法體現了解決西藏問題的最現實的途徑，它既重視了西藏的分別的地位 (Separate Identity)，又照顧了中國的利益。他還認為，他的建議是某種形式的「一國兩制」。

近十年來，達賴喇嘛在各種場合的講話中，經常強調西藏人民的幸福，但是達賴喇嘛和他所領導的西藏流亡政府從來沒有放棄過「完全、徹底獨立」的立場。這次他的新建議中主張西藏與中國建立一種「聯繫」關係，中國負責西藏的外交政策，並有權在沒有實現非軍事化和地區性和平之前在西藏駐札防禦性的數量有限的軍力量。這不能不說是一項重大的讓步。

對於達賴喇嘛的新建議，中國政府却表示了十分強硬反對立場。中國政府先後發表的幾個官方聲明和評論，認為達賴喇嘛的新建議雖然在「提法上」與他去年在美國眾院人權小組委員會會議上發表的「五點計劃」有些變化，但實質上，「依然否定西藏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否定中國政府對西藏少用有神經主權」，並且「企圖使西藏問題國際化」。因此，中國官方發言人反覆鄭重聲明；中國對西藏的主權不容否定。「西藏獨立不行，半獨立不行，任何形式的變相獨立也不行」！儘管最近中國政府表示願意與達賴喇嘛對話，但其僵硬的政策並沒有任何根本上的變化。這樣

一來，不僅否定了達賴喇嘛的和解的姿態，關死了談判的大門，而且把尋求解決西藏問題各種嘗試、途徑、設想、建議都封殺了。

然而什麼是獨立，什麼是半獨立，什麼是變相的獨立，在中國其實並沒有什麼明確，嚴格的法律上的定義，它完全可以因人、因事、因時，因地隨意加以解釋。完全視當時的政治需要而定。中國承諾給香港的「港人治港」難道不是一種半獨立？中國承諾給台灣的除了掛上五星紅旗外一切都照辦的「一國兩制」，難道不是一種變相的獨立？西藏從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九年期間所實行的制度是一種「藏人治藏」的「一國兩制」，叫它「半獨立」或者「變相的獨立」也未嘗不對。中國政府在某個時候，對某個地區，在它還沒有完全控制住這個地方時，常常表現出相當大的靈活性，獨立、半獨立、變相的獨立，都不僅可以談，還允許你從這樣的地位存在一段時間，但一旦把你牢牢地控制在手了，就再也不許你有任何其它的選擇，只准走中國政府給你選定的道路。給西藏選定的道路，就是實行民族區域自治。

這個「民族區域自治」完全是強加給西藏人民的，西藏人民從來沒有自覺自願地接受過它。而且，自從西藏各地建立了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藏人從來就沒有實行過「自」治，從來都是實行的「他」治的。今後，如果還繼續留在這樣的民族區域自治裏，就繼續被「他」治，永遠不會有藏民族的出頭之日。實行民族區域自治，不反政治上沒有真正的自治權力，在經濟上，雖然也建立了一些工廠、修了一些路，但是整個經濟發展水平和人民生活並沒有什麼提高，還造成全面依賴中國內地的「殖民地式」經濟，西藏民族完全失去了對自己土地上的經濟活動的控制。在文化教育上，

儘管也建立了一些學校、醫院、文化團體，但是西藏的文盲率仍高達百分之七十多，西藏的民族文化遭到毀滅性的摧殘。實行民族區域自治還使得漢人大量湧入西藏各地。今天，康區和安多地區的漢人的比例已經超過或即將超過藏人，在西藏自治區內漢人的比例也正在迅速上升，如果這種增長勢頭繼續下去，用不了幾年，藏人在西藏自治區內也將正式變成少數民族。今後，隨著漢人的大量湧入，漢文化的大規模滲透，西藏民族還不能繼續存在，西藏民族文化將逐步消之。幾十年以後，西藏民族還不能斷續存在，西藏文化還不能繼續存在，對此我們持極其悲觀的態度。

因此，在西藏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對西藏民族、對西藏人民從來就沒有帶來過任何好處，將來也不可能。也許，在西藏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是符合中國政府裏的一些保守主義者的利益。但它絕不符合西藏民族的利益。

那麼，什麼是解決西藏問題的可行的辦法？這一問題還有待各方人士繼續探索、研究。近年來，國際上有不少人都提出了許多頗有見地的設想、建議，其中許多華籍人士也提出了不少深思熟慮的意見。達賴喇嘛的新建議，可說是上述這些設想、建議中的一種。儘管作為一個藏人，本評論員對達賴喇嘛的建議尚有某種程度的保留，覺得他的讓步太大、太早。但是，該建議仍不失為一個大膽的嘗試。他的尋求解決西藏問題的真誠的願望和寬容，和解的姿態是值得讚賞的。西藏民族是一個和平的民族，是一個有文化、有修養、有理智、講道理的民族。儘管這個民族已經失去了自主權，但是她並沒有失去理智。我們始終認為，西藏問題應該以和平的方式，以談判來解決。但中國政府也應在這種和解的道路上邁出自己的步伐。

祭

王靖



——去年九月二十九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為寧夏十三名青年組織的『共產主義自修大學』平反昭雪的消息。但人們是否知道，這十三名青年中的吳述祿、魯志立、吳述樟三個同志當時已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了……

這是怎樣的一年？

紛紛的日曆

每一頁都浸透了悲與歡；

這又是怎樣的思念啊，

飯桌上依舊擺着

孩子生前的筷和碗。

離別的親友總可以再見，

既（即）使分居在地北天南；

失散的母子也總能夠團圓，

哪怕等了一年又一年。

但誰能把流盡的鮮血

一滴滴如數追還？

誰又能用一紙昭雪，

喚醒死者那不盡的長眠？

是誰給予的權利，

可以用子彈打斷

思想的發言？

難道因為把母親呼喚，

就要在襁褓中

被無情的扼斷喉管……

啊，我不會相識的戰友，

十三個無罪的囚犯；

啊，我似曾相識的同志，

十三個勇敢的青年。

眉頭才剛剛學會緊鎖，

拳頭才剛剛懂得緊握。

沸騰的熱情

急切像山間的噴泉，

年青的額頭
平滑如玉石一般……

我不能同意，

嘴的使命只是爲了進餐，

我也不願緊閉雙眼，

遵從收購靈魂的私販。

難道在歷史文化的集裝箱上，

到處都貼着骷髏的鬼臉？

難道在思想的城市裡，

到處都佈下紅燈預示的危險？

雖然我們年輕，

還不能精確地解讀

腦電圖的曲線；

雖然最新的思想也只是，

爲探索無窮的未來

剛剛造起的初級火箭。

但怎能放棄思索，

這人類唯一的特權；

那叢林世界的流浪漢，

我們苦命的兄弟類人猿，

只因為不懂得翻譯大自然，

只因為還不能把十指數全，

至今還在蒙昧中徘徊，

或者在馬戲團裡作搗獻歡。

儘管人類已走過五十萬年，

仍沒有找到可以休息的終點；

我們怎能接受這樣的動員，

全體人類用四足着地，

列隊爬回大自然……

思想有時像美麗的繁星，
只在深邃的夜空中閃現；

編者按：

王靖的長詩「祭」，在一九七九年四月發表在民主牆上，載於「沃土」特刊，引起廣大讀者的關注和好評。這裡我們重新刊出，表示對那一段難忘的歷史的紀念。

正是那黑暗的夜色，
才顯出思想結晶星斗般的燦爛。

像哥白尼莊嚴的宣判，
像帕多瓦大學神秘的實驗。

思想有時又像一沼泥潭，
可以在荒寂中陳腐千年，

每一片泡沫都百年不變，
被人類的唾液醃得發酸，

像寺院滿塔的經卷，
像對天國永久的夢幻。

思想有時又像熊熊的火焰，
被普羅米修斯的信徒處處點燃，

創造出一個個英雄的時代，
進行了一次次偉大的冶煉，

像百科全書的經典，
像共產主義者的宣言……

自然界有冰河的侵襲，
曾在大地上鋪下萬里霜寒；

歷史也曾一再失算
多少個世紀屈朋於強權。

這也許是因為人類的前進
有賴於強者的皮鞭；

也許在飄揚的鷹旗下，
屠殺可以把歷史推前；

也許人的生命十分價廉，
一朵藝術之花就要付出百噸的血汗；

也許是爲了使人類強健，
先要把所有的大山一一背遍。

在歷史的交易所裡

進步永遠不是由平等兌現；
也許苦難才是真正的砝碼，

只有它才能抬起天平的另一端。

於是還在很久以前，
真理就學生了它的伙伴；
從冰冷的鎖奴椿

到森嚴的宗教裁判，
人類用了多少頭顱進行交換，
中世紀才勉強摘掉它的皇冠；

從巴士底獄的鐵欄，
到資本的黃金鎖鏈，

爲了一次向光明的飛躍，
人類需要多少次把腰深彎。

但是儘管

儘管被詛咒的舊制度

這般專制兇頑，

空曠的荒野裡

仍能聽到新思潮

一次次衝破冰封的波瀾，

像「晨鐘」

像「新青年」，

儘管上海灘遍地的狼犬，
躲進小小的閣樓，

有地一方，有天一片，
學者們仍能揮毫苦戰；

發出「吶喊」，

爲「家」弔唁。

這並不是諷刺啊，

雖然印刷機旁

警察板著鐵青的臉，

但「法蘭西內戰」

仍能在帝國出版。

雖然在昏黃的路燈下，
到處都是跳蚤般的暗探，

但「國家與革命」

仍能在沙俄流傳。

讓我們盡情揭露吧

有產者的虛偽和欺騙，

而我們是誠實的，
汗漬的手裡握着真槍和實彈。

今天已沒有帝王，
今天也沒有狼犬，

空氣該怎樣新鮮，
天色又該怎樣的湛藍。

可是僅僅幾個青年，
只因爲他們戳破了賭場的窗紙，

只因爲他們指出了後台的隱患，
就被押上刑場，

接受了子彈的審判。

臨刑還勒上壓舌板，
爲的是不許申辯和喊一聲冤。

難道這不是諷刺嗎？
是誰把中世紀的黑暗，

又在共和國的上空佈滿？
這又是哪一家的專政

行使得如此全面？！

勝利者即使是在狂歡，
也不會忘記從敵手的失敗中

提防自己同樣的弱點。
爲此巴黎豎起了斷頭台，

用鮮血染紅了一七九三；
爲此蘇維埃公佈了法令，

用鐵拳保衛了新政權的幼年。
當然，沒有人能計算

專政的極限；
動亂的時代

理智屈服於情感，

科學讓位給習慣。
羅伯斯庇爾可以請歷史寬恕，
因為舊王朝的黨羽
手中還握著衛冕的刀劍；
列寧可以為契卡辯護：
「搏鬥時刻
怎能挑剔每一拳？」

人們已不再需要
在合理與合情中，
為歷史做出公斷
契卡昨天的尊嚴
早已變成克格勃今天的兇險。
背叛者尤其懂得
什麼才是統治的經驗。
從此不再向西伯利亞
流放一隊隊人犯，
因為在這條泥濘的道路上
曾錘煉出爭取真正自由的中堅。
思想開始被鎖進
富麗堂皇的精神病院；
在魯比揚卡監獄，
反抗者被製成活的肉罐。
如果你能剖開叛徒的心尖，
會發現他們的愛情
早已奉獻給一粒粒子彈……

難道讓我們也這樣相信，
這同樣是我們的觀念？
難道讓我們也這樣理解，
這是所有思考者的前車之鑒？！
難道代表大會是街邊的乞丐
可以隨意摧殘？
難道憲法是下賤的妓女

可以一夜一換？！
否則該怎樣解釋
我們對民主的禮讚？
又該怎樣記取
對青年的這一次審判？

世間最可貴的
莫過於青年。
因為世界像一張無邊的考卷，
只向學生索取答案。
因為真理像美麗的姑娘，
只鍾情於可愛的青年。
勇於探索的青年，
就像剛剛睜開的雙眼，
一眼能找到光源，
也一眼能把黑暗洞穿。
既沒有塵世的迷惘，
也沒有習俗的偏見。
敢於提問的青年，
就像嬰兒的第一聲哭喊，
控訴母體的禁錮，
帶着新的生命來到人間；
沒有一聲是虛情，
也沒有一句是謊言。

說什麼「青年易錯小樹易彎」，不！
青年是風雨中的雛燕，
怎能套上母鷄沉重的坎肩；
老年人也曾有過青春的歷險，
為什麼要把孩子鎖進自己的經驗？
只要看到黎明

哪怕僅僅一線，
青年也要飛奔向前；
只要感到不平，

哪怕只有一點，
青年也會忍不住叫喊。
難道不是嗎？這十二個青年，
就表現了這初生的坦率，
就體現了這初知的果敢。

他們曾帶着少年的天真，
投軍繼續革命的營盤。
經過一場場激烈的混戰，
他們發現俘虜了
祖國可愛的春天；
他們也曾用珍貴的青春
購買了高價的車票，
把希望寄托給英明的預見，
却發現列車在一夜之間
駛過了昨天和前天……
他們踏遍了祖國的名山大川，
却發現處處都被寺廟占領了山巔，
羅漢五百，諸神三千，
大雄寶殿早已擁擠不堪。
為民族智慧的浪費而慨嘆。
他們從此不願建造
新的神壇。
他們雖然喜愛紫禁城的玉柱飛檐，
却發現古板是皇家的家傳，
肅穆莊嚴，虎踞龍蟠，
只成為取悅今人的消遣。
把千秋功罪付秋風，
他們從此不願屈膝
新的金鑾寶殿。

他們在徒勞的奔走中懂得
太陽的升起
有自己嚴格的鐘點，

沒有誰能把它阻擋，
也沒有誰能把它提前。
他們在反覆的衝刺中理解，
歷史只能依次通過
每一處必經的驛站，
要強並不就是富強，
一天又怎能等於二十年？

儘管他們能背誦
幾十首動情的田園詩篇，
但社會主義的定義
並不是桃花源裡可耕田。
永遠大好的頌歌
他們早已唱得口乾，
總是有理的箴言
他們早已背的生厭；
在電子計算機的鍵盤上
他們讀懂了
現代化嶄新的語言，
在衛星的軌道上
他們得到深刻的啓示——
什麼才是真正的明天。

他們看見中山裝的袖口裡
也會伸出冷酷的鐵腕；
他們知道金色的紀念章
也可能別在定時炸彈上邊。
用一付口紅塗抹的嘴臉，
曾取得政治上的優先權；
靠一萬支高音喇叭的嘶喊
也曾建立新秩序的尊嚴。
從這裡他們明白：
滔滔的說教
只不過是吸血前的催眠。

誰聲稱自天而降，
只不過是爲了騎上別人的雙肩。
從這裡他們真正懂得：
要測度政治風雲的變幻，
決不能依靠關節炎，
要探索真正的病源
只能掌握X光無情的射線。
於是十二個青年發出了大聲的質問：
如果一切是如此的黯淡，
他們可以把鉛印的字義
全部推翻。

於是十二個青年進行了大膽的思考：
如果是因爲過早地標上了句點，
他們可以把民主革命
重寫一遍。
青年不善於在鍋裡
爭奪已有的現成飯，
晃晃已長成的雙肩
要自己挑起未來的重擔。
庸人的鎧甲只適於脆弱的心臟，
搓搓剛剛掛齒的雙手
青年要自己錘鍊
無敵的青霜寶劍。

青年們就這樣走到一起
列隊在真理的山前；
自修大學就這樣創辦，
聘請的教師是：
歷史、現實和明天。
但一切不會如此簡單，
如果寶石可以隨手揀到，
它早已等價於低劣的石炭。
如果歷史允許一廂情願，

烏托邦也早已建成千遍。
真理的山前
佈滿了蛇谷、棧道和險關。
真理教師猶如繼母
孩子的早熟
正需要她的嫉恨和兇殘。

因爲救世主的恩賜
只不過是一張禮單，
既然能夠大方的給予
當然也可以苛刻的索還；
因爲神學院的功課
是如此的艱難，
未來的教師們剛剛領到聖餐，
豈容馬上出現新的異端；
打開一些人的檔案，
你會聽到卍字旗下的喧喊。
揭開一些人的解放帽，
還會發現趙四爺的髮辮。
雖然紅旗飄揚在藍天，
但並不是一切都加了保險；
儘管哺乳在母親懷裡，
也不應像天使一樣睡夢香甜。
槍機可以服從所有的食指，
彈道也從來不是正直的線，
雖然法官總是道貌岸然，
自古權奸也只有一个跪伏在西子湖畔。
十二個青年被捕入獄，
初嘗了鐵窗的風寒，
三個青年被押赴刑場，
因爲他們走得最前最前。
但這一切並不使人感到突然
因爲這是從角鬥士開始的接力

要戰鬥怎能不走上前沿？
也不必爲停課而深感遺憾，
透過鐵窗復習那天上的風雲變幻，
不正是準備去參加畢業的大典？

中國法庭的臉

雖然一向五官不全，
但在那沒有耳朵的席位之外
我的心還是把一切聽見。

因爲青年的心理電波
發射在同一波段。

青年們並沒有爲自己
捐一條贖罪的門檻，
在生與死之間

他們的心像天地一樣的寬。
因爲他們並不是跪着造反，
用卑賤的磕頭

訴說一點可憐的意見；
在過去和未來之中

他們的目光早已把無限望穿，
逼供吧，人民就是同謀，
追究吧，真理就是主犯！

告別了，慈母手中的針線，
告別了，姐妹深情的矚盼，
踏着露水猶濕的小路

三個青年進入了槍口的視線，
像大理石一樣的平靜，

像湖水一樣的坦然，
那深沉的目光瞭望遠方
像在對熠熠的啓明星

把心中的理想侃談……
不要奇怪子彈經常生鏽，
那是它的點點淚斑，

因爲一出生就被鎖進彈匣，
要自由只能用別人的生命替換。
它遲早要飛出槍管

全部生命只是一聲狂喊！
今天啊，三粒子彈又被壓進槍膛
甚至來不及看看整個世界
就楔進了別人的眉宇之間……

一滴滴鮮紅的血
就這樣又一次灌滿
社會實驗的試管。

一灘灘火熱的血
就這樣又一次濺濕
現代史的字裡行間。

青年們撲倒了
把大地緊緊摟在懷間。

先驅者死去了，
在□□中把一切留給了明天……

日月如梭，星移斗轉，
最豐盛的□途
也無法款留嚴肅的時間。

它把一切毫不吝惜地拋在身後，
一頁日曆只准使用一天。

但有心的人們啊
却這樣多愁善感。

也許可以忘記一切，
却無法忘記志士的沉寃
也許在勝利的節日裡，
歡樂可以把回憶沖淡，

但只要還有一絲隱痛，
死者就會成爲不眠的旅伴。

因爲呵，正義法庭的手指
將永遠指着這一灘無辜的血迹

因爲那三隻不瞑的眼睛
仍舊在用沉默發言。

有人說這一切都沒有用，
有人對這一切視若不見，
有人自嘲應付良心的責難，
有人只拋下深深的感嘆。

懦弱的繼續懦弱，
苟延的繼續苟延……

然而，生活已在大聲發問：
這難道僅僅是三個人的青春？
怎能允許就這樣匆匆草菅？
這是無理的屠殺

又怎能得到如此卑怯的聲援？
連愚蠢的冬天都知道
爲什麼第一株幼苗十分危險

因爲荒涼中的新綠一片
乃是春天大軍的特命先遣。

歷史並不是校場的操練，
只有列好橫隊才能齊步向前。

三葉蟲也不是誰一聲令下
集體登上生命的彼岸。

是軍隊就有尖兵班，
先鋒的任務就是用犧牲探險。

說什麼成敗決定褒貶，
要唱歌就只有參加合唱團。

這些人的勇氣
也許能夠駕馭深奧的大海，

却爲什麼總是摔倒在常識的淺灘？
難道還要自己把牙打掉，
用委屈的臉告誡世界：

「危險啊，淺灘不淺……」

三個青年，

死得光榮，死得勇敢，
在寒風凜冽的時刻

你們沒有酣睡冬眠，

在革命需要的時候，

你們沒有鑽進鍋台和柴草之間。

緊催着春天的脚步

又將光明的未來追趕，

他們雖然死去了

但今天的勝利他們早已一一看見，

因為今天的一切，

就播種在他們的心間。

他們失去了生命

但並不像孤魂一樣需要可憐，

他們拋灑的鮮血

也不是什麼需要平反的冤案；

這是在同代人肩頭上

催征的鳴鞭。

這是對後來的青年

嚴厲的挑戰！

接受挑戰嗎

烈士同代的青年？

儘管我們曾破費十年

買下了一場可怕的動亂，

就像在自己腹內

試驗了一顆原子彈。

儘管我們像最無能的選手

被領先的戰車拋在路邊，

做爲落後的軍隊

到處都要飽嘗仰攻的艱難。

但我們並不接受

愚昧和落後的診斷，

也不願就此坐上看台，

只把別人的比賽觀看。

因爲我們不願放棄

對五千年文化的繼承權，

因爲我們不能忍受

民族的航船就此擱淺；

因爲我們不願看到

肥沃的土地再一次屈服於鹽碱，

因爲我們不願在槍口下

把屈辱的子孫代代繁衍……

時間沒有失物招領處

可以使我們討回丢失的十年，

但我們有落後的恥辱，

將使我們臥薪嘗膽。

讓我們不要悲觀

讓我們緊緊把好方向盤，

用所有的勞動文明把油箱灌滿

繞過其他民族陷身的泥潭。

讓西方的旅遊者

不要再獵奇古老的專鼎竹筴，

中國也並非僅有長城

才令世界稱羨。

我們將建成真正的伊加利亞

永遠埋葬掉長壽的漢瓦秦磚，

讓偉大的創造

一項項由東方命名

讓我們用豐富的漢語

重新參加先進人類歷史的編纂。

讓歷史再一次來求婚吧，

他決不會再一次陷入痛苦的失戀

人間最盛大的婚禮啊

將使他對所有的民族

高昂起自豪和幸福的笑臉！

宇宙就這樣打量着地球，

地球就這樣注視着中國，

中國就這樣期待着青年。

讓我們說

這一切並不是妄談。

我們敢於幻想

正是理解現實的刁難。

「共大」並沒有解散，

我們就是它第二批入校的學員。

烈士的夙願並沒有陳舊，

我們正在繼續爲它而戰。

讓我們勇敢地衝破

小生產埋伏的沼澤防線，

讓我們大膽地闖進

無限的宏觀和微觀

讓自由的血液

馬上起搏僵硬的血管，

讓民主的詞彙

從此定居中國的辭典。

讓科學的巨手，

把所有的鏽鎖一一扭斷，

讓馬克思主義的光輝真理

在中國取得真正的公民權！

啊，人類還是多麼渺小

面對宇宙的無邊無沿；

但人類又是多麼偉大，

因爲她孕育了無窮的接力

一次次越過險峯奇巖……

讓現代化的汽笛

去告訴新長征途中每一個驛站

未來已提前授予我們

代表她的特命全權。

前進吧，青年！

令行不止 小官專政

李遠

中央集權制有名無實

趙紫陽一次在某地視察時對當地幹部發牢騷：「你們都說沒有權、沒有錢，伸手向上要錢要權，可是我也沒有權、沒有錢，權和錢究竟上哪裡去了？」

在人們的印象中，中國一直是一個高度集權的國家，人們要辦什麼事，總是要找各級「第一把手」，找最高領導，以為只要他們一說話，一切問題都會迎刃而解。可是今天，這種印象已經成爲「老皇歷」了，「中央集權」已經有名無實。現在的狀況是黨中央指揮不了國務院，國務院管不住地方官，地方官管不了辦事員，企業家管不住工人。總之，人們稱這種狀況爲政令癱瘓，小官僚專政。這是一個王朝滅亡前的症兆。

政治局指揮不了國務院

今年八月，中共中央召開過兩次重要會議。第一個會議是八月十五至十七日的中央政治局第十次全體會議。這次會議原則上通過了「關價格關」的決定。決定開放絕大部分產品的價格，深化企業改革，輔之工資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另一個會議是八月三十日召開的國務

院第二十次常務會議。照常理，國務院的會議是要落實政治局會議的決定，可是事實却相反，這次會議作出的決議的調子和政治局會議處相左。

在價格開放的問題上，國務院顯然在怠工，它把價格開放當成「五年或更長一點時間才能努力達到的長遠目標」，而今年下半年新的調價措施不出台，亂漲價者要嚴勵追究責任。一九八七年以來，中國的經濟形勢無疑是十分險峻，針對這種形勢，政治局和國務院分別採取的是兩種不同的戰略思想：政治局的辦法是「導」，衝過物價關，將經濟引入市場軌道；而國務院的立場是「堵」，壓住物價上漲，求得眼前安寧。

以趙紫陽爲首的激進改革派雖然在黨的會議上佔優勢，可以通過一些有利的決議，可是政府部門現在掌握在李鵬、姚依林等爲首的緩改派手裡，你通過的決議他不給你執行，等於一紙空文。

自從趙紫陽被削掉過問政府事務的權力之後，他不但指揮不動國務院，連他自己的人馬也保不住了。他的智囊團個個人心惶惶，紛紛出國自尋出路。現在「體改所」的精英們提出的口號是「十年土插，十年洋插」。在緩改派和趙紫陽周旋的同時，保守派元

老也在背後插刀子，他們知道，只要鄧小平在，辦倒趙紫陽也不容易；於是開始「清君側」，目標首先指向趙紫陽的首席智囊鮑彤，爲了保住鮑彤，趙紫陽不得不棄卒保車，拋出三個「問題」人物：嚴家其、于光遠和吳明瑜。幾個月前，嚴家其還曾跑到美國風光一時，在講演中規勸留學生要當體制內的改革派，並以自己的政績而沾沾自喜。可是最近他已辭去政治所所長的職務。他嘴上說是打破「終身制」，可是心裡的苦水只能往肚子裡嚥。除此之外，趙紫陽身邊的兩個親信、一個生活秘書、一個機要秘書也以洩露機密過失而調離。

趙紫陽身爲黨的第一把手，不但指揮不動國務院，連自己的人都不保不住，難怪他要發牢騷說：「我也沒有權，權都上哪去了？」

中央政府管不了地方官

令行不止不但表現在中央內部，而在中央和地方的關係中更是變本加厲。

過去中央政府的財政投資佔總預算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財大氣粗，所以地方紛紛伸手要錢。要錢就要聽話，所以中央政府有權威，令行禁止。可是隨着這幾年讓利放權，中央的投資已降到百分之二十左右的比例，現在是地方財大氣粗，中央反而要向地方借錢了。要掏地方的口袋，就不能得罪土地爺。能讓的讓光了，能放的放完了，手中的牌打光了，所以現在中央沒有權威，令行之後，地方不睬，毫無辦法。

中央三令五申要壓縮基本建設開支，可是今年上半年各地方的基建投資仍比去年同期增長百分之五十，各地區樓堂館所照建不誤，地方官心裡想：「用我自己的錢，又不向你要錢

，管得着嘛！」

以往共產黨的機器搞運動效率最高，現在這個效率也沒有了。去年「反自由化」文件一下，下面官員公開對抗，越是財大氣粗的地方越是對抗堅決。溫州地區的一個地方官說：「我們不反自由化，因為這裡沒有自由化；中央有自由化，讓他們自己反好了。」江蘇省某縣委書記忿忿地說：「我們要搞經濟，沒有那麼多閒功夫陪着反自由化。中央那般大員反這反那，那是吃飽了沒事幹撐的。」深圳、廣州有的領導人則公開說：「最大的精神污染，是官僚主義、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不是污染。」

過去中央大員到地方視察，趾高氣昂，可是現在要對土地爺恭恭敬敬。現在選中央政府的官也要差額投票了。投票的代表多是地方黨政官員，得罪不起。七屆人大上落選的多是地方上有爭議的人，得票最少的是朱厚澤和鄧力群。這兩人在改革和保守營壘中旗幟都是最鮮明的，在地方上表態最多，爭議最大。而沒有爭議的人，說話少的人得票高。所以現在中央官在地方盡量少說話，少管事，讓地方官供着好吃好喝就算了。既然上面的大員睜一隻眼，下面的土政策豈有不猖狂之理。

小官僚專制 辦事員威風

其實地方政府各級官員的處境也和中央大員們差不多。由於價格飛漲，政府衙門的工資不足以維生。爲了「增收」，各級政府都辦了很多官商，靠官商的盈利來發獎金。

中央三令五申要壓縮基建，地方政府也未必不想執行。可是基建項目大多是這些官商搞的，政府官員的獎金福利要靠他們，自然不敢得罪也不願得罪。

當然，要說政府一點權力也沒有也太過份。不過現在權力的象徵可不是誰有權下令發文件，這些文件沒有人執行只是廢紙，現在權力的象徵是實際管理功能的執行者，說穿了是辦事員。

要問權力在誰手裡，最清楚莫過「倒爺」。因爲他們要「倒」，就要打通關節，哪個關節，哪個關節最重要對他們來說性命攸關。他們不能尊尊佛都拜，只能揀最關鍵的拜，最有效利用他們手中的資源。許多個「倒爺」經過多少次撞板、摸索，最後得出的結論是：最有必要上供的是最直接的辦事員。有時局長、處長都白供，因爲他們不會親自處理，下面人總有辦法拖。而只要把辦事的人供好了，調動了他們的積極性，他們會替你打通上面的關節。事實證明自下而上地打通比自上而下地打通效率高得多。

在飛機場，你若想買到機票，打通航空局長不如買通售票員；在商場，你若想得到緊俏商品，買通經理不如買通售貨員。一個出租車司機，車上必須備幾條好煙供交通警，否則動不動罰你個百八十塊，而這些好煙又是從交通警察那裡買來的。現在的中國是每個人手裡都有點權，最時髦的口號是：權力不用，過期作廢。

香港新華社社長許家屯一次乘中國民航飛機。由於級別高被優待先登機，結果被乘務員冷落一頓，趕下飛機。後來他告到民航局領導，可是對方把手一攤，無可奈何。

廣東省電力工業總公司委託上海電機廠製造一台發電機組。當所有部件加工好後，組裝那天，全體組裝車間的工人在車間主任和班組長帶領下，集體罷工。開工的條件是每人發五百到八百元獎金。廠黨委立即召開緊急會議，

最後無可奈何，宣佈投降，答應職工條件。

今年八月，武漢一家報紙刊登了重慶市委書記和一個「倒爺」的對話。那個倒爺公開對書記說他可以壟斷重慶市的銅材交易，你市委書記也沒辦法。物資管理部門的所有環節他都可以打通。他一年可盈利一百萬，用於打通環節的錢二十萬。

錢和權都上哪去了？回答是：被分光了。人人都預感到這條船快沉了，每個人都要拆一塊板活命。當人們覺得船要沉了的時候，船長的權威還值幾個錢？

方勵之被禁出境

最近，方勵之被中國科學院告之，他已經被取消今年十二月到美國德州、科州和加州參加一系列學術活動的許可。

中共官方指責方教授在訪澳回國途中未經中共當局許可訪問香港，並散布謠言，引起一些領導人的不滿。據說鄧小平對方勵之說的「很多中共領導人在國外都有存款」極爲不滿，命喬石在法院起訴方造謠誹謗。方勵之表示，他不怕打官司，若他真被起訴，他將應戰。

方勵之對記者說：「不准他出境的決定不符合學術自由的精神」。他沒有料到會發生這種事，他認爲他在香港說的每一句話都是在國內已說過的，而他沒有發表任何違反中國憲法的言論。

海外華人普遍感到，方勵之被禁止出國，表明了一個不祥的跡象，說明中國大陸的政策又要收緊了。聯繫最近發生的一系列事件，如凍結物價，槍斃「河殤」，人們心頭又蒙上陰影。顯然，保守勢力又占上風了。

北京的紅燈區

燕京客

色新聞發生了；一幕幕僱有安徽姑娘的家庭夫婦不和，吵鬧離婚的事情發生了。更有甚者，這批不甘寂寞的安徽妞兒，公然在街上兜客，進而聚結鬧市。

紅燈特區·深圳模式

北京東城建國門內，保留有一座古觀象台，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一。建國門新建了一座立體交叉橋，建國門橋外，就是北京的外交公寓，使館區、友誼商店和大型賓館雲集。

安徽姑娘們發現，古觀象台下，恰似南國門戶的深圳，他們在這裡，開一個「特區」也可以「搞活經濟」。不知是有人倡議，還是自然結合，漸漸古觀象台下的後花園，成了安徽姑娘和北京尋芳客的交易場。

古觀象台下，建國門大橋是西南北的交通要道，車水馬龍人來人往。很快，這裡就像北京新開闢的農貿市場、花市、鳥市、古玩市一樣，安徽姑娘們操起了最古老的行業，在這裡開設「人肉市場」，轟動一時，有市民說：過去唱紅燈記，現在唱「紅燈區」囉！

按時開市·當場領人

老北京人，過去僱用河北省三和縣女傭，素有「三和縣老媽子」之稱。近年，則改用安徽姑娘做女傭，於是大批安徽姑娘，湧入北京。一九八五年，青年演員李羚主演的電影「黃山來的姑娘」，就是寫純情的安徽姑娘進京掘金的故事。那是三年前的情景。現在，風景如畫的黃山來的姑娘們，却在北京，演出了另外一種「詩情畫意」，純情的安徽姑娘，變得越來越多情。本來嘛，年輕姑娘，有的是青春和活力，再加上，她們發現勾引男主人，可以帶給她們更多、更實際的收益。於是，一樁樁桃

每天都有人從京城的四面八方，聚集而來，大批安徽姑娘也依時開市。人們在這裡「看辦」議價，交易成功，當場領人。當然，北京不能像世界紅燈區那樣，公然掛牌上市。表面形式人們遠道而來找「女傭」，實際內容雙方心知肚明，不少外國人也聞風而來「找女傭」，黃山姑娘不論民族、膚色，同樣接待。公價「全日工」（即一日全套服務）人民幣十元

；「月工」面議。不同的是，中國人收人民幣，外國人和香港客收取外滙兌換幣券，至於服務優乘的酬勞，打賞則是雙方另議。

這個「人肉市場」很快傳遍北京，真假人各，看熱鬧、好奇的紛沓而至，一時好不熱鬧。

據傳，也有不少貨不對辦的事發生。有一位中年王老五，難耐孤寂，到古觀象台人肉市場，選中一位「女傭」，雙方以「包月」的形式議價成交，帶回家中服務。黃山姑娘住滿幾天，摸清了情況，把王老五家中席捲一空，揚長而去。該位仁兄受騙上當，又不敢報案、張揚，只得心中暗暗叫苦。後來越想越氣，再去人肉市場尋人，明查暗訪多日，都沒有遇到那位姑娘，一日恰巧遇那位姑娘的女友，才找到事主，追回部分失物。

盲目抓捕·累及無辜

俗話說，「樹大招風」，此事馬上驚動了北京市公安局。七月中下旬，公安局東城區分局，在朝陽區分局配合下，對古觀象台人肉市場兩次採取了圍剿行動。公安幹警和便衣幹警，事先埋伏在古觀象台四周，一聲令下，同時出動，收網拉人。行動時間，凡古觀象台下人群，包括來往行人一律抓捕。用警車拉往一地集中，先抓再問。據說，兩次大行動共拉了三、四百人。其中一對不知內情的戀人，在公安局採取行動那天，正在古觀象台下相約談情，也被當作目標人物拉進了公安局。審問之下才真象大白，那位正直的女青年，知道了捕人真情之後，羞得大哭大鬧以示清白。後經男友苦苦相勸之下，才自認倒霉，離開是非之地。

一個「倒爺」和市委書記的對話

毛石

中國大陸最近流行一句順口溜：十億人民九億倒，還有一億正在找。「倒爺」已經成爲當今中國經濟生活中一個熱門的話題，那麼倒爺都有些什麼「訣竅」呢？

今年八月十三日，重慶市市委書記蕭秧和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倒爺」進行了一次對話，我們可以從中得到一點啓示：

書記：你都倒些什麼？

倒爺：我倒彩電。

書記：那你怎麼把彩電從工廠拿出來呢？我知道重慶市工業企業上半年生產彩電七萬台，可市工業部門只得七百台，百分之九十九大概都被「倒爺」拿去了。

倒爺：我可以打通各種環節。

書記：打通環節的價錢如何？

倒爺：要在前幾年，幾百元就可以打通，後來漲到千把元，現在又漲了，不過有個上萬元，任何環節都可以暢通無阻，而且全是合法的。

書記：那麼你打通這些環節的成本在你賺的錢的比例如何？

倒爺：這一成本最多佔百分之十一百分之二十，百分之八十一百分之九十歸我自己。在給關鍵人物錢時，只能單個送，不能當着別人面送，不能

集體送。送完後，彼此心照不宣，這樣事情就很好辦了。

書記：上半年，你個人賺了多少錢？

倒爺：除了上稅，我賺了一百萬元。

書記：那你打通環節的成本呢？

倒爺：不到二十萬元。

書記：賺了這麼多錢，你怎麼處理？

倒爺：我正愁沒地方存。

書記：你不是合法賺的嘛，怕什麼？

倒爺：我打算用來儲備緊缺物資和商品。

現在我正準備儲備有色金屬，而下一步就要倒這些有色金屬。我可以倒走你重慶的銅材，你信不信？別看你是市長，你守不住。

書記：我不是市長，改行當書記了。

倒爺：你呀，是什麼也守不住。

書記：你倒騰物資時運輸怎麼解決？

倒爺：沒問題，我們都是汽車運輸，根本不靠火車。打通火車環節目標太大，代價太高，抓住了不好辦。

書記：汽車你怎麼調得動？

倒爺：一個月兩條煙就解決了。現在汽車運輸容易得很，隨叫隨到。

這位蕭書記在這番對話之後，長嘆道：想不到若大個共產黨政府，在這麼大一個流通領

和尚与秃子对话

- 会念经吗？
- 不会！
- 能敲木鱼吗？
- 不能！
- 凭什么当和尚？
- 秃头！
- 怎么进来的？
- 后门！



域裡，居然解決不了這麼一部分與風作浪的人。他們破壞正常流通，破壞生產，抬高物價，阻礙了改革。而這類與風作浪的人還有「合法」的手續和理論上的支持，你說現在當政有多難？

不過筆者却對這段談話有相反的看法。令人欣慰的是這位「倒爺」竟然可以和市委書記平起平坐地談話，而且口氣甚爲「囂張」，市委書記對他毫無辦法。爲什麼？道理很簡單，他經濟上獨立，不必看着共產黨父母官的眼色過日子了。共產黨再也不是那樣無所不能，無所不管了。

「倒爺」這種現象是中國改革出現的特產，他的非議論，還有待時間去解決。

並非小道消息

晨報

魏京生檔案裡的材料

衆所周知，魏京生被判罪是因為他在民主牆的活動，可是宣判書上的理由却是出賣軍事機密。這個大冤案竟然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製造的，更滑稽的是，連那個被出賣了情報的當事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也不承認魏京生這一「罪狀」。

據知情人士說，直至今天，魏京生的檔案裡還夾着一張總參部寫的證明，證明魏京生對外國記者講的東西不屬於軍事秘密。可是這份文件竟被審判者束之高閣了。魏京生是自己為自己辯護的，沒有律師，他自己當然不會知道有這份文件。

魏京生的父親是個軍級幹部。魏被捕後，他去找了總參，要求澄清事實。可是總參寫的證明材料一直默默地躺在卷宗裡。事實勝不過鄧小平的意志。

盛傳總書記祖墳被挖

最近，國內盛傳一條爆炸性新聞：趙紫陽

在河南老家的祖墳被怨怒的民衆挖了。裡面的遺骨無影無踪。趙紫陽得知此事大為光火，連日大發脾氣，痛罵當地無能的官員。

國內現在謠言滿天飛，小道消息盛行。以上消息無法證實，不過很多小道消息雖未必確實，但反映了群衆的心理。自八〇年以來，趙紫陽可以說是中共中名聲最好的領導人了。即使這條消息不屬實，可如果人們連趙紫陽的謠言都造到這樣程度，對中共政權的失望、怨氣就可想而知了。

湖南發生農民「秋收起義」

不久前，湖南汨羅縣農民爆發大規模暴動。上千名農民包圍縣委縣政府，縣武裝部企圖組織鎮壓，後農民攻克縣府，將縣武裝部繳械，扣壓全體人員。

省政府派員前去調解，但談判不成。後來調軍隊包圍了造反的農民，發出最後通牒，要求釋放人質，否則就要動武。農民與軍隊對峙許久，最後釋放了扣壓的人員。

這次農民暴動的原因是農民對政策不滿。

一方面農副產品價格不動，另一方面化肥、農機等價格猛漲，生產資料掌握在「官倒」手中，由他們任意支配、任意抬價。農業生產的成本大幅提高，但收購價格却被壓住，逼得農民忍無可忍，挺而走險。

人民需自衛，政府做何用？

最近，北京電視台出了個聳人聽聞的報導。北京郊縣一個農民被犯罪分子勒索。第一天，四個土匪闖進他家，勒令他交出×千元錢。他們聲稱已對他的財產作過調查，認為他完全有能力交出這筆錢。他們揚言第二天要來取錢，若沒有錢就要他的命。

該農民四處求助，仍無辦法，最後決定自衛。第二天，他找了桿土槍，埋伏在家裡。當那四個土匪來取錢時，一個被打死，另一個被打傷，剩下兩個落荒而逃。

電視台表揚了該農民的勇敢，並號召大家像他這樣敢於自衛，與犯罪分子作鬥爭。人們不僅要問：如果每個人都需要用槍來自衛，那麼還要政府和警察幹什麼？難道國家機器僅僅是用來鎮壓人民的嗎？

大陸高校改革之怪現狀

比爾

大陸的經濟、政治改革正邁著沉重的步履

處於艱難的徘徊之中。這種現狀，不消說我們在海外呼吸著自由空氣的中國人都看得清清楚楚，即使是仍然處於思想高壓之下的大陸民衆也幾乎人人都能感受到。如果你去國內與人聊天，肯定會經常聽到這麼一句對「改革」現狀的牢騷：「總歸搞不好了！」那麼，恐怕是我們留學海外的大陸學子最爲關切的也是這些年來被大陸輿論稱之爲事關「提高民族素質」和「西化」大業之關鍵「的高等教育改革現狀又是如何呢？我這個剛到美國不久的大學講師大概也只能找出這樣一個最簡單的概括：在這麼一個國度裡，靠這班教育界的官員，按照現行的政策，「絕對搞不好了！」然而，說出這麼一句話，對於持J——簽證，十之八九要回國，而且肯定要在大學裡耗去一輩子精力與時間的青年學子來說，心中的淒涼是難以形容的。中國的知識份子到了美國後，再PRAGMATIC，恐怕也難以根除傳統的「唯有讀書高」的價值觀念。現假「中春」篇幅，向諸位同學作個大概的介紹。我臆想，對這個直接關聯到我們將來的實際處境與我們自身價值的大問題

，沒有人會真的不開心的。

政治改革：

等於黨委書記變教授

如同一般企業和單位一樣，現在的高校也搞什麼「政治體制改革」。不過，生活工作在高校的書生們，並沒有感覺到周圍有哪些會提起你精神的「體制」上變化。每星期五照例「做禮拜」（即政治學習），決定一切事宜的也仍然是那麼一班既不能教學更無能力從事科研的官員。每天看到的也只是那些政工或行政幹部忙忙碌碌地開會，「研究」各項「改革」問題。然而，若細細地觀察政情，就會發現惟一的一個大變化，即那些官員們確實幹了「改革從自身做起」的實事——搖身一變，都成了有學術職稱的「教授」「副教授」。這種令我們書呆子瞠目結舌的變化，在大陸被稱之爲「政治思想工作的學術化和專業化」，即，向人傳授「共產主義美妙理想」的「政治思想工作」也是一門「科學」，而且還有着高深的「理論與實踐問題」。於是乎，黨委書記、副書記都

掛上了「教授」頭銜，系處一級的書記稍低一些，一般掛「政治思想工作」或「共產主義道德品質教育（根據是否給學生上「思想課」而定）副教授的頭銜。

評定這類職稱，其標準不是什麼有多少「學術化」的研究，更不是某一專業領域的成果，全憑「革命資格」和「黨內級別」。如筆者所在的大學，正書記大概連一張正規的高中文憑都沒有，至於其文化（不能用「學術」一詞）程度，恐怕是寫一封千字以上的信都難以保證不出語句上的毛病，現在却照例掛上了正教授的頭銜。如果他在社交場合自我介紹時不用頭銜前的「共產主義道德品質教育」這個定語，人們或許會真的以爲他是個「大學問家」哩！

那些專職的「政治輔導員」，也都「評」上了「講師」或「助教」職稱。即使爲體現「精簡機構」、「提高辦事效率」而撤消的「黨委宣傳部」，現在也改成了（有的院是合併進了）「共產主義道德教研室」。其功能和作用，恐怕比以前更加强了。因爲現在的大學，除了原必修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

學」、「中共黨史」和「國際共運史」四門政治理論課外，還多出了一門「共產主義道德教育」。這門必修課，其「成績」好壞與否，將是決定你在大陸中國式的「政治鑒定」的主要標準。

筆者始終搞不明白這種「改革」對應以提高等教育質量與科研水平為主要目標的高等院校究竟有哪些實在的意義。然而，如果撇開書生迂見的話，就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既然政治改革是以提高行政效率（在大陸被稱之為「辦事效率」）為中心，那麼，對於極為敏感的當代大學的思想控制，理所當然地要首先加強了。這也是為了「四個堅持」和所謂的「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在黨的領導下進行」。在另一方面，給政工幹部學術職稱也是為了保護這一層次的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有了「高級知識份子」一類的頭銜，「尊重人才，尊重知識」嚷嚷得再多，也少不了這班官老爺的待遇。而且，與一般純學術的教授、副教授不一樣，他們還有「行政級」，這樣，分房子、加工資、分獎金以及其它種種名目的「知識份子待遇」，他們還是比真正的學者高出一等。所以，現在許多青年教師都認為，要麼出國，要麼削尖腦袋「從政」，只有傻瓜才會拚命三年五載去拿個博士。「從政」既輕鬆又實惠，而且照樣有「受人尊重」的頭銜。

熙熙攘攘皆為利來：

「創收」是頭等大事

一九八五年，「公司風」風靡全國，各大學也競相成立了各種各樣的「公司」。後來，「公司風」被禁止了，各大學的公司也相應改牌子為「科技服務處」，繼續幹買賣勾當。由

於這個機構搞的是賺錢行當，所以它幾乎與人事處一樣擁有很大的權力。北京的國家教委為解決自己實在缺錢撥給各學校的窘境，幾年來也多次的發文鼓勵各校「創收」（即賺錢）。絕大多數的學校已都把「科技服務」的「創收」當作「堅持黨的領導」以外的最大任務來抓。那些官僚們，尤其是已取得學術頭銜的政工幹部，幾乎人人熱衷於「創收」，因為他們憑藉著頭銜、「行政級」以及所掌握的權力，可以優先從「科技服務」所得中撈到大量的好處。

所謂的「科技服務」包括了三方面事務：一、純粹的買賣，利用學校的各種關係以及似乎可以信賴的「清高」牌子做掮客，從鋼筋水泥到T恤以及女人用的絲襪無所不幹，只要能賺錢；二、出售學校的科技成果給工廠農村，但這方面的事務除了交大、同濟等少數工科院校外，一般大學很少有這方面的收入；三、出賣文憑，即辦各種名義的計劃外的教學班。

這些年來，大學的熱鬧場面幾乎全靠「創收」維持着。校慶時，供應免費的午餐；每半年有一次「科技服務費」發放；逢年過節時，整車整車的雞鴨會運進校園免費發放；至於官僚們化公為私的各種「招待」，更是天天有。所以，搞「創收」沒人不歡迎，對從校一級的頭到小小科長利用權力中飽私囊的現象，教師們似乎也特別能容忍。那些官僚們抓「創收」權，如同抓「政治」、「思想」大權一樣緊握不放。因為前者可以保住他們取得各種利益的基本前提以及滿足他們的自尊心，而後者則可以直接獲得大量的好處。對現在搞「創收」的官僚們說來，每日一席飽飽口福只能算小意思，他們更關注的是多於工資幾倍十幾倍的以「

創收主要貢獻者」為名義的「按比例提成」。這種所謂的「主要貢獻者」並不意味着他真的為此作出了精神與體力上的貢獻，而是批准蓋章拍板「權」的貢獻，他可以一點都不做什麼，「權」會為他貢獻一切。其撈取好處的途徑與手段也是五花八門，樣樣都有，諸如：「不開發票」、無中生有地編造領款人名單，等等。一般教師無「權」，只好可憐巴巴地盼望分一些剩菜冷羹。

比買賣出幹得更多的「科技服務」是辦各種各樣的教學班。就筆者所知的上海十幾所大小不等的高校，辦班收入最少也有五、六十萬，多的則要超過二百萬。為了盡最大可能多收「創收班」，各校都想盡辦法減少「國家指定」的招生指標。其理由不外乎是「師資不夠」、「設備不足」或「房子不夠」。但在尋找「創收」學生時，再多也覺得少。如筆者所在的大學，「創收班」的學生現已超過學生總數的三分之一，可校方還想挖潛力擴大招生。

「創收班」的實質就是出售文憑。招生的時候沒有入學考試，或是象徵性地過過場。生源多半是落後地區官僚們的後代。執掌那些地區的官員，他們肯簽字撥款付高額「培養費」，還不是圖個「在向『四化』進軍的年代中，我等不要落後」。若強調學生素質，豈不斷了財路？大學的官僚們對這點看得很清楚，再則他們也深深地了解在中國「學而有術」和「不學無術」區別的真諦。至於入學以後的教學質量，那只有天曉得了。筆者去年教過一個「創收班」，學生素質之差令人難以想像，但管「創收」的書記却再三地關照：「不能有一個不及格，否則人家以後不來了。」當然我也知道，此時此刻堅持我的書生迂見也沒用，因此，糊里糊塗混了一年，兩次期末考一過，皆大歡

喜。

「創收至上」的觀念已滲透到了高校的每一個角落。甚至一向靠教育經費補貼支撐着的出版社和學報，在一手拿補貼的同時，又一手大搞純為掙錢的「創收」。這些出版機構往往都是變着戲法出版從「幼兒英語入門」到「老人食譜大全」等各種銷售大但與學術出版機構名份毫無關聯的書。然而，所賺的錢却與出版單位的正常業務無關聯。所以，現在大陸大學出版界有個很奇怪的現象：拚命賺來的錢不少，但好多有學術質量的研究專著却因要賠償的經費無來源而無法付梓，學報的稿費也因「經費緊張」而無法隨着物價普遍上漲同時有所提高。

大學畢竟是大學，總有不少正正經經的學問人。可是，面對着這般絕對不能算資本主義的時風也無可奈何。我等書生，有時真有一種感覺，我們不是身處於一個神聖的學術殿堂之中，而是生活在一個不倫不類的「公司」之中。

這裡也要補充說明，不要以為大學搞了那麼多創收，書生們的生活境況會得到不少改善。在大陸的高校中，「科技服務」得來的錢，除了有「貢獻於」「創收」的官僚以各種獎勵名義提走一部份和在送往迎來過程中花掉一部份外，真正分到教師們手中的只是很小的一部份。因為，北京有規定，不能多發獎金，否則要罰很重的稅。這種政策可能是為了控制通貨膨脹。對官僚們說來，反正口袋裡已裝進了錢，連「上命」也就沒必要了。在他們的潛意識之中，似乎還更願意遵從上命。因為他們可以根據「文件」找理由蓋房子。分房子時，依據的又是「級別」。這樣，要「離休」的官再多，現任的官胃口再大，也可以理所當然地得到

滿足。「創收」歸根到底還是「權力所收」。古代社會的「天下攘攘皆為利來」，在今天的社會中，已變成了「照照攘攘皆為『權』來」。

「副教授多如狗，講師滿街走」

「副教授多如狗，講師滿街走」，這句對高校職稱現狀的牢騷話，在上海各高校青年教師中流傳甚廣，其對高校職稱評定中的一片混亂狀況的形容一點都不過份也不刻薄。

「學術職稱」，顧名思義應是按照實際的學術水平和所取得的成就給予的學術級別和稱號。但是，號稱在「改革」中的大陸高校却是一片混亂。如前所述，那些純粹吃共產黨政治飯的人都一個個掛上了學術頭銜。即使是那些從事學術者的職稱評定，現在也是一片混亂，有根據與當權者關係親疏而定的標準，有年齡大小的標準，還有退休照顧的標準，甚至還有參與「創收」而獲得功勞的標準，當然，所有這些標準都有個「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基本標準作為前提。反正，掌權者在背着人開會決定職稱名單時，什麼標準都會考慮，就是沒有「不管其它一切，惟學術至上」的標準。

更使我們感到驚奇的是，不管私底下定的是什麼標準，在名義上却都有一個響當當的「學術合格」的結論，即使是沒一本書出版或沒一篇像樣文章，到時候也會像變戲法似地變些玩藝兒出來。「改革」越是深入，這種戲法也就愈演愈烈。倘若仔細觀察提升為副教授的途徑，至少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高知」是這樣產生出來的：

一、神通廣大，仗勢豪奪。這類人本身並不是當政者，但他與當政者有着特殊的關係，

即使再無能耐，也能在競爭中穩操勝券。上海某大學一個並不公開發行的學報曾經幫助過這樣一個「副教授」。他寫了一篇像黨報社論一樣的文章「整風是無產階級黨建設的好方法」。編輯部討論以後認為通篇像共產黨組織生活中的發言，實在無一點學術氣，所以不準備發表。後來他所在系的黨總支出面同編輯部黨支部交涉，理由是「該同志辛苦教了幾十年書，就寫了這麼一篇稿，應該按照職發表。」這種交涉是「黨內同志」間的互相聯繫，結果當然可想而知，黨又是決定一切的，理所當然的決定這篇文章是否發表的標準就改變了。出乎編輯部意料之外的是，該篇剛剛發稿，系總支就打了電話，催要校樣，原因是「該同志正在審報高級職稱，此文要作為代表作送交專家審定。」人們都不知「專家」是誰，反正最後的結局是，這篇毫無學術味兒的文章變成了「有相當的學術見地」，足以證明其具有副教授級的「學術功底」——一個「副教授」誕生了。

二、功夫全在學術之外。前一類「高知」只是學術能力低下而已，他們畢竟還在幹着教學工作，事到臨頭，也拿出一篇文章來裝模作樣。這類功夫全在學術之外的「高知」，完全沒有任何具體而又明確的身份，他們的工作也不在「學術」系列之內，却照樣能變成「高資」。筆者認識這樣一位「法學副教授」。他在一個無法學系的大學工作，所從事的也不是什麼法律工作，他只是為想了多賺些錢，兼了一個區的律師事務所律師而已，至於所謂的學術更是無從談起，一篇像樣的文章都沒有。但是，他有一位當「文化大官」的親戚，只有一封信，一個電話，就讓他變成了法學「高知」。



又如上海某大學一位管勤的副校長，只有初中文憑，實際的能力是連具體的會計賬都不會做，可他也在「改革」的浪潮中搖身一變為「高級會計師」。這種變化實在太大了，小百姓們紛紛表示不滿，有人還聯名「上告」，但這又有什麼用。據說當副校長的「管理資格」——「可以作為學術能力」的「變通條件」——又是一種「以仕代學」。

三、求爹拜娘所得。這些高知比較前兩類似顯得有些可憐。他們往往以「年紀大了，不升高級職稱，工資、房子都無法解決」等等理由像乞丐一樣地同編輯糾纏，直到發表一篇所謂的「代表作」為止。然後再以同樣的方式向為政者施乞求。反正中國的文化永遠是「以柔克剛」的文化，乞求的次數多了，自然會有效果。手掌國家大權的人都可以不憑真能耐，一個空空洞洞的副教授牌子又算得了什麼。評委會的專家們閉着眼睛學了鑒定，當權者則在心理得到極大滿足之後劃上了圈圈。這類可憐巴巴的副教授在大陸也為數不少。

當然，中國的大學也不乏有真學術水平與成就的優秀學者，但他們不會超過「高知」級的三分之一比例。現在大陸學術界普遍認為「文革」後入學留校的青年教師的實際學術水平和能力以及外語程度，都要超過六十歲以下的所謂「中年一代」，可他們中間被提升為副教授的「破格者」不會超過過百分之十。

筆者由於經常寫稿的緣故，認識不少編輯。在他們那裡，「斯文掃地」的事情可是太多了。平時一向與編輯無緣的人，會在評職稱前夕糾纏得你頭昏腦脹。可是支撐雜誌門面的稿件，却大部份出自既非滿街走，也非多如狗的小助教之手。

職稱評定如此混亂，使得人們都無法搞清什麼是「教師素質」，又是什麼決定着學術的標準。筆者在屢經波折最終拿到護照之後曾公開發過牢騷：等我們拿了博士學位回國後，看你評不評我為教授！此話後來傳到了一位正在為正教授職稱而奔波的系主任耳裡。他的回答夠惡狠狠的：「真是狂妄至極，就算你們有水平，別忘了你吃誰的奶長大的。」「餵你奶的人還沒升教授，你還想做夢！」他的話足以代

表那個環境中的主導力量——嗚呼，我們這些在新大陸辛苦地奮鬥着的學子。對我們來說，這不僅僅是個什麼「頭銜」「價值的肯定」之類的問題，更重要的是生存所必需的工資、房子甚至學術研究條件，都將受制於這個「職稱」問題。筆者在出國前已經得知，國家教委已經決定，根據是否「重點」，確定各校高級職稱者的比例。按照他們的劃定，各大學的比例數都已超過規定，復旦、交大學生學校超得更多。國家教委的文件又規定着，如果編制已滿額，既使符合條件，也不能提升。擺在我們面前的現實是，「奶媽」如此之多，而且他們又屬「年富力強」之列。我們回去以後怎麼辦？

變化中的學生價值觀：

讀書越多越倒霉

除了一些重點大學以外，為數衆多的一般院校現在普遍地存在着新的讀書無用論。學生們認為，讀書不會帶來什麼，苦幹四年，弄個七、八十元一個月的鐵碗，這只是連起碼的閱讀和書寫都不行的個體戶的一天收入，即使是工廠裡的工人，獎金實惠也是書生們不敢奢望的。一方面是虛幻的理想主義已經不復存在，另一方面又是像沙漠一般的淒涼瑣瑣與能想像到的未來，很自然的在當代大學生中產生這樣的共同的觀念。所以，在一般的院校，七七、七八級那種書生意氣再也見不到了，就是重點大學也在每況愈下。筆者的專業屬文科，近三年來沒見到過一篇像樣的畢業論文，即使「滿紙抄來」，結構上也往往會有牛頭不對馬嘴的毛病。

現在校園內有開設的咖啡館，從中午到半夜，幾乎座無虛席，令人煩燥的迪斯可音樂打

老遠就能聽到。每天晚上，總有一兩個由教室改成的舞廳開放着，學生們不跳到熄燈時不會罷休。大學本身在拼命搞「創收」，學生想小的撈撈似乎也是合情合理的。白天你可以經常見到學生們擺設的小攤，錄音帶、書、T恤和時髦衣服等各種各樣的玩藝都有。不知他們是從什麼地方弄來這些貨物，更不知他們有無許可證一類執照，但校方是默認的，只要不搞政治思想上的「自由化」，不上街遊行就行。另外，校方還可以從學生經營的各項商業活動中收稅，這也是學校「創收」的一條渠道。八十年代初，我們七七、七八級同學在燈火通明的教室裡伏案疾首的一番景象，現在在逐漸地變成「鴛鴦樓」，男女同學談情說愛的場所。

我們的教師都認為，看絕大多數學生腔調，恐怕在入學之前就不會想過要好好唸書。可能是傳統的「唯有讀書高」的價值觀念在其父母一代身上還起着作用；也許是現在當個體戶也沒那麼容易，當了也不一定發財；或許又是待業青年太多，找工作也不那麼容易等等因素，使得大學每年還能完成正規的計劃招考指標（非「創收班」），否則，我們懷疑生源大概也會有問題。

然而，作為高級專業人才培養途徑的研究生教育就明顯得不景氣了。這幾年，一般院校的普遍情況是，報考的人數還沒有招生的名額那麼多，那就是不管是否達到標準，全部都收進去也完不成招生計劃。重點大學的情況好一些，但比例數也在急劇下降，那種報名處前門庭若市的景象已經「黃鶴一去不復返」了。當然，研究生招生情況的變化與大陸留學生政策的變化也有關係。

筆者以為，我們難以責怪學生不願唸書，因為我們這些清貧書生苦苦掙扎的現狀是學生

們自我辯解的最好理由。筆者就會被學生這樣反問過：「X老師，像你這樣有研究生學歷，又是個講師，也有辛辛苦苦寫出來的著作，可是，你有錢買你想要的書嗎？你三十好幾了，有結婚的房子嗎？有足夠的錢買你的結婚傢俱嗎？」這些都是一針見血的實話，除非是孔己或范進，否則絕對說不出酸溜溜的違心話。當然，作為一個書生，一個昔日的中國大學生，我實在不敢相信比我們年輕十幾歲的一代真的是「不思上進的一代」。我認為，他們的消極是一種對徘徊不前的社會改革現狀的悲觀失望的集體無意識。對他們來說，包括鄧小平許諾的到本世紀末過上「小康生活」的「四化」近景與「遠大的共產主義前景」已經失去了魅力，但是，他們渴望創造新生活的生命力却又被這個僵化的社會嚴重地壓抑着。近年來，學潮迭起，學生們騷動的情緒十分明顯，這則是同一種意識的另一件表現。

出國：

是「放洋、上山、下海」中的上上策

近兩三年來，上海的青年知識份子中流傳着這樣一句話，當今時代，出路只有三條：「放洋、上山、下海」。「放洋」即出國，或留學或移民甚至當勞工；「上山」即從政做官；「下海」則是扔掉鐵飯碗，辭職當個體戶去。在這三條「出路」之中，公認的最佳出路，也是最少小媳婦式的煎熬折騰要數「放洋」。

「放洋」已是當今中國青年知識份子最佳的「拼搏目標」。筆者所認識的朋友同學之中，沒有不想出國的。在筆者以前工作的大學，理工專業的青年教師至少有五分之四在找出國門路，準備托福考試，文科教師中稍有英文底

子的也無不為之傾注全力。在學的研究者，以托福為主的英語學習是他們自己訂訂的最重要的課程。談論出國事宜也是教師與研究生集體宿舍中最熱門的話題。為了有機會出國，時常有辭職，放棄研究生學業等各種各樣在幾年內屬於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相當部份女學生甚至一些青年女教師公開地宣佈，非「外」字號的不嫁，有了「外」字號，即使大十幾歲二



十幾歲也無所謂。筆者剛到美國不久，遇到一位四十歲還未成家的老同學，他向我展示了一大疊從國內寄來的搔首弄姿的女孩子照片。聽他介紹，她們大多數有大學學歷或正在唸大學。這位老同學出國已六年，似乎已不太了解國內的情況。他有些大驚小怪地問我：「我在國內時，三十好幾無姑娘看中，怎麼現在會有如此桃花好運？」然而，這對一個剛到美國不久的留學生來說一點也不奇怪，哪怕你是大麻子，生理有缺陷的，只要你在美國，照樣能碰上這樣的桃花鴻運。

美國是「放洋熱」中的最熱點。但來美國沒那麼容易。所以，這幾年來，不時地流行着各個國家的「熱」。二年前，「澳大利亞熱」瘋狂一時，人們紛紛議論，澳大利亞有個什麼建國週年大赦，要批准一大批移民。最後弄得澳大利亞領事館也不得不學一學中國的方法，在大門口貼出特大「闢謠」告示，再三解釋根本沒這回事。接着，去年又開始了「日本熱」。去日本遠較到美國澳洲容易，只要交十幾二十幾萬日元，哪怕你連假名都不認識，日本方面的語言學校也會為你辦好包括簽證在內的所有手續。因此，突然之間的，在黑市市場中日元猛漲，外灘中國銀行前幾乎天天有通宵排着的要郵寄「學費」去日本的長隊。筆者在出國之前已目睹了兩個多月，凡日本領事館辦公的日子，大門口總有一百多米長的等待領取簽證的隊伍，其中相當部份人是通宵排隊，猶如搶購緊張商品一般。公安局也不得不派出警察日夜值班維持秩序。隨着出國「熱點」的變化，各類語言進修學校也不斷地作出調整。這類學校似乎也成了「熱點」變化的預報站。筆者有位親戚在上海外語學院工作。據他介紹，德語和義大利語專業的「辦班」生意開始好了，問

津的人越來越多，所以上海外語學院估計下一個浪潮是西德和義大利的留學熱。不過，最近兩三個月，上海又掀起了「加拿大熱」，國內朋友來信說，去加拿大的手續像去日本一樣方便，所以人們又湧向了那裡。

總而言之，只要不是中國大陸，中國的青年知識份子就心嚮往之。

在出國熱浪的影響下，學生們更無心思學好專業。那些出國有些希望的學生，上專業課總想逃學，但自己掏錢上的外語補習學校，却是風雨無阻，鏝而不捨。青年教師為保證自己有時與精力準備出國條件，也都盡量避免捲入科研項目。今年起，國家教委普遍地減少了各校的教育經費，據說目的有二，一是為鼓勵創收，另外則是估計到了現在的科研力量不足，打算省下錢等我們這批留美同學回去發揮作用。可是，這又是談何容易，如前所述，餵我們奶的人正當「年富力強」，在這個鐵桶般的封閉式社會中，我們這些「全盤西化」了的學子回去能發揮作用嗎？我們現在知道的就是已回去了的同學的三部曲：熱烈歡迎，捧得比天還高；接着確實是一些實際行動，諸如給兩間房，配幾名助手，給一些錢；但第三步，真的幹了起來，却處處受阻，那麼多的莫名其妙關卡最後還是使得你一事無成。

以上所述，就是「改革」中的大陸高校的現狀。可以肯定地說，國內政治經濟改革沒出路，「高教改革」將會更糟。因為，有了學術頭銜的官僚，他們的本能就是害怕發展學術，「尊重人才尊重知識」真的變成了現實，他們從何處去攫取利益。而目前國內的政治改革前途渺茫，經濟改革又是一團糟，「高校改革」勢必是搞不好了！

你想合法留在美國嗎？請找 律師 Roland Gell

專辦

H-1 簽證 工作許可 超速罰款
政治庇護 學生簽證 違章駕駛
婚姻案件 刑事犯罪 執照吊銷
遞解出境 意外訴訟 房屋買賣

請電話預約：

(212)619 5520

(212)619 2859

免費保密 諮詢

地址：299 Broadway Suite, 420, New York, N.Y. 10007 (Near City Hall)

哭黨



中華民族歷史上最大的悲劇已接近了它的尾聲。這個悲劇的主人公，是中國共產黨。

(一)

一九八六年夏，湖北省紅安地區，一輛吉普車被洪水沖進河中，九死一生的司機爬上岸向群眾呼救。可是當人們得知車裡的主人是地委書記時，他們的表情冷漠得可怕：「共產黨的幹部死了活該，我們不救。」紅安，這是個以出了二百餘名解放軍高級將領而著稱的「將軍之鄉」，是共產黨在第二次國內戰爭時期的老根據地，這裡的人民曾用生命掩護過共產黨人，可是今天却眼看著他們遭到危難見死不救。多麼嚴酷的轉變，前後不到六十年。

八十年代的紐約街頭，人們常可以看到以下場面：兩個海外華人為某事爭吵，惱羞成怒的一方指着對方的鼻子罵道：「你怎麼可以這樣蠻不講理，簡直和共產黨一樣。」嗚呼，共產黨竟然成了野蠻無賴的象徵。會幾何時，也是在這片土地上，多少優秀的中國知識分子放棄了優厚的生活環境毅然投奔共產主義的方舟。可是今天，共產黨的世界却成了人們心靈中的惡夢，留學、移民的人流譜出一曲「勝利大逃亡」。這一變化，前後不到四十年。

今天的中國大陸，是個怨聲載道的世界。人們對共產黨的信心一瀉如注。四十年前的那一幕在今天又重現了：貪污、腐敗、野蠻、無能……過去人們用於國民黨的詛咒今天甚至不足以形容共產黨。如果過去人們罵國民黨十官九貪，那麼今天他們罵共產黨無官不貪。如果說過去的官僚資本只有「四大家族」，那麼今天的官僚資本則不下「十大家族」。僅僅是十年前，一個人批評共產黨還需要勇氣，可是今天，一個人讚揚共產黨則需要勇氣了。

一個中國歷史上最強大的政權以無與倫比的速度衰敗了。這一切是怎樣發生的？

(二)

共產黨曾被形容為是洪水猛獸，天生的惡魔和劊子手。這是不公平的。共產黨人曾表現出來的理想主義、英勇無畏以及頑強的生命力是舉世無雙的。

這個黨，曾經有過多麼輝煌的歷史。她曾經被溶進了一個比她強大百倍而沒有消聲匿迹；她曾經經歷了一場無比殘酷的屠殺而灰復燃；她曾經在一場艱苦卓絕的長征中劫後餘生；她曾經在一場實力懸殊的內戰中所向披靡。

這個黨，曾經有過日昭中天的威望和力量。她的所到之處，曾經被鮮花和眼淚所包圍；她的回天之力，曾經和「說得到，做得到」的口碑聯在一起；她曾經令全國的知識界集體臣服，使他們在一場倍受屈辱的焚書坑儒運動後睡面自乾；她曾經讓億萬百姓俯首，使他們在一場二千萬人餓死，三千萬人失業的災荒中鴉雀無聲。

這個黨，也曾有過崇高的理想。六十多年前，當一群知識分子為她奠基的時候，誰也不會懷疑他們救國救民的真摯願望。當共產黨顯得十分弱小的時候，她的理想恰恰具有極強的生命力。她在圍剿、封鎖、咒罵中成長起來，從五十七人發展到四千八百萬人，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黨。可是當這個黨強大到令全世界發抖的時候，這個理想却死了。不可思議的是，連她的敵手都已放棄了消滅她的希望，她自己却病入膏肓了。

四千八百萬人，這是一支不可匹敵的力量。沒有人能戰勝它。有力量毀掉這個黨的不是別人，正是她自己。漢朝的賈誼說：「亡六國

者，非秦，乃六國也。」今天同樣：亡共產黨者，非他，乃共產黨人也。

爲了這個死去的理想和行將就木的黨，多少傑出的人爲之獻身：李大釗、瞿秋白、恽代英、方志敏……如果他們知道了今天的結局會怎樣想？是失望、是悔恨、是憤怒、還是沮喪？不，他們首先會問：爲什麼？

爲什麼？自毛澤東死後，這個巨大的問號懸在中國人民頭上已十二年之久。人們檢討了共產黨所做的一切，他們想解開這個問號，其中包括共產黨人中立志改革的優秀分子。

有人認爲，問題出在黨的綱領上，社會主義公有制是萬惡之本；也有人認爲，錯誤源於指導思想，馬克思主義當口誅筆伐。於是，改革的大幕拉開了，思想解放的號角吹響了，可是十年之後，人們發現他們是在和風車作戰，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在黨內根本就沒有人相信，包括她的領袖們：鄧小平、趙紫陽、胡耀邦。他們所幹的事情和共產黨宣傳的綱領、指導思想完全不相干（儘管打着這個旗幟），可是共產黨還是共產黨，悲劇還在繼續。

中國人之所以總跳不出悲劇的循環，是因爲他們總是把自己的目光集中在事物的內容上，而且總是忽略事物的形式。共產黨的悲劇不在於她做了什麼，而恰恰在於她怎樣做的。換句話說，問題並非出在她所做的事情本身是好還是壞，是正確還是錯誤，而是出在她幹這些事情的手段和形式是合理還是不合理。

在共產黨人的眼裡，不，在幾乎所有中國人的眼裡，事物都要被分成好的和壞的，正確的和錯誤的。而所有的政治活動都是爲了一個目標，就是要用好的去代替壞的，用正確的去打倒錯誤的。這種善與惡間非此即彼的對立，

深深地根植於共產黨人的理論，根植於中國的文化，這就是共產黨的悲劇的根源，也是中華民族悲劇的根源。

毛澤東在他的書裡寫的第一句話就是：「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敵人，這是革命的首要問題。」團結朋友去打倒敵人，團結好人去打壞人的命。這個邏輯對於中國人來說是那樣通俗、明瞭。可是人們却忽略了對「革命」或「打倒」這種手段是否必要提出置疑。

俄國布爾什維克在二月革命後的議會選舉中失利，列寧立即用兵驅逐議員，解散議會，發動了著名的十月革命。他的邏輯是：與其你專制，不如我專制。同樣，毛澤東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也可以歸納爲一句話：「與其少數人專政，不如多數人專政。」俄國人的悲劇與中國人同出一轍。兩個共產黨的病根是連在一起的。用好人專制代替壞人專制，用多數人專政，代替少數人專政，這個邏輯構成了共產黨人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基本思路，它是那樣簡單明瞭，人民相信了它，接受了它，然而他們自食其果了。他們只注意到執行專制的是好人還是壞人，是多數人還是少數人，可是却忘了對「專制」這種形式是否合理打一個問號。

在西方人眼裡，有一個道理是顯而易見的：一個壞的力量如果不足夠強大是無法維持統治的，而一個好的力量若強大到足以摧毀這個壞的力量取而代之，那麼它也會足以變得比前者更壞而令人無可奈何。

對於一個政治上成熟的民族來說，善與惡，好與壞只具有倫理上的意義而不具有政治上的意義。具有政治意義的不是各種力量的性質而是各種力量的均衡。一個事物即使是壞的人們也會自覺地維護它存在的權利，而一個勢力

無論它多好，只要它強大到足以形成壟斷，人們也會支持另一個弱小力量去制衡它。

美國人曾經爲是否取締黃色出版物而進行過激烈的辯論，最後他們決定讓它存在下去。因爲人們意識到，查禁黃色書刊會爲書報檢查打開一個缺口，而維護出版自由的大堤會因爲這一蟻穴而一潰千里；法國人曾經爲是否要獎勵對恐怖分子的檢舉者而進行過辯論，最後人們認爲還是對檢舉行爲不予鼓勵，因爲它會助長那些告密者，使人們的隱私權受到致命的威脅。

多麼勇敢和具有遠見的決定，它們標誌着人民的成熟，政治的成熟。人們知道，保護那怕是壞的事物同時也就是在保護自己。表面上看，允許納粹分子示威，容忍妓女合法經營是多麼荒唐和愚蠢，可是時間會證明，這些決定要比中國人容忍「嚴厲打擊犯罪分子」的行爲要英明千倍百倍。文化大革命中人權的崩潰，不就是從鎮壓「一小撮壞人」的合法化開始的嗎？

直到今天，中國人還陷在無休止的「哪個黨好，哪個黨壞」的爭論中不可自拔，甚至連中國民聯也被捲入了這場是非的爭執，成爲被人評論善惡的對象。人們至今沒有認識到，誰好誰壞在政治上並沒有決定性的意義，而具有決定意義的是各種力量的強弱，是他們是否均衡。

好與壞，善與惡是可以轉化的。國共兩黨的悲喜劇雄辯地證明了這一點。

當共產黨還很弱小的時候，她無疑要比國民黨好得多。幾乎每一個去過延安的人都會對那裡的平等、清廉、效率和理想主義色彩產生深刻印象。紅區的欣欣向榮和白區的腐化墮落產生了鮮明的反差，使民心的天平驟然倒向共

產黨。可是，當共產黨奪取政權之後，當她變得比國民黨更強大的時候，國民黨身上所有的弊端她都染上了，而且變本加利。歷史所揭示的道理是那樣簡單：當共產黨弱小的時候，她受到另一支強大力量的威脅和制約，爲了戰勝國民黨，她必須保持自己好的形象，以爭取民心。而當她打垮了對手，並強大到沒有任何力量可以制約她的時候，她就可以無所顧忌地幹壞事了。

國民黨的經歷從反面證實了這一道理。當她是個強大的執政黨時，她可以橫行霸道，腐化墮落，可是當她退守台灣，每時每刻都受到對岸那支強大力量的威脅時，她便不得不立志改革，奮發圖強了。也許誰也不會否認，今天國民黨的形象比四十年前要好得多了。此誰之功？是共產黨之功！民進黨之功！正是這種外來的威脅和內在的壓力使這個看起來不可救藥的黨走向康復之路。

四十年前，共產黨提出的口號「打倒國民黨，解放全中國」曾具有那樣大的感召力。在她的眼裡，自己是光明和正義的代表，而國民黨是黑暗和醜惡的化身。用光明戰勝黑暗，用正義代替醜惡，這是多麼激動人心的革命。可是請冷靜一下，透過時髦的喧嘩，傾聽一下這句口號背後的邏輯聲音，會令人回憶起兩千年前一句同樣震奮人心的口號「蒼天已死，黃天當立」。多麼熟悉的聲音，多麼熟悉的邏輯，兩千年來，中國人仍沒跳出這個古老的思路，正是這個思路，爲一次又一次的民族悲劇埋下伏筆。這些悲劇的主人公在不斷變換，從秦始皇到共產黨，可是它們的劇情千篇一律。

共產黨的理論極力使人相信，國體比政體重要得多。權力的主人是誰，要比權力的結構如何具有更致關緊要的意義。二十世紀以來，

中國國體的變化令人眼花繚亂，從封建君主制，到資本主義共和制，到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制；從慈禧太后、袁世凱、蔣介石到毛澤東、鄧小平，權力的主人走馬燈似地換來換去，可是中央集權的政體却基本未變。六十八年前，一群熱血青年走上街頭，高呼要求民主自由，六十八年後，又是一群熱血青年走上街頭，他們要求的還是同樣的東西。國體在變化，可是歷史却在原地踏步。

西方人也許會覺得可笑。國體是什麼樣又有什麼關係？在他們的國家不也有女皇、天皇嗎？不也有君主立憲和民主共和之別嗎？可是他們都有共同的东西，有立法獨立的議會，有司法獨立的法院，有與論的監督，有反對黨的制衡。只要把權力的結構設計好，誰是權力的象徵又有什麼重要？

中國人，什麼時候能跳出這個圈子，這個共產黨人製造的圈子，一個又古老、又時髦的圈子。

今天，共產黨把自己的命運和這個民族的命運緊緊地聯繫在一起了。共產黨的危機變成了民族的危機；人們對共產黨的失望變成了對民族的失望。要想挽救這個民族，就必須結束共產黨製造的悲劇。怎樣呢？

國民黨人準備了四十年，他們說：「打倒共產黨，用三民主義代替共產主義，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也許全體中國人沒有一個人會否認，三民主義是個好的主張，可是值得警惕的是，國民黨在犯和共產黨同樣的錯誤，她仍舊沒跳出那個古老的圈子，用一個好的主義去代替一個壞的，把那個好的東西強加於所有的人

。請記住，共產黨的悲劇不在於她幹了什麼，而是她怎樣幹的。國民黨的主張無論多好，如果她採取與共產黨相同的方式把它強加於人的話，那麼一個有能力打倒共產黨的力量將有足夠的能量爲這個民族製造另一個更大的悲劇。

共產黨內部的一批精英分子覺醒了，他們也奮起挽救這個黨。他們一方面向馬克思主義開刀，另一方面爲社會主義掘墓。十年以來他們似乎突破了一個又一個的禁區，可是最終他們驚奇地發現，共產黨內並沒有禁區。事實上，在中國，什麼都可以說，什麼都可以做，關鍵的問題是誰可以說，誰不能說；誰可以做，誰不能做。有些事情，趙紫陽能做，魏京生就不能做；有些話鄧小平可以說，方勵之就不能說。過去所有的「路線鬭爭」，「改革與保守」的鬭爭都是表面做戲，它們的實質的意義不在於幹什麼，而是由誰來幹。

共產黨的改革者發現，他們處於一個鬼打牆似的尷尬境地，一方面，他們沒有敵人，所有的雙手都高舉着擁護改革，另一方面，他們又腹背受敵，處處碰到無形的掣肘。最後他們發現，敵手們虎視眈眈盯住的並非他們改革的綱領，而是他們手中的權力。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於是，爲了改革的利益，他們需要鞏固手中的權力，要封住所有異端的嘴巴，扼殺所有破壞戰略部署的行動，然後把他們的改革措施強有力地推行下去。嗚呼，他們再一次陷入了那個古老而又時髦的悲劇圈子，同樣，他們悲劇的根源不在於他們做了什麼，而在於他們怎樣做，他們做的事與前任確實不同，可是他們做事的方式却同出一轍。

長期以來，人們認爲，共產黨的命根子在於她所堅持的四項基本原則。而只到今天，人

們才發現，四項基本原則的內容只不過是毫無意義的風車。關鍵的問題不在於共產黨堅持的內容是什麼，而在於她「堅持」這一行動本身，在於她把這些原則強加於人民的行為方式。

馬克思主義並不是那樣可怕，恢復它原來的意義，它只不過是人類思想寶庫中的一個分支。它也有它存在的權利，為什麼一定要打倒它呢？社會主義、公有制也並不是那樣可憎，它只不過是人類生產方式的一種，它也有它合理的一面，為什麼一定要用承包制、私有制去代替它呢？難道不能讓人們去自由地選擇他們所願意接受的所有制嗎？把承包制、私有制強行推行下去的這種辦事方式與三十年前把公有制強加於中國人民的行為毫無差別。內容變了，但形式照舊。

共產黨的領導也並非不可接受，如果人民選舉她執政，又有何非議？人民民主專政更是無可厚非，問題是如何界定「人民」的範疇。

萬惡之源在於「堅持」，在於那個強加於人的「堅持」。共產黨的本質並不是由那些原則來決定的，共產黨是世界上最具有靈活策略的黨，她可以隨時修正她的原則。然而，世界上所有的共產黨都有一些共同的行為方式：首先，無論什麼事情，是好的還壞的，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只能由我來做，不能由別人來做；其次，凡是我做的事情都是好的、正確的，而別人做的事情，都是壞的、錯誤的；第三是要打倒和消滅壞的、錯誤的事物，用好的去代替壞的，用正確的去代替錯誤的，無論人們是否接受，這個過程是強制的。

當人們拋開那些五光十色的理論，撥開那些用於宣傳的華麗詞藻，就會發現，共產黨辦事的邏輯是那樣的簡單：排他性、絕對性、強制性。而在這一切背後的基礎是：一元論。

推薦研究中共高層內部鬥爭的一本新書

何處出版，條件若干？

China's most mysterious, powerful man emerges from the shadows

China's most famous living Communist statesman, Deng Xiaoping, is legendary. Yet Deng the man has remained a mystery—until now. This fascinating book is the first thorough investigation in English of a leader whose political actions made headlines while his personal history, including his bitter quarrel with Mao Zedong and his relationship with Mao's widow, was a closely guarded secret.



DENG XIAOPING
Uli Franz

"Uli Franz's astute offering should assist Westerners in coming to grips with just what is going on behind the bamboo curtain as that curtain opens wider every day."
—Kirkus Reviews

Illustrated with photographs. Translated by Tom Artin.
Now at your bookstore.
HBJ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中國需要多元論。中國人需要學會多元地思維。當什麼時候中國人擺脫了哪個黨好，哪個黨壞的無謂爭執，當他們不再企圖以一個好的力量去消滅一個壞的力量，而懂得自覺地去支持一個弱小的力量去抗衡那個強大的、絕對的力量時，當他們不再把政治看作僅僅是由誰

來掌權，而是努力設製一種機制使各種權力相互制衡的時候，中華民族的悲劇大循環就可以劃一個句號了。
共產黨並非不可救藥的，挽救她的唯一辦法是：建立一個反對黨，一個有能力制衡她的反對黨。



奧運會與政治

Chinese Athletes: On to the Oly

蔡宏

：一旦沒有了國與國的區別，我們又去為誰加油、為誰操心呢？

奧林匹克運動會是超政治的（但不超國別）。不過現今人們總愛給它打上一層政治的色彩。不少人都容易認為：一個國家獲得的金牌多，即表明這個國家強盛。我們的棋聖聶衛平常說：國運衰，棋運衰；國運興，棋運興。

把國運和棋運（或球運）徑直聯繫在一起，當然有它的片面性，這一點想來聶衛平也會同意。那麼，國運和棋運究竟是一種什麼關係？換句話，一個國家在奧運會贏得的金牌多到底說明了什麼？這個問題值得研究。

從本屆奧運的成績看，以下三點值得注意

第一，歐美的成績遙遙領先；

第二，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的成績常常高出那些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

第三，中國（大陸）的成績顯著下降。讓我們逐一分析其原因。

（一）歐美的成績高，這不足為奇，自有奧運以來一向如此。粗考其緣由不外是：

1. 歐美人高馬大，在大部分體育比賽中都占有身體上的天然優勢。

2. 奧運競賽項目大多數原自歐美，他們的傳統深厚。假若以後武術被列入奧運項目，則中國人就很容易在該項目中領先。

3. 歐美的國家富裕，百姓絕無忍飢挨餓之憂。同是黑人，美國黑人的運動成績便大大優於非洲的黑人。

（二）蘇聯、東歐的成績高出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這是否表明了社會主義國家的某種優越性？

現在一提「社會主義優越性」，有識者無

不嗤之以鼻（傅大陸有所謂「三笑青年」，即聽說馬列主義就譏笑，說社會主義就冷笑，說為共產主義而奮鬥就哈哈大笑）。但嚴格說來，社會主義當然有它的優越性（讀者勿驚異：中國之春居然轉吹起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來了，且聽下文分解）。任何一種社會制度都有它的優越性，壞的社會制度之壞，不在於它全無優越性，而是它的優越性太少或太不重要或是其代價太高。譬如說，傳統的未經改革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報紙就沒有大篇大篇的廣告，不少嚴肅的知識分子（包括我們的劉賓雁先生）對此就很欣賞。只是他們沒注意到，社會主義國家的報紙之所以不必登廣告，是因為它有政府作靠山，不愁財源。你是喜歡一份登有大篇大篇的廣告，然而却不受制於政府權力的自由的報紙呢，還是喜歡一份沒有廣告，但始終必須「和黨中央保持一致」的報紙？問題就在這裡。

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在於：由於共產黨名符其實地控制一切，所以它可以隨心所欲地把自己的價值目標強加給全社會，它可以傾一國之力去達成任何它意欲實現的目標。因此，它可以用犧牲農民的辦法高速實現工業化，它可以在億萬人民吃不飽肚子的情況下爆炸原子彈。同樣地，它也不難在同等國力的情況下比那些自由的社會取得更突出的體育成就——只要它立志要取得這種成就的話。通常，它是極欲取得這種成就的，因為這種社會的統治者的一個最大特點就是它追求虛榮甚於追求繁榮，正如它追求國強甚於追求民富一樣。

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高度一元化的社會，這意味着，如果你所追求的價值在政府規定的價值之外，你的前景是很黯淡的，甚至絕望的；反之，如果你的志向碰巧和政府的要求相吻

世界大同後，樣樣都會比現在好（最確有把握的好處是那時將沒有戰爭）；唯一不好的是，那時候，奧運會將不如現在這般扣人心弦

合，那麼，你可以得到其它多元化社會所不可想像的有力支持和鼓勵。在社會主義社會，運動明星而成為人民代表、政協委員或蘇維埃代表的決非個別，當上一個什麼官的也並不罕見。當然，這種現象在一些多元化社會中也有。

據說，美國拳王阿里一度打算競選從政。不過，這種情況在多元化社會中要較為少，也較為困難。一個運動明星，因其享有的廣大知名度固然是競選從政的一大資本，但除非他本人在政治方面也表現出相當的關注和一定的能力，否則，單憑大明星的銜頭本身還是很難進入政界的。社會主義社會就不同了，因為在這裡，你能否當上人民代表、政協委員或當上什麼官，全憑上級的意志。另外，這種社會的人民代表、政協委員也實在很好當，你只要具有鼓掌和舉手的本領即可勝任愉快。當官也不難，因為方針政策都是上面定好了的，你只消當個不操心的文件中轉站就行了。更何況，社會主義社會的官職一向很多，獨擋一面有困難，當個副手總還湊合吧。大家都知道，在社會主義社會，當官、當代表，主要表明一種榮譽，隨之而來的也有一些利益，但並沒有應有的責任。社會主義社會喜歡讓運動明星當官當代表，表明這個社會對運動明星的寵愛。

古人云「一將功成萬骨枯」。在每一個奧運獎牌得主背後，該有多少耗盡了青春與汗水的默默無聞之輩！金字塔若要建得高，地基必須寬闊。然而，在一個多元化社會，又有多少青少年、有多少家長，願意冒這麼大的投資風險？一個人要學建築，成不了貝聿銘總還能夠當上一個小工長，但是，一個不能在全世界、至少是全國的比賽中奪得名次的運動員差不多就不能算作運動員。運動員吃的是青春飯，掙的是血汗錢，其成功機率又特別低——少說也二

得萬里挑一。這就使得大多數人望而却步，不敢作全身心的投入。社會主義的好處是它能夠對一個它選中的人包幹到底，這就免除了有志於體育事業者的後顧之憂。

以中國大陸為例。我們早就建成了一個龐大的培養體育尖子的金字塔系統。在這個金字塔的頂端，是國家隊，然後是各省市的運動隊。在這裡，運動員完全是職業性的。金字塔的底部，則是遍布全國大大小小的青少年業餘體校。選拔工作常常從小學生就開始，有的甚至從幼兒園開始。被選入業餘體校的孩子們，在職業運動員（通常是退役的前專業隊成員，有些則由體育教師兼職）的輔導下，進行大運動量的訓練。國家有限的體育設施供他們充分使用，並且還在生活上給予他們種種補貼和照顧。業餘體校實行嚴格的淘汰制，這就是說，一個擁有幾十名上百名學員的體校，到頭來真能送入省市或國家專業隊的寥寥無幾。通過這套制度，我們就能夠在體育設施普遍缺少和落后的情況下，在全民體育運動水平十分有限的情況下，培養出一批又一批在國際上具有相當競爭能力的運動明星。

專業運動員退役下來怎麼辦？那些在業餘體校中被淘汰的青少年，由於其學業勢必受到影響，他們的前途怎麼辦？很好辦。運動員退役之後，政府統一分配他們工作，一般總還分得不壞。中途淘汰的青少年也不必發愁，他們如果考不上大學，憑着他們這較一般人優異的體育成績，多半也容易分得一個差強人意的工。這些人到了工作單位後，由於他們的一技之長，有的能在工會幹點工作，有的則作為單位的運動隊（當然是業餘的了），時不時地出去比賽，為本單位爭光。這些人之所以有不錯的出路，很大程度上是沾了社會主義的光。社

會主義搞指令性經濟，一切人的工作都由政府一手安排（在原則上）。社會主義下的企業既然不在乎經濟效益，因此也不在乎收進一批沒有生產技術的人，特別是大的企業，往往很樂於在運動會上出人頭地，常常更願意接納這批運動尖子。出路既有了保障，無怪乎想進業餘體校的人也就綽綽有餘了。

為什麼在奧運會上，同等國力的國家，社會主義社會的成績一般要比資本主義社會的好？原因就在於：社會主義社會的運動員幾乎都具有職業性或半職業性。而資本主義社會呢，除了某些具有廣泛的觀賞性質、從而能贏利的體育項目外，絕大部分運動員都是業餘的。以業餘對專業，當然占不了優勢。本屆奧運會，美國男籃輸給了蘇聯。但美國人並不服氣。因為參賽的美國隊是業餘球隊，在美國，至少有十個以上的職業籃球隊能夠打敗這支參加奧運的國家隊；而蘇聯隊則是職業球隊。照道理說，奧運會本是業餘運動員的運動會。但是由於許多國家（尤其是社會主義國家）派出的運動員都是冒牌的業餘運動員，國際奧委會明知此事却也毫無辦法。有人干脆建議，今後開奧運會，職業運動員也可以參加。倘若真的如此，美國人將會把握奪回男籃金牌，不過在其它項目上未必能比現在的成績好到哪裡去，因為在一個商業化的社會裡，職業運動員的種類和數量都不會太多。

本屆奧運，中國隊（大陸）成績甚不如下人意，中國人大都很喪氣，包括台灣人也如此。體育畢竟有超政治的一面。

何以致此呢？原因當然很多，有些純粹是技術上的，和政治無關。過去，把球打贏了都說成是「毛澤東思想的勝利」，固然荒唐，現

在，我們若把球打輸了都說成是「四個堅持」的失敗，那同樣是可笑。但是，以下兩點政治上的因素恐怕不是沒有一點關係。

其一是改革。改革打破了傳統的指令性經濟，打破了鐵飯碗與大鍋飯，社會愈來愈有商業化的趨勢。這對於職業運動員的出路問題造成了很大的威脅。

七十年代應該是中國職業體育事業的黃金時代。這個時代中的青少年，讀書既沒有什麼前途，中學畢業後一古腦兒地上山下鄉，但唯有具有文藝或體育才能的人可能例外。故而在那時，許多家長和子女抱着躲過上山下鄉這一關的念頭而把希望集中到了體育事業。七八年恢復高考，業餘體校的生意頓顯衰落。過去，進業餘體校是要拉關係、開後門。現在却反了過來，許多很有體育天分的青少年，其父母和他們自己都不願意進體校，而要靠教練登門遊說了。如今，企業單位都忙於掙錢，對於養一批只有運動專長的人再無多大興趣，大部分運動員的退路也就成了問題。金字塔的地基一縮小，其高度自然也就隨之降低。

除了商業化的趨勢之外，今天的中國也開始呈現了多樣化的趨勢，這對於體育事業也是個不小的打擊。曾經一度，在絕大部分行業被堵塞、弄得黯淡無光時，運動明星風光獨占，實在榮耀得很。而今人們的追求日益多樣，對運動明星的尊崇便大不如前。一旦失去了眾人的崇拜，運動員力爭上游的鬪志便會大大減弱。當然，明星崇拜總還是有的，但畢竟今不如昔。

上述兩個因素，今後仍會發展，所以在未來一段時期內，中國的體育成績，恐怕難以有更好的提升。不過那倒不一定是壞事。另外，有人把中國體育事業的退步歸因於

獨生子女政策，大概也不無道理。

再者，此次奧運中國的失利，和運動員的士氣很有關係，那也許和近年來國內的人心混亂分不開。這一點倒是值得憂慮的。

最後，比較一下日本和南朝鮮在此次奧運中的表現。日本無疑是亞洲最富強的國家，曾經一度也是亞洲首屈一指的體育大國。但這次却明顯地落於南朝鮮之後。這兩個社會在制度上大體類似。不同的是，南朝鮮作爲一個新近崛起的國家，雖然遠不及日本富強，却有一股後來者的咄咄逼人的氣勢。大概，一個落後國家在剛剛崛起的時期，都有一種很強烈的衝動，渴望在各種出風頭的場合下讓世界發現自己的力量。因此它們常常在體育競技上也表現出一種非常勇猛的衝天幹勁，把金牌多少看得很重。而日本，既然早已穩穩地在世界上佔據了它的優越地位；當日本的人均收入已經居於世界第一，當豐田汽車、三洋電視機已經充斥了整個世界市場，沒有一個國家的人不對日本敬畏三分時，它也許會覺得在奧運會上多幾個金牌少幾個金牌並沒有太大的意義。



全美創辦最早，
最具規模的移民律師事務所

傑史格(Jay Segal)美羅省移民局前任首席法官
馬丁譚士洋(Martin Danziger)前美司法部移民局副局長
亨利杜根(Henry S. Dogin)美司法部移民局紐約總局

畢斯特·慕嘉模 法律事務所

BARST & MUKAMAL

移民·大赦·不動產買賣·商業登記·酒牌申請等等

紐約總公司
2 Park Ave.
19th Floor
New York N.Y. 10016
Tel:(212)686-3838
Fax:(212)481-9362

加州羅省
Tel:(213)623-4592
Fax:(213)623-3720
加州三藩市
Tel:(415)398-8887
Fax:(415)398-6757

佛州邁阿密
Tel:(305)371-3838
Fax:(305)374-3381
佛州檳榔嶼
Tel:(305)832-2369
Fax:(305)832-73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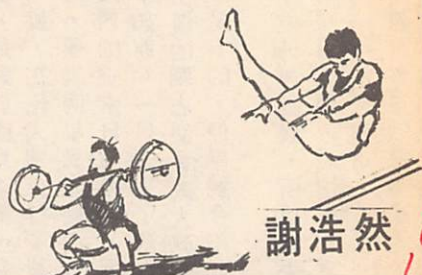
華盛頓首府
Tel:(202)659-0712
Fax:(202)659-0194
香港辦事處
代理廣州、台灣
Tel:5-200818

紐約法拉盛:
39-01 Main St.
Suite 402
Flushing, N.Y. 11354
(718)463-8500

紐約華埠
8 Chatham Sq 8F
New York N.Y. 10038
永發大廈八樓
Tel:(212)513-7800

中國人的雄風到哪裏去了？

——評大陸體育代表團在漢城奧運會的失敗



謝浩然

988
284

中國大陸體育代表團挾着一九八四年洛杉磯二十屆奧運會奪得十五枚金牌的雄風，誓在東西方十二年後又重新相聚的漢城奧運會上大顯身手，但是，事與願違，雄心萬丈的大陸代表團，竟在預計奪魁的項目紛紛翻船，大陸隊具體得到的金牌數目，與上屆（洛杉磯）相比，遭到了空前的慘敗。十多天來四年一次的全體體育盛會在激烈、緊張的拼殺中結束了。從大陸代表團的失敗中，我們可以體會到許多發人深省的東西。

1 本屆奧運會開幕拉開的第一天，大陸代表團就慘遭厄運，先是最有希望奪魁的射擊隊兵敗如山倒。上屆奧運會為中國人爭得一枚金牌的許海峰，帶領他的伙伴們極度緊張地奔赴沙場，一心奪取穩操勝算的射擊場上的一大把金牌，結果是求勝心切的神槍手們一個個丟盔棄甲，新聞界一片嘩然，大陸神槍手何以如此失態？總算許海峰在以後數日的抗爭中撈回一枚銅牌，使大陸射擊隊未落得全軍覆滅的下場。

2 與此同時，最被看好在舉重壇上奪兩面金牌和打破世界記錄的大陸大力士何均強和何英強也出師不利。命運神秘地捉弄着他們。大陸舉重隊與射擊隊同命相連。最後也只拿到一枚銅牌。而這塊銅牌又是何均強竭盡全力才掛上了脖子。

3 在世界體操界久負盛名的大陸體操隊命運尤其悲慘，被稱為體操王子的李寧在團體和全能賽中，竟接連十一次失誤。當他從鞍馬上摔下來時，慘不忍睹。上屆連拿四塊金牌的體操王居然成爲此次大賽中失誤最多，表現最差的運動員。令世界輿論震驚。厄運從比賽第一天起就將大陸男女體操選手們擠壓得潰不成軍，落到第四名，女子隊落到第六名。總算跳馬王

樓雲最後在單項賽中搶到塊金牌。

4 當大陸代表團在漢城接連吃敗仗後，大家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大陸最引以爲自豪，和被稱爲無堅不摧、牢不可破的女子排球隊和乒乓球隊上，但是勝利之神再也不靈了。被西方稱爲天安門城牆的大陸女子排球隊首先輸給了秘魯，接着又萬萬未料及地是以零比三慘敗於世界第六名的蘇聯隊，而且有一局竟以零比十五敗北，全球輿論驚嘆不已，美國NBC主播形容道：中國女子排球的世界已經結束了。女排丟失了金牌，給大陸代表團一個極其沉重的打擊。女排亦知有罪，抱頭痛哭。奧運會接近尾聲，人們又把希望寄托在乒乓球隊上，可是希望再次破滅。世界第一、二號種子選手，大陸的世界冠軍江加良和陳龍燦等三名球員，企圖爭奪男單金牌，結果是全遭淘汰。

5 除此之外，被看好的大陸田徑隊在大賽中也毫無建樹，只拿了一塊銅牌。倒是游泳和跳水爲中國人爭得了兩面金牌，幾面銀牌。

奧林匹克運動會。既是競爭激烈的體育盛會，也是世界各國人民，特別是青年一代加強團結，增進友誼，加深瞭解的盛會。奧運會的宗旨是和平、友誼、交流。現代奧運會創始人顧拜旦曾莊嚴宣佈：奧林匹克是全世界的。世界各國運動員和各國人民正是從這根本的基點出發，積極地爲促進奧林匹克運動的發展做出自己的貢獻。

但是，中國大陸的執政者和體育發展並不是從這個基本點出發的，大陸的體育運動蒙上了一層層濃濃的政治色彩。首先，大陸的體育運動不是按照奧林匹克精神，體育是普及的運動，是增強人民健康和社會朝氣勃勃的運動，在大陸却變成了尖子運動。由於沒有全民的普及性，當有的項目有所突破之後，而又出現常

常後繼無人的危機現象。大陸政府沒有足夠的獎金，也沒有拿出應有的資金普及和發展全民的體育運動，因此大陸各大、中城市的體育設施比起發達國家是差得太遠了，當然農村就更不講了，農民還仍在為溫飽而苦鬥，是無力和無心去參與體育運動這樣的洋玩藝。但大陸政府深知體育比賽的奪冠既可以揚國威，也可以煽動全民的民族情感，從而是維護政權的一個很好的調劑和法寶。於是，我們看到大陸政府不惜耗費資金，僅僅培養一批批的尖子運動員，以實現政權的現實需要。

大陸運動員的出國比賽和參加世界大賽，都統統被賦予了政治任務。運動員從參加訓練開始就被灌輸為是黨的培養，黨和政府尤如雨露和陽光，於是運動員就簡單地成了一棵棵的植物。這種機械地成長和訓練是背上了沉重的包袱的。當然這種嚴酷的訓練和強大的政治壓力，有時也能奏效，使這些近似植物的機械人在某些項目取得一些成績。但是也有暴露這種壓力下的弱點。這次漢城奧運會，就充分地、無遺地將這種弱點暴露了出來。

大陸代表團的運動員在還未出發抵達漢城前，就已是各種政治壓力的重重包圍，各級黨、團組織的囑托、要求和希望，什麼「為黨和人民爭光！」「十億中國人民的希望！」「決不能辜負黨和人民的期望」等等。運動員們還在訓練時就已經處於高度的興奮和緊張之中，每個運動員想到的都是爭金牌。應該說從這時運動員的心理素質已經就不是很健康的了。尤其那些被看中必奪金牌的運動員，更是每日被壓得喘不過氣來。當他們飛抵漢城後，神情緊張得難以控制，準確地講，他們是帶着病態的心理出征的。世界舉重冠軍何均強出場時，心情緊張得難以抑制，三步並成兩步跳上了舉重

台，而這是舉重運動員最禁戒的，但是一位久經沙場的猛將居然出場是如此地反常，其結果當然是慘敗。當他失敗後，記者問他為何輸掉了應該得到的金牌，他回答是太想破記錄和拿金牌了，心理上反常從而白白地丟掉了金牌。體操王子李寧在出賽時已是興奮得感到一陣陣的恐慌，決心大出頭，大拿金牌，其結果又是適得其反，出「罕見」的反常，從吊環和單槓上摔下來的情形引來觀眾一陣陣的嘆息。李寧慘敗後哭得像個淚人，漢城奧運會徹底破壞了這位英俊王子的形象。而女排的姑娘們滿以為古巴女排不出戰，金牌是穩穩地再次掛在脖子上，當她們默默地站在第三名的台上受世人數落時，姑娘們暗暗地淌着淚水。應當講參賽的大陸運動員們實力是很強的，本來可奪得更多的金牌，但因政治壓力，他們心理素質遭到了嚴重的破壞。當我們看到這些可愛的小將流下一行行的眼淚時，我們真為他們惋惜，同時又對他們寄予深切的同情。

大陸執政者對運動員寄予了厚望，是希望多奪幾塊金牌，好為正處於經濟和政治兩交困中的大陸老百姓打打氣。近來大陸的通貨膨脹，物價飛漲，老百姓怨聲載道，工人怠工、罷工時有發生，學生不滿現實八方串連、公開、大膽地批評時政；上層的改革派又與保守派進行着權利上和政策上的殊死搏鬥。在這樣的非常時刻，運動員能在漢城多奪幾塊金牌也是對危機的時局一個極大的安慰和緩和。為此，從上到下對這些出征的年輕選手們無情地進行了重重政治包圍和壓力，每個選手都是背水一戰，就像被推上了戰車似的，由於心理上的崩潰，可憐的選手們最後是紛紛落敗，歷史將會記下這悲慘的一頁。而那些因心理壓力反常未奪得獎牌的選手將會痛恨一輩子，因為體育競賽

的青春太短暫了，許多運動員白白地丟失了這四年一逢的大賽的成功，也只好空流一腔悲淚。

四年一度的奧運盛會匆匆結束了，我們在盛會上欣喜地看到了中國人是有實力與其它國家的選手進行較量的。只要少來些政治干預，少來些心理壓力，我們中國運動員是會在今後的賽事中取得佳績的。



環球汽車修理行

地址：112-21 Roosevelt Ave.
Coona NY 11368

電話：(718)429-1400
(718)429-1442

華人經營

精修各種引擎、線路、
板金、噴漆、換油、保
養、舊車買賣、歡迎比
價。

小閩主持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上午八時至下午七時

記方勵之在悉尼

蘇菲

「中國問題演講會」上的發言

著名中國天體物理學家，大陸民主運動的倡導者方勵之教授，偕夫人李淑嫻教授，應「

澳中協會」邀請，於今年八月來澳，主持第五屆「馬索·葛羅斯曼大會」(MARCEL GROSSMAN MEETING)開幕儀式，就有關宇宙起源問題進行學術交流，然後到堪培拉、悉尼、墨爾本等地講學。

方教授所到之處，皆應當地華人邀請，就中國問題舉行演講會、座談會。這表明遠在南半球的地廣人稀的澳洲，十數萬炎黃子孫同樣時刻關心着中國的政治，中國的命運！方教授對大陸政治獨到精闢的見解，撥開了我們心頭的一些疑雲，他那憂國憂民的一片赤子情懷，激勵我們去為中國的民主化而鬥爭！八月，是南半球的冬天，古老的澳洲大陸，也不可避免地掀起了「方勵之旋風」。

八月廿七日在悉尼附近華人聚居區卡拉瑪打市，由「澳洲華裔相濟會」及澳洲「華聲報」主辦了「方勵之教授中國問題演講會」。這是一次方教授澳洲之行中當地華人為他舉行的歡迎盛會的高峰，卡市澳洲華裔相濟會的禮堂被擠得水洩不通，窗外也站滿了人，雖然下着雨，窗外的人們仍在雨中聆聽！

大會由澳洲華裔相濟會主席黃煥松先生主持，首先由澳洲華聲報社長楊漢勇先生向到會者介紹方勵之教授及同時與會的澳洲昆士蘭大學政治系教授、中國問題專家邱垂亮教授。然

後「華聲報」主編楊明先生致詞，他指出：方勵之教授之所以受到海外華人一致熱烈歡迎和普遍尊敬不僅因為他在學術上有卓越成就，更主要因為他是中國的民主鬥士，他爲了中國的進步和現代化，進行了艱苦不懈的鬥爭（全場熱烈鼓掌）。

接着是邱垂亮教授致「開場白」，邱教授對方勵之在中國歷史發展中的作用，作了如下簡潔而恰如其份的評價。邱教授指出：「方教授已達到的突破：

第一，民主政治言論自由的突破。能在大陸非常困難的情況下做到這個突破很不容易。方教授最大貢獻是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想要達到的科學與民主這兩個現代化的目標，經過了一段相當長時間的空白，終於在方教授身上達到了一個連續。這一點在中國近代歷史上將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第二，我自己研究政治，對台灣民主政治有起碼廿年的參與和批評，到頭來我非常同意方教授的一句話：民主就是民主。並沒有什麼西方的民主，東方的民主，台灣的民主，大陸的民主，蘇聯的民主或什麼社會主義的民主之分。民主的本質一樣。雖然由於社會文化、社會環境、政治生態不同，有時民主的程序和方



法不同，但民主的本質一樣。要達到民主一定要民主的程序，民主的方法。我很贊成，用暴力或其它非民主的方法一定不能達到民主的目的。

第三，中國的統一，是中國人的希望，也是大家困惑的問題。但中國的統一，是手段；統一的目的，內容應包括民主政治。如果沒有民主，統一很難，就是達到了統一，恐怕也會有許多問題。所以，民主政治的發展最後才能解決台灣與大陸的統一。

以上三點，看來簡單，其實在方教授知識分子智慧的精粹中是一個相當重要的信息。經過方教授兩年多以來不斷地努力，慢慢已在中國人心中留下永不可磨滅的印象。」（鼓掌）

在一片熱烈掌聲中，方勵之教授作了題為「中國的開放與民主」的演講。

方教授一開始就幽默地說他作政治演講是沒有稿子的，因為不是政治家，「我是被政治捲入的」（鼓掌聲、笑聲），原來對政治並沒興趣，想做科學，但是在中國這種社會使人不得不被捲入政治，也就不對所存在的社會，生活的環境進行思考。

由於聽眾中有些人多年僑居國外，為闡明觀點，方教授先介紹了中國改革的大致經過及現狀。方教授說，中國的改革進行了十年，最初的動機是為了解決經濟問題，當時在「文革」、「四人幫」之後，中國的經濟、政治都處在崩潰的邊緣，大家生活也很苦，如不改變中國的現狀，很難在世界上站下去。那時從上到下經濟改革都很清楚。每年（中共中央）「一號文件」也都是關於農業改革，大約五年的時間在農業上還是看到明顯的成績，如買東西的票證有的逐漸取消了。而五年後（八三年）當改革進入工業、城市、教育體系，開始出現不

同看法或問題，這也自然。因為改革深化，大家都感到政治上必須進行改革，否則經濟上的改革很難進行。國內出現動盪，而作為高層則接連地推行「反精神污染」，對「人道主義」問題的批判，「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等。在經濟上所有制如何改也是問題，意見很分歧，效果也很難說，所以近五年的改革遇到許多障礙。隨着改革深入，這種障礙越來越觸及許多根本問題。現在雖然無人敢說不改革，但更多的人則在考慮：什麼是實質性的改革？方教授說：「我認為改革的目的，是明確的，改革的目标是走向發達社會。而在看到如美國、西歐、日本這些公認的發達社會後可以清楚，他們之所以被稱為發達國家，是因為他們有下列三個共同特點：（一）經濟強大是最明顯的事實（人均年產值五千至一萬美元以上）；（二）教育標準。普通教育普及，受過高等教育者佔人口百分之三十以上；（三）政治上都採取民主政治方式。如美國是兩黨制，西歐多黨制。」

「中國要達到發達社會必須是這幾個共同點都達到，但目前離此目標相距實在很遠，中國選處在相當貧窮的狀態，所以改造中國是相當艱苦的任务，每個人都得作貢獻，不是一、二個人的貢獻能解決問題。」

方教授聯繫此次來澳正逢「白澳」主義抬頭，澳政府的「多元化」既定政策引起非議，指出此現象在其它國家也有。方說，華人在國外的處境多少是與中國的狀況有關，「就是因為我們國家太窮，使得我們在國外的人感到別的一些國家實際上仍然看不起我們。雖然我們在國外生活好了一些，但總感到不舒服，沒有精神上的真正愉快！」方教授這幾句簡單的話道出了多少海外華人的心聲，贏得了又一陣掌聲。方指出，由於中國目前仍不是繁榮的狀況

，造成外國人看不起我們，大家更感到中國再不改變，實在使每一個中國人都難以在世界上立足。所以大家對於目前中國的改革現狀不滿是正常現象，知識分子就是要對社會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議，這是我們的責任。何況在改革開放上還存在實質問題：有的人並沒有真正想整個國家、民族走向發達社會；而只是想到自己，自己特殊的利益，自己的特權。

目前經濟改革進行到物價開放，工資調整，所有制如何解決等問題，這些都還沒有解決。但近幾個月大家最關心、議論最多的是物價問題，通貨膨脹相當嚴重。當然任何一個動態社會都會有通貨膨脹存在，問題在於什麼是個合理範圍內的通貨膨脹？物價放開後有些物品以數倍、十數倍以至更高幅度漲價（如煙酒）而工資的增加目前主要仍然靠提級。僅就國家公佈數字來說，百分之二十的人生活下降；據接觸情況估計，知識分子中百分之五十的人生活下降。一個研究生的基本工資為每月七十元，而伙食費（男）每月約需六十元。大量研究生要退學。以致過去認為生活優裕的每月三百五十元的一級教授也感到生活不易了。目前國內通貨膨脹已成嚴重問題，造成人心浮動，各方面工作受到影響。

從發展中國家走向發達國家是要經過物價上漲的過程，但「逆定理」並不成立，即不等於物價上漲就是經濟發展的代表。人們普遍存在擔心：目前物價上漲是否真正代表了經濟在實質性地發展，或說這裡面虛假的成份佔了多少？！至少存在下列疑問：（一）物價上漲，經濟發展了，失業率應下降，更需要人；而實際上不感到需要。（二）物價上漲，經濟發展，物資應該更多，現在相反減少，一些已廢除的票證又恢復（如肉票、糖票）使用即是證明。人們感到

有一種虛假繁榮的現象，使大家對改革前景有疑慮。大街上商業廣告林立，有的廣告大到超過建築物本身，有的號稱「電子一條街」（附近老百姓則管它叫「騙子一條街」，弄到老百姓就近買點生活用品都很困難，影響到起碼的生活，大家就不得不考慮這種商業給我們帶來多少實質性的經濟上的發展？固然有新技術開發存在，但有很大一部分並不是靠技術開發得到效益，而是靠一種「不正之風」，靠一種「後門」，靠兩種體制之間的差價來做生意，靠批條子，平價外匯買進，以「黑市」外匯價賣出而獲「高收益」，到底有多少成份？是因為這種「不正之風」給我們帶來的通貨膨脹？因為這些人一下子很有錢，可以在物資沒有增加的基礎上多用錢購買。

「不正之風」一詞中國一直在用，其含意越來越不同。前幾年「整黨」時，領導人多佔房子是不正之風，現在已是小意思。與外國人做生意至少出國一次，或要外匯存入外國銀行。以上造成大家的感覺是，目前的經濟改革如果果不是公平地發展生產，而是有人以政治上的特權來從中漁利，將公、私攪在一起，來回倒騰這就叫百姓受不了了。「不正之風」目前越「整」越厲害的趨勢，大家對靠「整黨」、「整風」來解決這些問題已沒有多少信心了，這也就造成大家議論下面談及的民主化的問題了。

方教授指出：「有些人不瞭解，中國的現實是我們每個人的實際生活，是與國家的政治、經濟緊密聯繫在一起的，說什麼民主只是學生、教師、知識分子空要的東西，百姓則無此要求。事實上如何解決上述那些問題？靠誰去監督這些「不正之風」，如何去運作？沒有一個渠道如何去解決？當然只有靠民主的渠道才

有可能解決這些問題。」

「不僅知識分子，工、農，以及個體戶也同樣有民主化的需要。因中國的現實並不是每一個人想做什麼生意就做得了的，必須與稅務局、派出所等有關部門建立並維持某種良好的關係。所以發展經濟更使各種人感到，因為經濟受政治的限制而存在的許多問題。如何建立有效的監督？所以目前國內有關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呼聲較高，所有這些渠道都不暢通，雖然憲法規定有言論自由（包括新聞自由的含意），但如何運作，如何保證真正的新聞自由並沒有途徑。為保證真正新聞自由的體現，有人在「人大」召開前建議通過一個「新聞法」，有些內容是不可以登（如國家機密），但應規定清楚哪些不許登，然後可知什麼可以登，但連制定這樣的法律也是沒有下文。實際上是有許多人害怕。我說了不許你登這個，如果你又登了那個，怎麼辦？！因為什麼都不說時最好「掌握」，只要是覺得不舒服的都可以不許登，用「政策」而不是用法來掌握。所以到目前為止，哪怕連一個形式上的「新聞法」也沒有。

這樣就造成了很多人對於政治，沒有渠道來關心，很難關心或不准關心。並非大家內心不想關心。今年北大「五·四」以後的一些事情表明，只要一有機會，有一定的渠道，大家還是表現關心政治，又開始在公開場合談論改革，談論政治。」

「中國的改革前五年可以說領導走在前面。這後五年的許多事情是形勢發展被迫做的，而非非領導人所願，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現象——中國開始出現獨立的成份（或因素），這對整個社會平等、民主是推動。現在有很多事並不是領導想怎麼樣就一定可以怎麼樣，領導原來想怎麼樣並不等於這樣做就可能，最明

顯的例子，如去年僅「資產階級自由化」就在報上登了不少批判文章，且不談其內容簡單，大部分用假名，很少署真名的，應付應付。鑒於這種情況，用「經濟手段」為政治服務，將用真名的批判稿稿費由每千字十幾元加至九十元。儘管如此，仍沒多少署真名的批判文章。這個運動原來據中央領導人說要搞七十年，結果搞了大概七十天也不到（全場大笑）。這件事表明已經有一定獨立的成份，並不是做什麼都跟着，只有大家覺得好的事才跟着走，不好的事情就不跟着走了。」

「雖然中國目前的改革還很困難，特別涉及到物價、工資、政治體制、教育改革絕不是很簡單的事情。但相對長期地來講，還有一定的樂觀。就是因為看到大家的覺悟這樣一個因素。我們認識到自己應有的權利，就去使用。也許就可以用民主的方法去達到民主，譬如今年「人大」表現確實比以前有點進步，相當有意思是這次投票幾乎選任何人都棄權票、反對票（鄧小平，反對加棄權二十五票；王震二百多票；最高是李貴顯，六百多票，在共二千張選票中六百佔很大的比例），這表明大家認識到我們有這個權利，可以使用這個權利去爭取達到我們所願意達到的目標，我們有獨立的意識去發展我們的國家。」

「在海外的留學生、學者受到國外的薰陶，認識到什麼是我們公民應有的權利，如留學政策一會兒這樣一會兒那樣，這涉及到一個權利的問題。原來老說是政府送你到國外來學習，現在應當說我們有受教育的權利，到海外學習也是其內容之一，所以不能說政府可隨便地一會兒延長護照，一會兒不延長；一會兒人數可以多，一會兒可以少。這實際上是一種非民主的東西（鼓掌聲），民主的應該是制定「教

育法』，規定清楚，有的人必須先服務於國家若干年也應規定清楚，不能說政策隨便『掌握』。中國的事情就是這樣隨便由誰來『掌握』，所謂的『掌握』完全是忽視大家的權利。」「現在大家開始知道自己有什麼權利，和怎樣爭取到自己應當有的權利。現在中國人連許多起碼應該有的權利還沒有得到，譬如生活的權利、思想的權利、言論的權利、旅行的權利和受教育的權利，這些都還沒有得到。所以中國現階段的民主問題和人權問題密切聯繫在一起。上述最基本的人權的概念在中國長期以來是沒有的。從我們上大學以來，到在大學工作這很長的時間裡，基本口號就是：大學是培養黨的『工具』，階級鬭爭的『工具』，好像人不是人。我想中國人首先要表明自己是一個人。對不起，請首先把我當作一個人來對待（鼓掌聲）。作為一個公民，我們與國家領導人有同樣平等的權利，你有什麼權利，我們就有什麼權利。有了這個意識，我想中國的改革、開放、民主化就會走向前一步。」

方勵之教授演講結束後，接着就聽眾提問一一認真答復。由於提的問題甚多，也無一定順序，現歸納於下面幾個方面：

(一)有關大陸學生運動的評價及中國青年（國內及海外）的社會責任，以及教育問題。

作為當代中國學生運動的精神領袖，方勵之教授以極大的熱情謳歌讚頌一九八六年底以來國內學生運動表現出的愛國熱情、覺悟和對整個社會的巨大推動。方教授說：「學生運動對社會的推動進步的作用是肯定的。有人指責學生遊行是『幫了倒忙』，『激怒』了領導人。這些指責一概錯誤！學生運動已經起了很好的作用，學運後召開的『十三大』及今年的『

兩會』，已有一定的民主成份出現。在選舉上出現『差額選舉』和反對票，這些現象就是因為學生遊行，向社會提出問題，起了很大影響，引起很大震動。這種震動引起社會各方面的考慮，領導階層也不得不考慮這些問題，做某種改變。所以這次學生運動已經在歷史上寫下了它正面的作用。」（鼓掌聲）

方教授再次強烈批評了那種認為中國的領導已在變好，你不要去『刺激』他，『刺激』他反而更壞。「這種說法完全錯誤，再好的人也需要監督。對於領導層，要告訴他哪些地方做對了，哪些地方做錯了。沒有一個人是因為一刺激就被刺激壞了的，這種不能刺激領導，否則會刺激壞了他們的說法完全是沒有認識到民主就是我們的權利，我們就是需要說話。正因為沒有人說話，領導層就會感到自己很好，你看我做起來都沒人說不好。去年美國留學生聯名寫給中央一封公開信，這封信在大陸內部震動極大，就是明確地公開抗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這種提法。這種什麼東西？！這封信在大陸起了很大的作用。」

聽講的許多青年都問到在當前自己能否推動中國前進做些什麼？方教授指出：「我想至少留學生應該明確地表示自己的態度，這裡有言論自由這個條件；我們也有權監督政府。」

有人問到目前一些留學生不願回國，是否對不起祖國的時候，方教授指出：「現在有些留學生不願回國是很自然的事，留學生學完後是否歸國要看每個人的具體情況，說不回國就是不愛國，這是極狹隘的錯誤觀念。我勸我的一些學生暫時不要回國，想回來也暫時不要回來（鼓掌聲）。因為有的人剛獲得學位，還有待再提高，回來我這裡只有七十元養不起你，你也呆不住，而且沒有國外那樣的設備和實驗

室，反而起不了什麼作用，中國少你一個也無關緊要。除非你回來後可以很快發揮作用，如果回來憋着，還不如在國外呆着。」

在被問及中國的希望在下一代，下一代執政者是否會照舊官僚學習氣時，方教授指出：「如果中國的政治體制不改變，其它情況也不改變，新一代人變成統治者後也會和老的類似，實質會類似的。儘管他們在服裝、概念、語言等方面與老一代的統治者有所不同。」（掌聲）方接着指出：「現在的關鍵是有時事情並不完全決定於領導人想怎麼做，下一代的覺悟在高起來。」對於西方社會流傳的一種看法「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方教授表示原則上同意此觀點，「所以在新一代、在知識分子裡樹立新觀念，比建立新的社會更重要。」

「說到下一代，必然談到教育，這可以說是與政治同樣重要的問題。我認為中國能好起來的『時間尺度』至少要一代人的時間，現在大陸文盲還很多。如果從現在開始抓教育的話，也要在一代人以後才有較高水準、才能有真正的有保證的進步。沒有在大家認識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進步是沒有保證的進步，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一再在國內強烈呼籲政府重視教育的原因。中國的教育經費所佔比例太低。總之，不提高教育很難改變我們國家的現狀。」

(二)有關中國的改革及前景：

問：「世界共產主義國家是否會改變？中國大陸所有改革口號是否能走上民主開放的道路，本人很難相信！」

方：「這是一個大問題！須從兩方面回答。從蘇聯和中國的走『社會主義』結果來判斷，蘇聯的七十年和毛澤東以來的幾十年都是不成功的。我早就說過這樣的話，能否變成民主

發達國家，這是另一個問題，到目前為止的確還沒有一個實例。但現在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已開始涉及到一些政治上的根本觀點及原則。這種現象說明某些因素在起作用，不僅要看到國家領導人，也要看到一般人的作用，有時不改也得改，因歷史的發展有時是由少數人，有時則由更多人的參與來改變的。當然改革是很難的事情，從我這次在澳洲開會接觸的蘇聯科學家的反映，也是認為戈氏的改革是好事，能否行得通則表示懷疑，但仍然抱着一些希望。蘇聯和中國目前的情況你不能說沒有改變，但這個改變目前的確是相當之初步。但不論蘇聯、波蘭……要求改變的呼聲則是共同的，大家也覺得改革這種做法也還是有一定成功的可能性。」

問：「中國領導在提倡改革的同時又提出『四個堅持』，這種徹頭徹尾的共產主義國家又怎麼能走上民主主義道路？」

方：「我早已講過什麼叫『共產主義』國家，這個概念早就不發展。鄧小平說的『共產主義』與毛澤東說的就不一樣，戈爾巴喬夫的定義則又不一樣。實際上『共產主義』是一個形式上的詞，內容很多，你可以變化。『四個堅持』的作用相當於『六條標準』的那種作用，那種作用怎麼樣，是否會變化，已經有歷史作了證明。任何國家都有某種象徵，這種象徵有時並不真正代表它實質的東西。」

問：馬克思主義是否對中國現代化有效？
方：「對馬克思主義——如果說是典型的馬克思主義，我早有明確的意見，很多都已過時了。」

問：「照您的觀點，『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是什麼？與『一國兩制』如何協調？」

方：「我早已說過了『中國特色』這個概念我覺得並不是好的概念。後一問題最近在答記者問中已說過，我認為統一的問題不是唯一的問題，至少不是重心（GRAVITY）的問題，重心的問題仍然是把我們的國家變成發達的國家，只要到了發達國家，我認為統一是一水到渠成的事情。」

問：「趙紫陽的『經濟戰略構思』行得通嗎？會遇到什麼困難？有什麼結果？」

方：「我不知道他有什麼戰略（全場大笑），至於困難，現在已經遇到困難，結果再看吧。」（笑聲）

問：「您認為諸多問題的根源是什麼？」
方：「我認為這個根源的確是與我們這幾十年所實行的體制有根本的關係。蘇聯七十年的事實，中國這幾十年還有東歐國家的事實證明了這種體制本身有根本性的缺陷。」

問：「你有什么切實可行的方法？」
方：「這個問題今天我很難答得完全。實際上，國內有相當多的人在討論如何改變我們現在的狀況。我們第一要求是改變現狀；第二我們的方法要求是民主的。要充分地研究，才能找到比較可行的而且又行得通的路，這的確是一個難題，但並非現在絕對不可能有明確的答案。現在已有很多人在研究如何由目前這種體制過渡到我們所要求的發達國家的民主化的體制，主要是轉變的過程如何轉變。我剛才特別強調了各種獨立因素的出現：獨立的集團、獨立的經濟成份、獨立的意識形態。如何促使各方面社會上獨立成份的出現，我認為是關鍵的事情。這就是在考慮方法時的方向。」

問：「你認為國民的態度怎樣？領導人的想法怎樣？」
方：「剛才我已說了學生、知識分子的態

度；至於領導人中，某個某個領導人的想法就很難說，因為中國的政治是『不透明』的，所以很難說得清某個領導人他真正想的是什麼（笑聲）。中國的開放還只是經濟上，而沒有政治上的開放。」

問：「你對共產黨如何看？」

方：「我剛才說的都是對他們的看法。」

問：「徹底否認反右鬪爭的障礙是什麼？」

方：「我想是因為現在老一代人還在。」

（笑聲）
問：「所有制的改革是否是中國改革的關鍵？」

方：「四十年來我們所實行的並不是社會主義的所謂公有制。公有制應該是大家都有一份：你有一份，我也有一份。而在大陸很難感到你也有一份。『公有制』並不是真正的公有制，而是某些領導人的所有制（鼓掌聲）。現在我們當然要改，改為私有制，是從大私變為更均勻化一點——這樣可能比原來好一點。」

現在很多人，特別是經濟學家在研究怎樣改，如厲以寧教授提議『股份制』，變私有化為目前改革中已出現承包租賃，但承包租賃不是一個根本改變，已發現不完全行得通，大企業怎麼承包？如火車頭承包，只知多裝快跑不檢修，出了事故。所以所有制必須做根本性地改變。」

問：「如何理解『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四十年幾乎白幹了？」

方：「留學生中流傳的是：『出來一看，四十年幾乎白幹。』（笑聲）而現在國內流行的是另一句順口溜：『辛辛苦苦四十年，一覺回到解放前。』（全場大笑，掌聲）這表明了

大家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看法。」

問：「『四小龍』（香港除外）也非歐洲式的民主，中國是否可保持政治制度前提下模擬自由化經濟？」

方：「『四小龍』的確不像歐美式民主國家（但也在往歐美民主方向發展）。這並不等於說中國可以保持現有政治來發展經濟。『四小龍』社會狀況與中國不同，特別要強調的是這個不同就是最近四十年的社會政治制度，就是毛的這種統治制度造成的。」

與其和「四小龍」比，中國不如與蘇聯、東歐比，我們這些國家倒有更多共同的問題。從蘇聯、東歐這些與我們社會現狀基本相似的國家來看，總的則是越民主一點的，經濟就好一點；越鬆一點的，情況相應好一點，如何牙利就比羅馬尼亞好，更比阿爾巴尼亞好。

中國四十年來完全學斯大林「階級鬥爭」體制，社會中許多關係被破壞，所以雖然社會文化有些仍與「四小龍」相似，但社會狀況許多與「四小龍」當初發展時的狀況很不一樣，就不好與之對比。

從這一點上講，蘇聯的改革在意識形態上對中國衝擊很大，因為至少在意識形態上中國完全是重復蘇聯的。這種衝擊很重要，是民主化的衝擊。這次來澳開會有蘇聯同行告訴我，現在斯大林的形象在蘇聯人的心目中已和希特勒差不多。那麼我們天安門上斯大林的像怎麼辦就不得不考慮。」

問：「悲觀的氣氛籠罩着中國人，你的看法如何？」

方：「我認爲的確是如此。現在是越不瞭解中國的人對中國越樂觀，好像物理上的「相關現象」，完全的「洋人」認爲中國挺好的，你們那麼多人穿了西裝，造了那麼多樓……；

海外華人則差一點；海外留學生就悲觀；大陸內部的人就更差。而最悲觀的是最接近領導層的人（鼓掌聲）。我認識有這樣的人，他們說：中國沒有希望，至少現在沒有希望。這就是「相關現象」，大家至少從這個「相關現象」中可以看到中國的問題在什麼地方。問題很深，很深。」

問：「中國大陸的變化趨勢？」

方：「整個世界在變化，特別在亞洲，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變成了發達國家，日本最先，然後香港、南韓、新加坡……以致泰國這樣的國家也在很快發展，好像是物理上的「相變」，從一個狀態到另一個狀態，相變時，如水結冰的過程不一定所有都同時變。中國的「相變」因素就比較弱，在亞洲範圍內中國是過冷區（SUPER COOLING REGION）（鼓掌聲，大笑聲）。其它圍着中國的都熱了，就是中國還冷着。但過冷區在相變中是一不穩定狀態或介穩狀態（MEDIUM STATE）（笑聲）大家可以看到中國社會相當不穩定，一會兒出這個事，一會兒出那個事；一會兒這裡漲價，一會兒那裡學生又怎麼樣了。所以這些情況從世界角度看是「相變」，免不了要走總的趨勢的。」

所以對中國的改革，從近期看前景並不樂觀，因近五年的確進展甚微；但從相應較遠的未來看，反而比較樂觀，因為時代潮流的衝擊，不變也得變。」

問：「你說過不再參加共產黨，你有沒有組織新黨的打算？」

方：「我沒有，我現在沒有。」（笑聲）

與會者中不乏愛國志士，熱血青年，不少人問到對推進中國民主化，作爲個人能做些什

麼？

方：「促進中國民主發展，各界可有不同行動，譬如我的學生有的要做學問，有的要經商，都要鼓勵，私人經商越來越多，中國就有可能出現中產階級，到那時中國的政治不變也得變。」

現在學生運動被壓下去，學生不敢說話，一個原因是政府控制分配，學生沒有別的路，但最近有一個被開除的學生，若按以前一生了，現却被一私人公司聘去，工資較同期畢業的人還高，這說明有私人經濟，在學生民主運動上形成經濟的依托。總之，政治、經濟、文化都需要，在各方面配合，發生作用，中國才能有根本的改變。」

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正如邱垂亮教授指出：方勵之教授的演講和答聽衆問「是直接了當、簡單的語言，但却也是充滿着智慧的，我們聽後可用兩個字形容：同感。」

今天我們能在澳大利亞這片自由的國土上爲方勵之的愛國演講而大聲喝彩，同時也不免爲他返回那片至今仍籠罩着封建專制陰雲毒霧的國土上將是何種命運而擔心。不是嗎，最近剛走馬上任的新貴、國家教委主任李鐵映在「內部文件」中再次誣陷方勵之五月四日應邀參加北大校慶的講話是什麼「煽動」校園「反革命活動」。所以許多聽衆遞條子詢問方教授對自己言論將會對自身安全造成的危險如何考慮。然而，方勵之不愧爲方勵之，他以大無畏的英雄氣概，發出了下面的豪言壯語：「有關個人安危，這不是什麼新問題，我現在的行動，有時還是有人看着（全場大笑）。我覺得個人安危不取決於我自己，我說的話已經一百了，一百加一與一百也差不多（全場熱烈鼓掌）。

我從前也說過，無窮大加一還是無窮大，並不是說少講一點他就會怎麼樣，我想說的我都說了。我的命運並不決定於我，而決定於有無更多的人關心中國的民主、中國的發展。海外的學生、各界華人更關心中國的事，我就很安全（掌聲）。所以，我感謝大家，我的一部分安

全托附在大家身上。

方勵之演說完畢，全場起立，長時間熱烈鼓掌。「澳洲華裔相濟會」、澳洲「華聲報」代表全澳華人向方勵之教授夫婦及邱垂亮教授贈送錦旗、鮮花等，大群留學生湧上前去主席

台請方教授夫婦簽名、或合影留念，台上台下一片歡騰。

方勵之教授，您在澳洲悉尼受到的英雄人物式的盛大隆重歡迎，願您把我國「五·四」以來提倡民主科學的大旗舉得更高，更高！

身隨書後，可返故里

劉自立

不久前，身在美國的蘇聯著名作家索爾仁尼琴表示，如果蘇聯當局允許他的著作在蘇聯出版，他將答應回到蘇聯。

去年十月中旬，索氏通過美國之音向蘇聯三千萬聽眾發表了他的演講。

現在索氏住在美國的 CAVENDISH，住宅周圍每隔幾碼即註明是私人財產，門口有嚴密的監視。自從一九七六年他來到美國，就把自己幽閉在此五十英畝的地域上。雖然，他已不再是美國報紙爭相報導的新聞人物，但他仍然受到各類崇拜者的包圍，並受到許多滋事者的覬覦。但是，他必須節省他的時間，今年他已年屆七十高齡。他並未為他能夠從苦役營中幸存下來或戰勝了三十年前所患的癌症而慶幸。他瞭解自己的使命，而且一直這樣做下去。自從他出版了鼎鼎大名的「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以及後來的「第一輪」、「癌病房」和「古拉格群島」，他一直在研究人被苦

役營、醫院和流放地囚禁的悲慘之狀。即使來到美國，他也深居簡出，形同囚人，但其著作，却一本本從他居所的樊籬中飛出來面世。

索氏常抱怨世人對他的誤解。他對採訪他的記者說：「他們欺騙我，就像欺騙故人。」的確，他已完成了一座流亡者的自我塑像。他所記憶的比他寫的要多得多。

索氏的居所已成為非正式的美國和歐洲猶太人聚會並向世界散佈新聞的活動中心。這裡門庭若市，電話不斷。他的第二個妻子正在主持一種俄國社會基金——它來自「古拉格群島」一書的收入。

索爾仁尼琴每天清晨起床，一直工作到很晚。書房在三層樓的頂層，這房子是一九七六年他獲得一筆財產後興建的。此外還建立了一所圖書館和一座小教堂，為附近的東正教徒舉行宗教儀式。索氏最重要的著作是關於俄國革命的八卷本歷史巨著「紅色車輪」。像「古拉

格群島」一樣（「古拉格群島」還將出二、三卷），它的副題是：文學研究中的一種試驗。這一系列式著作是那種文件體小說，兼歷史寫史與小說創作於一身。

第一部份，第一卷的第一部份出現在一九七二年，題為「一九一四年的八月」，估計一千頁，英譯本將於今年九月份出版。

下一卷的英譯本——「一九一六年的十月」，正在寫作過程中，其後是「一九一七年的三月」。

這些書已有俄文版、法文版和德文版。也許是由於作者對英譯本的苛求，致使英譯本的出版大為落後於其它版本。與此同時，他將完成「一九一七年的四月」。

對此宏篇巨製，作者傾注了全部心力及家人的合作。得力於他的妻子、岳母和他的兒子的幫助。索氏已佔據了關於俄國近代史的大量材料。但是，人們對於他的著作近年來都望而生畏。「它們是難以閱讀的、冗長的、有時幾乎無法理解。」讀者們評論說。

蘇聯人現在對於 GLASNOST 一詞（被譯為開放、公開和暴露）十分感興趣。然而最早對這一辭匯極為關注的正是索爾仁尼琴。「開放、誠實、全面，是一個健康的社會應該具備的起碼條件，對我們同樣適宜云云。」索爾仁尼琴如是說。（譯自「國際先驅論壇報」）

老方，看你的了！



邱垂亮

方勵之，本為世界有名的科學家，對政治理論和行為沒有深入的研究、理解和參與，就憑一股強烈的學士歷史時代責任感和一點簡單、直率、清爽的「民主就是民主、實現民主要用民主的方法」的民主政治的認識和執着，挺身而出，振臂疾呼，在「自由、民主、人權」的一片叫呼聲中，引發了中國大陸千百年來學子的心靈心智的共鳴和迴應，久旱逢雨、一觸即發地造成驚天動地的方勵之民主政治震撼和旋風。

啓蒙運動的人物

方勵之的旋風，把鄧小平的社會主義政權，吹得東倒西歪。

但是，方勵之的全面否定馬列主義，認為它們已過時，已失效力，已科學地證明錯誤，以及他的全盤西化的強硬主張，雖然有其一定的道理和吸引力，但實在相當草率簡陋，哲學理論基礎單薄脆弱。比起劉賓雁的文情並茂、尖銳有力批評中共政權腐敗墮落的報告文學，和王若望的深厚強壯、一針見血的評判、反駁社會主義的共產主義的思想理論著作，實在大大比不上。

因此，方勵之政治旋風，比劉賓雁、王若望、蘇紹智等政治理論重量級人物所造成的政海風波，還要洶湧澎湃的政治現象，實在值得我們深思和研究。為什麼會有這樣怪異的、不平凡的方勵之現象？

看過方勵之的五、六篇一九八六年年底在上海的交通和同濟大學、浙江大學和合肥的科技大學等地的演講後，我的感覺是，他說的都是平平凡凡、實實在在在平常民主公民說的話，除了還敢公開嚴正批評中共的政治統治外，在

民主主義的實質、落實實現層次上，實在沒有什麼奇特突出、驚天動地的地方。我的結論是，他做到了政治言論自由的突破，但是還沒有做到民主政治有效實質發展的推動。

方勵之，只不過是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科學」、「民主」政治啓蒙運動，長期中斷之後的延續和復活的代表人物。

捲入政治漩渦

這個五四的延續和復活的貢獻，當然非同小可，非常重要，但是實在還不值那麼大驚小怪。要不是鄧小平、彭真、鄧力群等人心態保守僵硬，反應過敏，反彈過度，把本來是稀鬆平常的學生游行活動，手忙腳亂地硬打成毛澤東文革圍爭式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方勵之現在恐怕還是一個聽共產黨的話，吃共產黨的飯的高級幹部和大學副校長（也許正校長了）。

也就是說，方勵之是被迫上政治梁山（他本人是說被捲入政治漩渦）的時代錯誤的產物。他是一個心不甘、情不願的「業餘性」的政治人物。

從一九八六年年底以來，我當然非常注意方勵之現象，但是我最有興趣、最想研究、想瞭解的是蘇紹智、嚴家其，然後才是王若望、王若水，最後才是劉賓雁。方勵之，我沒太大興趣，認為不太值得研究。這是我的民主政治學的本位主義的看法。

所以，方勵之本年八月初在西澳出現，並頭電視台訪問時，雖然能大膽直言，批評中國政事，但是一時也沒有引起我太大的注意和興趣。隨後，這裡的中國大陸留學生來找我，表示他們非常希望能由我邀請，請方勵之來昆斯蘭大學公開演講，他們顯露的迫切情懷和願望

令我初時驚訝，繼而好奇，過兩天，半夜台灣「中央日報」來電話要找方勵之訪問：清晨美國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也要找方勵之探情。終於，我的興趣被引起來了。

雪梨之會

我二十五日駕車去新英格蘭大學，中午飯後就「單槍匹馬」，開了八個小時的車趕到雪梨。二十七日九點，楊漢勇夫婦來接我去北雪梨接方氏夫婦。因為迷途兩次，十一點才趕到他們住的旅館。一見面，方夫人（李淑嫻）就不太高興地說：「再過五分鐘，我們就不等了，我們自己去玩。」我們一聽，心涼了一半，知道他們不高興。

我本來也有一點不高興，因為楊漢勇原來是要我和方勵之對談，但是方勵之一口拒絕，說：「人家陳映真和劉賓雁對談，是有三、四個月的準備，兩人又是同行。邱教授和我對談天體物理可以，對談政治，他是專家，我不是，怎麼可以？」

前一晚，老楊告訴我這個變更計劃時，我沒說什麼，人家是貴賓，不願意，我沒話講。只好不對談，而改由我主持演講會。我心裡想：「我主持會議，還是可以講話，也可以問他問題。」

所以，我們一見面，大家都點不高興，有點顧忌，台灣海岸兩邊的人，政治關係上就是那層一層疑慮。

後來，方勵之說，他們來澳洲三個星期了，節目排得滿滿的，什麼也沒看到，二十七日早上半天是他們唯一有的觀光活動。一早等人不到，關在旅館裡，也難怪他們滿肚子不愉快。

我們就這樣默默坐在車裡，一直到世界有名的雪梨歌劇院，他們兩人才一陣驚呼，高興得像小孩子一樣，滿口同時讚美歌劇院的美麗雄壯。我們拼命照像，在歡笑聲中，也才開始交談，海闊天空，自由自在無所不談。

老實講，方勵之一開始給我的印象是，一貌不揚，有點像蔣經國，平凡樸素，木訥樣實，像鄉下佬，一點也沒有政治魅力人物的迷人神情，耀人光芒，更沒有異於常人的頭上的那一道光圈。一直到玩完歌劇院，我們打電話告知相濟會的負責人不去參加他們的豐富午餐，並簡單在海邊西餐店吃了牛排和羊排，再趕去看海底世界的水族館，之後，才在愉快的交談中，開始看到了幾絲這位科學大師、政治離異分子的智者和勇者的智慧和勇氣。

八百人的盛況

我心裡想：是不是真的大智若愚？

從東雪梨的海底世界，趕到西雪梨的相濟會會址，近一小時的車程，下雨。我們認為，交通不便又下雨，聽眾大概不會太多。我想有三、四十人就不錯了。楊漢勇他們則預計是八十人（準備了八十人的點心）左右。

我們遲了十五分鐘。三點一刻到達會場時，才猛然心驚地發現，小小的禮堂內外已經擠得滿滿的密不透風的人山人海。接下來，揚起的一片掌聲和呼聲，響徹雲霄。握手照像之後坐上講台，我一看，不禁驚嘆：「我的媽，怎麼那麼多人！」我猜想，有一半以上是大陸留學生。他們那種滿臉誠摯期待的面色，看得實在令人心動、心酸。

我的介紹詞只是簡短的三點：方勵之政治言論自由的突破以及五四運動「科學」、「民

主」的銜接和延續；他民主就是民主（否定社會主義民主）的說詞；他「中國統一不是重點、民主政治建設才是統一基礎」的主張。

接着，他沒有講稿（他說，他講科學有論文講稿，講政治從來沒有用講稿），沒有準備、沒有系統地講了一個小時的「中國的開放和民主」。零零碎碎地，他大部份重覆了以前講過的話。他說：

文革十年後，中國經濟和政治完全崩潰，非全面改革不可。近十年的改革，前五年有些成就，但後五年面臨問題，非基本性地體制改革不可。

中國的改革目標，就是達到西方國家的發達社會：經濟高度發展，教育水平很高，政治民主現代化的發達社會。

中國人在國外不快樂，被人看不起，因為中國窮。一位意大利研究所所長曾好奇地問：「爲什麼中國人不吃飯？」原來中國訪問學者要省錢回去，不願花錢吃西餐，回去旅館吃「方便麵」。「每次去外國訪問完回國，都想踢中國兩腳。」

中國開放改革政策面臨危機，目前最嚴重的是物價高漲、通貨膨脹。大陸一個副教授每月薪水一百三十元人民幣（下同），最近「大中華」（好煙）漲到一百二十元一條。「我這個二級教授每個月二百五十元，而一瓶茅台酒也漲到二百五十元。」一個研究生只拿七十元，吃飯就要用去（男的）六十元、（女的）五十元，沒有人要當研究生，中國的教育科技前途怎麼辦？留學生要考托福，報名費二十九元美金，有人要用三百元人民幣，才兌換得到二十九元美金。

因爲通貨膨脹，有百分之二十的中國人的生活水平下降，知識分子中則有百分之五十的

生活水平下降。

平凡的演講

同樣嚴重的是，經濟改革帶來的「走後門」、「拉關係」、「倒買倒賣」、「以權謀私」、「賄賂貪污」的不正之風非常厲害。有名北大附近的海淀區（李淑嫻選上人民代表的選區）中關村的「電子一條街」，現在變成「騙子一條街」。中關村的一個信託公司，有二十多個職工，一次竟要開支花去二百萬元。辦商業，要「批條子」賄賂通關已不是彩色電視機或幾千、幾萬元人民幣就可以做到的，現在要美金、日圓的瑞士銀行存款才行。

所以，要經濟改革成功，一定要政治改革，一定要有民主化，要有政治監督。

要政治改革、人民監督政府，要有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更重要的是，首先，人民要爭取做人的基本人權，人不是任何人利用的工具，人要能、要敢使用人之為人的基本權利。

一點鐘的演講，就在「人權」聲中結束。雖然聽眾是聽得聚精會神，連綿的掌聲，更是此起彼落，一次又一次打斷他的演講；但是，我還是感覺方勵之的演講平平凡凡，沒有新意新聲，沒有驚人之筆。甚至有以偏概全（如煙酒價格上漲、瑞士銀行存款、「中國人不吃飯」等）之處。中國留學生吃「方便麵」把錢帶回去給家人，也不是壞事，不需要「人窮志短」。

更重要的是，方勵之還是不能講出中國政治改革、民主政治發展能走、應走的實事求是、落實實踐的道路和途徑。

我聽到的是空言一籊籊。我感覺失望，本來想評論一番，向他提出質詢；但是看到台下

聽眾滿面的激情和熱望，我強忍下去，沒講話，馬上讓聽眾提出問題。

勇者的形象

沒幾分鐘，一張一張的問卷紙就傳到我的手上，我一過目就交給方勵之。

他開始邊唸問題，邊回答留學生和華僑提出的尖銳問題。突然間，好像遇到了有力的挑戰，好像觸到了他智慧的深處、他愛國愛民的極端關懷，方勵之越答越有勁，聲調越高昂，情緒越高漲，脫胎換骨似地，他變得光芒四射，魅力四發，話講得擲地有聲、鏗鏘有力。真有天馬行空，一瀉千里之勢。

在答問聲中，我終於領教了有名的方勵之震撼。他說：

馬克思已經過時。蘇聯和中國的社會主義都不成功，現在兩個都在改革。東歐也在變。戈巴契夫的改革已經涉及到政治的基本問題，鄧小平還沒有。所以，中國的政治改革是否能走上民主的道路，仍難令人有信心。

中共的四個堅持，只是一個形式上的名詞，內容可以變化。四個堅持和過去的「六個標準」一樣，已經變化，其象徵的東西已不代表他原來實質的內涵。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國特色」就不是一個好的概念。

中國要改革、要民主，如何實現？要通過研究才能找出一條確實可行的道路。但這是一個很難的問題，現在沒有明確的答案。

全世界都在變化，越來越多的亞洲國家都走向發達國家的境界，比如最先的日本和現在的南韓、新加坡、台灣，還有泰國等。這種變化用物理學的語言來解釋，就是發生「相變」

。現在中國大陸的「相變」因素比較弱，在亞洲的「相變」過程中，中國是個「過冷區」。不過，從整個世界的「相變」現象來看，中國也一定免不了要走向這個趨勢。

徹底否定反右鬥爭的障礙，是因為老一代的人（鄧小平等）還在。

中國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四十年來不是白幹了？可以用大陸流行的一個順口溜來回答：「辛辛苦苦四十年，一覺回到解放前」。「我沒有離教參政的打算。」「現在也沒有組織新黨（反對黨）的打算。」

如果中國的政經體制不改變，新一代的領導者也會和老一代一樣，儘管語言、服裝、外表不一樣，他們智識心態裡面沒有新觀念、新思想，就做出新事業。中國白痴和文盲實在太多，和台灣情況不同。從現在開始抓教育，也要在一代人以後才有比較高的智能水準，才能有保證的進步。所以，中國發展的「時標（TIME SCALE）」、時間尺度來看，至少還要這一代和下一代過去才有希望。

學生運動的呼喚

現在悲觀氣氛是籠罩着中國人。越不瞭解中國情況的人對中國越樂觀，外國人不懂中國，對鄧小平的改革最抱希望，海外華人比外國人差一點，海外中國留學生又差一點，比較悲觀，大陸的人民更悲觀，最悲觀的是接近領導階層的幹部，他們都說，現在沒有希望。

中國生產資源所有制，應該改。現在大陸的所謂公有制，實在是極少數領導人的公有制，人民是沒有一份的。把它改成私有制，起碼大部份的人民還有一份，比現在的公有制要均勻、要好一些。

學生運動對社會進步的貢獻是肯定的。八六年年底的學生民主運動，有人指責是「幫了倒忙」、「激怒了領導人」等等，這些指責是錯誤的。明顯地，學生運動已經起了很好的作用，這次運動之後召開的中共十三大和人大、政協兩會，有一定的民主成份出現，如差額選舉和投反對票等，都是學生民主運動起了很大的影響，很大的震撼之後才發生的。學生運動的震動，引起社會各方面的注視和思考，領導層也不得不考慮這些問題，而做出某些改變。這次學生運動已經在歷史上寫下了它正面貢獻的一頁。

中國大陸留學生不回國是很自然的，和對得起對不起祖國沒有關係。「我的學生要回去，我也要勸他們不要回去。回國後七十元，怎麼生活？怎麼呆得住？」而且沒有好的設備和試驗室，回去不能發揮所長，不如留在外國繼續發展。

中國國內學生和國外留學生，都應該明確表示自己的態度，繼續支持中國的改革開放民主化。對中國政府越打擊、越給壓力、越刺激它，越好，中國越會進步。去年美國中國留學生聯名發表了一封反自由化運動的公開信，這封公開信在大陸內部造成了極大的震撼。這就是表明自己明確的看法，「我們有權監督政府」。

說到了一百加一

因為發表民主言論，回國後會不會遭受政府迫害？這不是什麼新問題。誰也不能保證很安全。「不過，安全與否，不決定於我個人。實際上，我已經說到一百了，一百加一和一百

差不多。我的話都說了，我少說也不會對我怎麼樣。我的安全，並不決定於我個人，而是決定於更多的人關心中國的民主，關心中國的社會發展，如果更多的人關心，我想我就很安全。所以，我很感謝大家，我的一部分安全是托付在大家身上。」

一陣又一陣，一片又一片，震破人耳的掌聲，在這間小禮堂內外響徹雲霄。聽眾真的聽得如醉如痴，外面下雨，撐傘的聽眾沒有一個離開，就在雨中把頭伸入窗口地站了三個小時，裡面坐着、站着的聽眾，更都全神貫注，一個字、一句話都不願錯過，幽默的地方大笑、精彩的地方大鼓掌，嚴肅悲壯的地方，還有人流下了淚。

我實在是又感動、又迷惑、又心痛。我心裡一直苦苦地想：「爲什麼這麼一個純質樸實的大科學家會變成中國良心的代表、發言人？」

我本來計劃在結束演講會時，介紹台灣黨外運動、民進黨建黨的民主政治發展經驗和程序，並鼓勵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蘇紹智等人走類似的黨外運動和成立反對黨的民主政治不歸路。

但是，三小時的演講，大家身心都已疲憊，我實在不能鐵石心腸再給他們更大的要求和壓力。所以，只幽默地說了幾句結束了這場雪梨華人世界裡史無前例的演講會：

我們今天終於領教了方勵之的震撼，真是名不虛傳，難怪鄧小平都怕他怕死了。

有聽眾建議方勵之寫自傳，我認爲還太早。方勵之應先當當中國教育委員會的主委，取代李鐵映，五年有成後可以考慮當當總理，作一番後才可以寫自傳，才有資格寫自傳。

要看誰？

在一片轟烈笑聲和掌聲中，我請李淑嫻上台接受獻花和獻禮物，並宣佈演講會結束。一下子，中國留學生一擁而上，把方氏夫婦團團圍住，我也沾了光，也被團團圍住，問問題的問題，要簽名留念的要簽名，亂成一團、火烈烈的一片熱情。

混亂中，一位中國留學生（訪問學者）站在禮堂最後面，大聲吼叫：

「老方，看你的了！」

混亂中，方氏夫妻被留學生擁走，我也被擁至另一房間，我和他倆再也沒有見面。

當晚，深夜，累扁了，迷迷糊糊正要睡着，電話鈴響了。是方勵之，他向我表示謝意，並說再見。

我也只祝他回國一路順風，我不忍心也叫「老方，看你的了！」

回布里斯本後，這幾天和中國留學生再聽方勵之演講的錄音，並開座談會探討方勵之現象，我還是不能完全瞭解，什麼是方勵之現象？爲什麼會有方勵之現象？

我還是認爲，方勵之現象是中國政治發展歷史時空中錯誤的產物。他是今日中國的打風車的唐吉訶德。他是一位有成就的天體物理學家，甚至可以成爲一位人類二十世紀偉大的科學家。但是，他陰錯陽差地捲入中國政治，變成中國良心的代言人，中國民主政治發展的過河卒子。他可以發動學生民主運動，但不能、也不知道如何組織、領導有實際可行政策、可運作程序和制度的政治活動、政治組合、政黨集團。他心有餘力不足，更何況是單槍匹馬，一定不可能有效行動地落實推進中國困難重重



布哈林

我起誓

曉志

最近，蘇聯最高蘇維埃和最高檢察院宣布為布哈林平反，使這樁歷時半個世紀的冤案總算有了了結，這也是布哈林在臨終前所估計到的。這裡刊出布哈林遺孀布哈林娜在蘇「星火」雜誌上發表的回憶錄和她與該刊記者的談話。

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同志：

儘管現在面臨緊張的國際形勢，我仍想向你提出已故的我的丈夫尼古拉·伊凡諾維奇·布哈林恢復黨籍的問題。這一正式申請不僅僅出自於我，而正是當年布哈林本人的要求。在他最後一次出席一九三七年二月到三月的黨的

全體會議後，他就預感到他再也回不來了。考慮到那時我還年輕，他請求我為他死後恢復名譽而奮鬥。這一令人心碎的時刻永遠無法從我的記憶中抹去。他被審訊和嚴酷的、不容分辯的審訊弄得精疲力盡，也被為抗議對他駭人聽聞的指控而進行的絕食搞垮了身體。布哈林跪在我面前，含着眼淚請求我不要忘记他寫給「未來的黨的領導人」的一封信中的任何一句話，懇求我為他的平反昭雪而竭盡全力：「你起誓，你會做到，起誓！起誓！」我起了誓，違背誓言將使我的良心不得安寧……

這是布哈林的遺孀安娜·米哈依洛夫娜·布哈林娜寫給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的一封信。在不久前的戈爾巴喬夫總書記的一次報告中，正式肯定了布哈林在蘇聯十月革命中的功績和他的歷史地位。

布哈林的妻子安娜·米哈依洛夫娜出生在一个職業革命家的家庭，她的父親拉林是十月革命著名的領導人之一，也是布哈林的好友。

安娜清楚地記得她第一次見到布哈林時的情景，那還是她童年的時候。有一次，安娜的母親帶她去藝術劇院看了一部叫「藍鳥」的戲，回家之後，她在睡夢之中忽然感到有人在捏她的鼻子，她大聲地叫了起來，那個捏她鼻子的人正是布哈林。那時布哈林經常到她的家找她的父親敘談。

當時，她並沒有把布哈林看做是成年人，也許是布哈林比較年輕的緣故。她對她父親的所有朋友都用「您」來相稱，而對布哈林只例外地用「你」這個親切的稱呼。有一次，列寧來到了她父親的辦公室，那兒經常有許多人，當時在她的眼裡列寧只是許多普普通通的人中的一個，她對列寧的印象不是很深刻，但有一個有趣的情景却記得很牢。那天她走進她父親

辦公室的時候，正巧布哈林剛出去，顯然辦公室的人都在議論他。她沒能記住列寧是怎樣議論布哈林的，但有一句話記得很清楚，列寧說「布哈林是革命的金童」列寧對布哈林的這一評價，在黨內圈子裡是很著名的。安娜却不明白列寧這句話的含義，她反駁道「布哈林不是金子做的，他是活人。」「當然，是活人。」列寧回答說：「我這樣叫他是因為他長了一頭金髮。」

布哈林是拉林家的常客，每當他離開的時候，安娜總是戀戀不捨，跑出來向他道別。拉林對安娜經常在布哈林身邊非常贊許，因為自己久病在身，不能經常使得女兒快樂。拉林本人也經常把女兒帶到他老朋友的住處。

安娜經常在布哈林的住所碰到斯大林。有一次，那是在一九二五年，已是青春少女的安娜，給布哈林寫了一首情詩，詩的結尾是：「我多麼想見你，沒有你在身邊我總是憂鬱」，少女的膽怯使她羞於把這首詩交給布哈林，她把詩給父親看，拉林說，既然寫了，那就去交給他。安娜把詩放進一個信封內，懷著惴惴不安的心情從三樓下到二樓，碰巧遇見了斯大林，斯大林也是去找布哈林的。安娜沒怎麼多想，就請斯大林把信封轉交給布哈林。斯大林欣然應允。就這樣，通過斯大林，安娜把平生第一首情詩交給了布哈林。對安娜來講，這是怎樣殘酷的命運的諷刺啊！

一九二七年，根據斯大林的要求，布哈林住進了克里姆林宮，安娜要想見布哈林就比較困難了，因為沒有通行證是不允許進入克里姆林宮的。後來，布哈林為她弄到了一張長期有效的通行證。為了能經常見到布哈林，安娜每次上學的時候特意走遠路，繞道經過克里姆林宮，只為能見上他一面。布哈林公務愈來愈忙

，去拉林家的次數明顯減少了。

三十年代初，布哈林和安娜又能頻繁接觸了，他們倆一起上劇院，參觀藝術博物館，一起在林蔭道上散步，安娜有時也直接到布哈林在克里姆林宮的辦公室去看望他。他們一起上街的時候，布哈林喜歡乘公共汽車。行人往往能把他認出來，時常聽到人們議論：「瞧，布哈林乘公共汽車。」有時行人直接和他打招呼：「你好，尼克拉·伊凡諾維奇。」布哈林熱情地和他們握手。

終於有一次，當他們倆坐在普希金紀念碑旁的一條長橋上時，布哈林告訴安娜，他想和她進行一次嚴肅的談話。布哈林說，他必須從兩個方案中作出一個選擇，要麼和她結婚，要麼離她遠遠的，長時間不見她，好讓她習慣沒有他而獨立生活，因為他們的感情到了非作出決定不可的時刻了。

安娜抑制不住哭了起來，她太興奮了，她感到心靈在震顫，同時，她也為自己拿不定主意而難過。布哈林有點不解地望著她，不過，他確信，安娜已經作出了選擇，不然的話，他不會向她表白。他們長時間默默地坐着，布哈林用他溫暖的雙手緊緊握住安娜凍得冰涼的手。

第二天晚上，布哈林請安娜去大劇院看演出。深夜，他們倆回到了安娜的住處，安娜的母親已經睡了，拉林還坐在辦公桌邊，他一眼就發現了女兒興奮的神態，拉林請布哈林在他家過夜，布哈林當晚就睡在辦公室裡的沙發上。第二天一清早，布哈林就去上班了。拉林對女兒說：「你應該仔細考慮你自己的真實感情，布哈林很愛你，他是一個感情豐富的人，如果你的感情還不穩定，那麼就應當離開他，要不然他會承受不了的。」

海南熱落潮了！



您見過加利福尼亞的淘金熱嗎？一九八七年的海南島就曾經重現過當年的盛況。一股洶湧的人才熱流會從大陸的各個角落向海南省撲去，幾乎將這個三萬平方公里的海島湮沒了。一批批躊躇滿志的大學畢業生湧到這裡，希望在這個自稱是中國最自由的土地上大展鴻圖，熱情不亞於當年深圳的開拓者。

當時，海口人才交流中心每天接待六百多人，每天收到求職信八百多封，通向海口的船票、機票成爲緊缺商品，價格在「倒爺」手中成倍翻番。

可是如今，在海口的大陸角，再也聽不到那人才大潮的拍浪聲了，仿佛這裡什麼也沒發生過。幾個稀稀拉拉的小食攤，像大潮退去後留在沙灘上的貝殼，點綴着這淒涼的景象。

攤點的老闆叫人看起來總不太順眼，似乎與衆不同。他們幾乎都帶着厚厚的眼鏡，一付書生氣，一看就知道是從大城市來這裡求職的大學生。

一個操着河南口音的小食攤老板說：「這個攤子是我在兩個月前花了五百元錢買下來的，原來的主人是成都來的大學生，一對夫妻。求職不順，所以買了這個小食攤維持生活，後來堅持不住，不得不撤回四川去了。我是學數

學的，求職更難，但我不死心，再堅持一個月再說。」

另一個小食攤的主人是一位普通話純正的姑娘，她是遼寧大學歷史系的畢業生，她說：「我是七個月前到這裡的，在這些小食攤中資格頗老了。當時我來時，充滿了熱情，過去我曾經看過很多特區拓荒者的報告文學，被他們的精神所感動，自己也想親身體驗一下那沸騰的生活。可是誰知一上海灘就攔淺了。找不到工作，成了待業青年，於是經營起這個小食攤。不過我打算在這裡再待一段時間，我想寫小說，要體驗一下生活，積累一點素材。」

從滯留在海口街頭的大學生口中得知，剩下的求職者已經不多了。所以，堅持下來的人已經比較容易找工作了。不久前人們還傳聞這裡大學生求職難，可是幾天之內已有上百人找到了飯碗。最近，海南島派人赴北京、西安、重慶、武漢、南京等各地招聘人才。由守株待兔轉爲主動出擊。可是各路招聘組成績不佳，紛紛撤回。據人才交流中心的統計，同意辦遷移手續的，武漢有二十三人，北京十五人，而南京、西安、重慶竟無一人。大大出人意料。而當地人才交流中心現在平均每天接待人員不足十人，來信不足百封，這個人才大潮的落差之大，真是具有戲劇性。

中產階級與民主政治

● 王炳章 ●

「只有出現了中產階級，才能搞民主政治。」這是某些人的觀點。持這種觀點的人還舉出實例：台灣和南韓的民主化進程較快，主要是因為中產階級的興起。反之，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不如台灣、南韓的那樣蓬勃、持久，乃因中產階級未出現之故。

這種觀點是片面的。

首先，世界上大多數民主政體的建立，並非在其本國中產階級形成之後。拿民主的樣版美國來說，兩百年前，她根本沒有什麼中產階級，但却創立了對人類歷史影響巨大的民主憲法和民主政體。當時，五十幾個制憲先賢在費城設計民主體制，其目的之一是保護少數有錢人的權利（只有那些有財產的人才投票權！），並非保護所謂多數中產階級的利益（因為根本就沒有這個階級！）。再以北歐民主國家丹麥而言，她在一八四九年實施了民主憲法，但當時她的大部分國民是並不富裕的農民。同樣，挪威、瑞典、瑞士和澳洲等現代強國，在其民主制度建立時，都是以耕作經濟為主的農業國，哪來的什麼中產階級？這些國家發展的實踐證明，正是在優越的民主制度下，社會的安定有了保障，工業得以迅速發展，強大的中產階級隨之形成。因此，毋寧說，在歐美諸民主國家，中產階級是民主政治的結果，而非民主政治的導因。當然，也有理由推論，由於強大中產階級的興起，社會的兩極化發展受到抑制，民主制度得到了進一步穩固。

其次，現實還提供了另外一種範例：有了強大的中產階級，但並未建立起完善的民主政

體。像新加坡。

南韓、台灣也屬於不完善的民主政體範疇。在這些地區，中產階級逐步崛起，民主運動日益高漲，尤其是近年，民主化的脚步特別迅速。這些地區的經驗似乎表明，崛起的中產階級有力地推動了民主化的進程。

因此，我認為，民主政治和中產階級的關係應該是：在已經建立民主政體的地區，中產階級的形成有利於鞏固民主制度；在尚未建立民主制度的地區，中產階級的興起有利於民主政體的建立。那種「沒有中產階級就不可能有民主政治」的論點，是站不住腳的。

在中國大陸，關於中產階級與民主政治之間的關係問題，或者確切一點說，關於經濟發展與政治民主化之間的關係問題，存在幾種模糊的認識。

其一，有人直接了當地認為，大陸尚未形成中產階級，故推展民主政治為時尚早。此點，我在前面已舉出正反實例加以駁斥。

其二，不少人說，中國是農業國家，大部分是知識不高的農民，因此，不可能實行民主政治。丹麥、挪威、瑞典諸國的歷史發展，不支持上述論點。

其三，很多人主張，只有等經濟發展了，下一步才能談民主政治。持此論點的人受美國政治學學會會長、哈佛大學教授漢汀頓的理論影響頗深。漢氏在研究了一些拉美國家和東亞第三世界國家的經驗後，曾發現，在這些「專權」國家（注意不是「極權」——筆者），非民主的權威統治所創造的政治穩定環境，是保障

經濟起飛的重要條件。

中國大陸的一些改革者，包括某些高層領導人，很欣賞漢汀頓的理論。他們固執地認為，現階段爭取民主，就會破壞安定團結的局面，就不利於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他們還推行出一套「犧牲論」，即：現階段人民應該犧牲民主自由的要求，以換取政治上的穩定，配合中央搞經濟改革。等經濟上去了，政治上自然而然就會民主了。

持這種論調的人忽略了，中國大陸的社會現狀與經改起點是與南韓、台灣和拉美國家不一樣的。後者為專權、或稱權威主義社會，政府只在政治上實行強權統治，意識形態上管得不多，經濟上本來就是市場經濟的體制。反之，在中國大陸，共產黨實施的是極權統治，即意識形態、政治、經濟全面管制，三個因素互相咬合為一體，只動經濟一個因素而保持意識形態、政治體制原封不動，是根本不可能的。例如，經濟改革的主要內容之一，是肯定私有制、發展私有制。這必然衝擊共產黨的意識形態——「私有制是萬惡之源」的理論。此外，經濟要發展，勞動力市場必須開放。勞動力市場的開放，即人才自由流動，是人身自由解放的一環，一旦實施，共產黨政治控制的機制——人事制度和戶籍制度將隨之瓦解。這馬上涉及到政治體制和自由民主的問題。一言以蔽之，在共產黨國家推展市場經濟，一定要放鬆和解除共產黨對經濟、對人身自由的控制。這本身就是政治。在共產黨國家最早進行經濟改革的南斯拉夫已故總統鐵托，就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共產黨國家的經濟改革，實質上是政治改革。

「專制維持社會穩定——保障經濟起飛——造就一批中產階級——再搞民主」的論調可以休矣！當前中國大陸的極度混亂，正是對此論調的諷刺。

肯塔基：

舒戈

誰在留學生中製造分裂？

美中地區的肯塔基大學的中國大陸留學生

目前出現了兩個「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英文名字不同，一個是「ASSOCIATION OF 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ARS」(ACSS)，一個是「CHINESE STUDENT AND SCHOLAR ASSOCIATION」(CSSA)。

十月一日兩個「聯誼會」都舉辦了「國慶和中秋聯歡會」，時間是一個在下午五時，一個在上午十時，表面上看內容一樣，都為慶祝中國大陸國慶和傳統的中秋佳節而舉辦，但實質和氣氛截然不同。這是海外的大陸學生第一次公開分裂，成立同一名字的對抗性組織。

上午的「聯歡會」是由CSSA舉辦，在農學院的一個大禮堂舉行，同時也是CSSA的成立大會。中國大使館的二等秘書夏穎奇携夫人親臨大會，並由中共使館出錢，宴請同學，食物都花錢從餐館買來的，CSSA有中共官方支持財大氣粗，但儘管食物豐富，又有獲獎電影「紅高粱」，整個聯歡會仍然是充滿了緊張的氣氛。同學之間發生激烈的爭執，大使官員對一方同學全力支持，對另一方杯葛恫吓，造成了中國同學之間的分裂、不信任、甚至是敵對。

ACSS下午在兩間小教室舉辦了另一場「聯歡會」，同學們自帶拿手好菜，自己動手做了月餅，請了許多美國朋友，放映了中國的錄像片，雖然沒有CSSA那麼多錢，那麼好的電

影，但氣氛極其融洽，中外朋友歡聚一堂，共同慶祝中國人的節日。

兩個「聯歡會」都給人以深刻的印象，以前一般的美國人都認為校園裡有兩種中國同學，一種是大陸學生，一種是台灣學生。今天大陸同學又分成了兩個團體，一個是中共大使館拿錢支持的，另一個是同學自發的獨立的而被大使館所否定的。這種局面是怎麼形成的？還是要從今年五月份談起。

以前肯塔基大學和其它美國大學一樣只有一個「聯誼會」，英文名是「FRIENDSHIP ASSOCIATION OF 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ARS」(FACSS)。由於大部分同學不滿上屆聯誼會的官員，他們經常打學生的「小報告」，充當中共大使館控制學生的工具。五月二十一日，在職員改選的會上，選出了學生民主運動的積極分子任松林和中國民聯的公開成員吳方城為正副會長，中共使館公開宣佈不能接受這次的選舉結果，派遣兩個官員夏穎奇和俞肇基親臨肯大，利用親中共的美籍華人教授高德育妄圖扼殺民選結果，並於六月一日導演並親自主持一次重選，選出了中共首肯的學生為正副會長，一個「聯誼會」就這樣出現了兩個職員機構。肯大學校原先已經承認五月二十一日民選的任松林和吳方城為合法的副會長，後來迫於中共和高德育的壓力宣佈

，兩次選舉都不承認。任松林他們為了爭取民主選舉的合法化，一直據理力爭，美國的輿論界給予了很大支持。英文的「LEXINGTON HERALD LEADER」、中文的「世界日報」、「九十年代」、「爭鳴」、「中國之春」、「少年中國晨報」和「國際日報」都發表新聞和文章支持中國學生反壓迫、爭民主的鬭爭。

學校當局為了化解矛盾，要求兩方會長改名分別註冊，任松林他們一再表示不希望中國同學分裂，希望舉辦聽證會，辨明是非，緩解矛盾，但一直遭到中共使館和官辦聯誼會的拒絕。

在這種「聯誼會」名存實亡的情況下，肯大八月底開學又來了許多大陸的新同學，任松林、吳方城和許多同學設法幫助新來的同學安排住宿，接送新生。「聯誼會」的工作在他們的主持下正常運轉，得到了許多同學的贊賞。

九月中旬，眼看中秋佳節和國慶已到，為了使肯大的中國同學能聚在一起慶祝節日，任松林和吳方城仍以FACSS的名義發出通知，在十月一日下午五時舉辦「國慶、中秋和迎新晚會」。為使館工作的同學得知此事，馬上通知中共使館，在使館有關人員的支持下，立即行動，一週之後，發出通知宣佈成立另外一個「聯誼會」，英文名字改為CSSA，並通知在十月一日上午十時舉辦「聯歡會」，以對抗任松林他們在下午五時的「聯歡會」，肯大的同學們對此充滿了疑問……

十月一日上午，在肯大農學院的大禮堂裡，CSSA的會長融××發給每一個前來的中國同學一張申請表，並宣佈該會領導由融××、李××、王××和葉××四人組成。並設立常務會，要求每一個大陸學生申請參加，但參加者必須經過他們批准，會員可以享受優惠，同學

們早知肯大原來的選舉風波，今天又出來一個「聯誼會」，並且大使館的夏穎奇秘書携夫人親臨大會，感到非常不明白。化學系的吳芳芳同學和許多同學在會上提出問題，既然要求大家參加，就要求融××解答，這個「聯誼會」的背景和經費來源。融××拒絕回答，並無理要求吳芳芳出去，許多同學非常不平，當場質問融××等人，他們不但不回答同學的質詢，並且態度極其惡劣，其中一個叫傅××的公費學生竟然動手打提問的同學，大使館官員夏穎奇和他的夫人支持融××、傅××等人的無理態度，並且辱罵提問的人提出的是「愚蠢的問題」，並說「錢是我給的，我全力支持」。還當場記下提問題的人的姓名，國內工作單位和簽證類別、護照類別。這一切馬上引起大家的公憤，兩相對壘幾乎不可收拾，同學們要求解釋為什麼打人，他們不承認，在很多人的指責下，融××等人感到情況不妙，溜出會場。同學們繼續質問夏穎奇，為什麼用國家的錢去支持少數人組成的共產黨式的常委會來審批控制學生？為什麼要同學們接受非民主選出的「聯誼會」？為什麼少數人就有權批准同學們是否是「聯誼會」的會員？任松林當時指出夏穎奇從六月份以來在肯大的一系列活動是分裂中國學生、壓制民主，要求夏對分裂中國同學負責任，夏和他的夫人被駁得理屈詞窮，但仍百般抵賴。

事後，夏穎奇在第二天、第三天召集部分同學開小會，聲稱「這次事件是中國留學生中最嚴重的事件」，並要求一部分人出來孤立打擊提問的同學。並宴請學校的有關人員，想依靠美方學校當局來壓制任松林他們的聯誼會和打擊提問的同學，使同學們再也無法忍受這種明目張膽的欺辱和壓迫。

與此鮮明的對照，下午五時，任松林、吳方城他們的ACSS組織的「聯歡會」，許多同學帶來了自己做的月餅、春卷、包子和拿手好菜，外國學生顧問、教授和許多美國朋友參加了聯歡會，也帶來了許多自己做的菜，中外朋友共聚一堂、暢所欲言，充滿了友誼的氣氛。同學們自覺地主動地辦好了自己的晚會，大家都說「這是自己辦的，上午的是大使館辦的」。美國朋友也開玩笑說：「你們兩個會名字太接近了，倒不如一個叫大使館的聯誼會，一個叫獨立學生會好。」

我如實地記錄了十月一日在肯大發生的風波，事非自有公論。肯大的風波將給那些善良的、輕信中共諾言的人敲響警鐘，試問對待自己的公民尚且如此專橫的統治者，可能在九七年以後保證給香港人民民主自由嗎？那些高談統一的、奢談一國兩制的人，不正是中國留學生分裂的製造者嗎？

善良的人們，中國人的民主權利要靠我們自己來爭取！



林口 印刷公司

彩色報紙 各型雜誌 宣傳刊物 大型海報

☎ : 718-937-5141

718-937-5301

🏠 : 50-22 23 ST.

L.I.C., N.Y. 11101

LISCO PRINTING CO.

平靜反叛

林芽

中國留學生爭取自由



譯者按：十月十三日美國肯塔基州的英文日報 LEXINGTON HERALD LEADER 地方版頭版頭條刊登了記者傑米·魯克 (JAMIE LUKE) 的報導，題為「平靜的反叛：中國留學生尋求更多的自由」，報導了最近發生在肯塔基大學和普渡大學的事件。刊頭刊載了肯大化學系研究生吳芳芳的大幅照片，題為：「吳芳芳渴望返回中國，但因其坦率直言而害怕已被列入黑名單」。下面是該報導的全文：

肯塔基大學中國公民們的平靜的反叛已經擴展到了印地安那州的普渡大學。

觀察家們說，這是在美國留學的中國學生、學者反抗中國官方、爭取獨立的群眾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因為中國官方一向嚴密監視留學生的行動。

持不同政見者、肯塔基大學的植物病理學家吳方城說：「人們稱之為『肯塔基模式』」。

有些人認為吳方城作為一個在中國遭禁的政治組織——中國民聯的公開成員，想利用這

一矛盾為「中國之春」服務，「中春」是一個主張民主，被北京當局認為是「反共」和「顛覆性」的雜誌。

雙方都認為，肯大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二一四名留學生和學者中的大多數只想在此完成學業而免於政治糾葛。

肯塔基大學的論爭是從五月份吳方城被當選為一個學生組織的副主席而開始的。這個組織與中國政府關係密切。

由於他的「中春」成員的身份，吳方城的當選不被使館官員所接受。一些學生說，選舉中有違規現象。

不到兩個星期，又舉行了第二次選舉。兩個中國大使館的官員從華盛頓趕到列克星頓，臨場監督了無記名投票，搞出了一套為使館所接受的負責入班子。

從那以後，肯大的中國留學生就分裂成兩個組織。

一個組織是由吳方城和研究生任松林所領導，任也是在首次選舉中當選的。

另一個組織由研究生融亦鳴負責，從中國使館取得支持和金錢。

曾監視五月份選舉的使館官員夏穎奇，在十月一日又回到列克星頓。這一天，兩個對立的組織分別舉行了國慶慶祝會。

吳芳芳說，部分留學生對使館支持的那個組織的作用提出了尖銳的問題。夏穎奇的反應是追問這些提問者的簽證類別（吳芳芳與吳方城無親屬關係）。

她說，夏問的問題實際上是暗示的恐吓，他親臨肯大為的是威脅同學。夏對此否認，他同時也不承認他過問同學簽證的事。

在印地安那州西拉法耶特市的普渡大學，中國同學會在九月十日選出了新的負責人，他

們是在公開反對大使館對學生組織的控制之後當選的。

普渡天體物理學系的研究生周子野說，普渡的中國留學生知道肯大的選舉事件，但普渡的選舉並不是因為肯大事件而引起的。

他說，不少普渡的中國留學生對前任會長很不滿，因為他反對學生聯名請願要求中國政府放鬆對出國留學的人員的護照限制。

新選出的負責人保證為同學的利益服務，他說，「不再扮演大使館分支機構的角色」。

與肯大不同的是，普渡新選出的負責人中沒有一個是「中春」的公開成員。選舉之前駐芝加哥的中國領事館的官員來到了普渡，但沒有在投票時到場。他們也沒有要求再選第二次。

北大校長丁石孫將被罷官？

昨之

據說，前不久，北大校長丁石孫對他的一位好朋友說：就任好幾年，沒想到現在我這麼受群眾歡迎。

這話不假，打倒四人幫後，北京大學的校長已換了三次，先是周培源，然後是張龍翔（化學系教授），從八四年起是丁石孫。相比之下，丁石孫的聲譽最好。

丁校長的聲譽好，原因無它，皆因他多一些民主思想、少一些官僚作風。他對於北大爭取自由民主的學生一般能夠注意保護，在開會時比較敢於講真話。所以受到人們歡迎。

「這裡的情況頗為微妙」，周說。他補充說，「我認為大使館或領事館都不會喜歡這次選舉的結果」。

肯大及普渡事件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中國官方正日益擔心「人才外流」，擔心中國留學生在完成高等學位之後留在美國和其它西方國家不歸。

與此同時，歸國的留學生抱怨說，他們被分配給工資低，奴隸般的工作，作研究無人支持，所受的教育在中國白白浪費掉。

使館官員夏穎奇認為，肯塔基大學的持不同政見者可能想為在美國尋求政治避難而製造一個事件。

然而，吳芳芳說，這並非是她的目的。她渴望在完成學業之後回到中國與家人團聚，但

她因自己坦率直言將被列入黑名單而深感恐懼。

傑斯庭·于（JUSTIN YU）——紐約一家在台灣出版的中文報紙「世界日報」記者，一直在關注肯大及普渡發生的事件。他說，這看來是一個大潮流的組成部分，在這個潮流中，中國留學生正努力實現在美國的獨立，並希望在他們歸國時能在中國實現一個更為開放的社會。

「這就像毛主席曾說過的一樣，」他說，「即便從外空飛來的一個小小的火花也可以把整個森林點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譯者）現在所發生的事情就是這樣。」

選，更是由於丁石孫現在廣受海內外注意，貿然撤職恐怕會引起強烈的反響，故而決定目前暫不動手。

在此期間，丁石孫的校長實權已遭削弱。黨委書記王學珍已兼任教務部負責人，這就奪走了校長的部份權力。估計過不了多人，當一般人對北大的消息不大注意時，國家教委將以調換工作的堂皇藉口，撤掉丁石孫的校長職務。

幾年來，北大的黨委書記也換過好幾人。比較起來，人們印象最好的是韓天石。五十年代初期，韓天石被捲入「高饒事件」受貶，倒了二十幾年的霉。韓天石人比較開明，八〇年北大學生轟轟烈烈搞競選，他的態度大體上是同情的。因此開罪於黨內頑固派，一年後就被調離北大。當時另一位副書記馬石江，屬團派，也較開明，後來也調離了北大。

這就是中國的官場，好人總是呆不長。■

關於 J-1 居留的合法性

——給國會議員的一份報告

編者按：

J-1 學生的權利問題，最近已成為一個十分引人注目的事件。一些持 J-1 簽證的中國留學生目前正在採取各種辦法爭取自己正當權利，其中包括訴諸法律和遊說國會。本刊登載的是舊金山的劉律師受一些 J-1 學生的委託寫給加州國會議員湯姆·蘭特斯的報告，請求他在國會提出有利解決 J-1 學生正當權益的議案。

我們希望所有 J-1 學生都能行動起來，動員自己的導師和當地的僑團寫信給蘭特議員，支持劉律師的提議，促成國會作出有利於自己的決議。當然，親自寫信也可以，但由美國公民出面效果更好，因為國會議員會更尊重選民的意見。

劉律師和蘭特議員的地址分別如下：

LAW OFFICE OF
EDWARD C·Y·LAU
555 MONTGOMERY ST·
5TH FLOOR SUITE500
SAN FRANCISCO CA 94111-2555
TEL:(415) 956-1111

THE HONORABLE TOM LANTOS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1707 LONGWORTH HOUSE OFFICE BLDG
WASHINGTON D·C·20515-0511

親愛的國會議員蘭特斯：

我收到大量的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學生的來信抱怨因為他們簽證類型帶來的一些問題。這些問題所帶來的惶惑和困難，不僅僅只涉及這些外國學生，同時也波及到美國公民及其家庭以及美國的雇主。主要的問題是對於有關法律的有爭議的解釋以及給有關法律下定義和解釋時缺乏指導。問題牽涉到如此眾多的中國學生，因此，我認為您應當為澄清國會關於此事的意圖而有所表示。

事實

給衆多國家的大多數學生的簽證通常是 F-1 類型的。但是從中華人民共和國來的却絕大多數為 J-1 交換型的。F-1 與 J-1 之間的區別就在於 J-1 持有者在學成後必須回國兩年才夠格回美國。這一規定是對所有這些 J-1 學生的，不管是受中國政府還是受美國政府的資助，也不管這些學生的專業是否屬於中國規定的緊缺人材而被列入「交換學者專業清單」。交換學者這個項目的動機沒有什麼不好。我們也認為受政府資助的學生應當回國兩年報效祖國，發展中國家送學生來美國學習重要的技術再回國受雇兩年也沒錯。中華人民共和國要求她的學生回國自然也無可非議。然而，我發現有些規定跟這個條律是不吻合的。許多學生接受了很少量的資助純屬無稽。美國新聞總署認為任何資助都是政府資助，其實有些數額之少，說是政府為交換項目提供的資助實在都難為情。諸如學生臨行前給五〇元的旅途零用錢，或者一張官辦航空公司延期付款的飛機票（或許更好點不要付錢），偶爾收

到一筆幾百塊錢的貸款，以便籌備出國前的個人必需品等等。這類費用實際上是花在交換項目實施之前的。交換項目真正所需的費用是在實施過程中通過非官方的助學金、獎學金，以及通過助研或助教的方式而獲得的，而學生也只能在他註冊入讀的院校才能得到。

有些學生所學專業雖然被列入他們國家中的緊缺關鍵學科，然而他們發現他們的國家却没有實際的工作條件來應用他們的實際專長。

有些學生還抱怨當他們去申請簽證時政府解釋的混亂性導致他們根本不知道F-1的不同在於無需按規定回國兩年，政府甚至提供導致美國領館誤會的資助情況。除此之外，向聯邦新聞總署提供的名單也不準確，致使有些人續簽J-1時在不問情由、毫無證據，也沒有解釋的情況下，就被按上了回國兩年的規定（注在IAR-66表格上）。

還有些學生發現在交換項目實施過程中，他們的情況發生了一些變化，並嚴格要求解除這一回國限制，但是由於構成困難的所謂標準是如此不確定以致無人能明確這些正在使用的標準是什麼。

美國約有二萬五千名從中華人民共和國來的留學生，其中申請免除兩年歸國限制的約有二千五百名，有些已經申請了很長時間。受這一問題影響的有他們作為美國公民的配偶以及孩子、有美國的研究機構、有美國的雇主（尤其是高科技），這些雇主非常需要雇用這些外國人，受影響的也包括美國公眾，因為他們受益於這些學生所具備的知識。他們當中的許多人不想回國的決心如此堅定，導致他們奔向其它自由國家例如加拿大、法國、英國等。而它們是在技術方面與美國競爭的國家。美國缺少科技人才，而外國的科技人才正是美國最寶貴的

財富之一。這些研究人員對美國的科學技術做出了極為重要的貢獻。許多律師無知地忠告J-1學生先回國兩年再回美國，殊不知這些學生再不會獲准出來，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並沒有旅行的自由。中國人甚至在中國的某些省份之間尚需批准才能旅行，更何談離境？幾乎肯定的是這些學生即使回國過兩年之後也絕不會獲准再次出國。

分析

一、政府資助：中國政府已向新聞總署提供了共三份據說是拿了政府資助的學生名單。這當中包括了那些只拿了很少甚至根本没拿政府資助的學生，也包括了那些拿全助學金、全獎學金以及拿全助教的學生，甚至包括那些從親友處得到私人贊助的學生。中國政府甚至將補貼也列入政府資助。由於中國一切都屬政府所有，把私人雇主或銀行與政府區別開來根本無從談起。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所施行的控制，從食品、服裝補貼到職業、銀行、高等教育機構、生產部門，無所不包，因此，政府給予將要出國的學生一點外出補貼或補貼購買一些為出國而用的個人物品，實際上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機制的正常功能而已。

應當考慮到國會可以制定一個合理的補貼款額把它列為實際交換項目費用而劃入政府資助。交換項目的費用通常包括學費、書費、住宿膳食費和零用費等等。中國政府僅為出國學生提供一張緩期付款機票以及一點購買私人用品的津貼根本就不夠格稱得上是為交換項目提供了資助。中國政府那點少得可憐的津貼只夠交換開始之前的一點費用，與交換項目毫不相干。真正的交換項目不是開始於學生出去購買

個人用品，也不是開始於學生在北京登上飛機，而是開始於他向美國學校裡外國學生顧問報到之時。因此，為了「支持交換學者在此項目中的活動」所需的費用才是非提供不可的。

二、專業清單：一九八四年七月十二日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規定了一份詳盡的專業清單，上面列舉了各類學科。雖然國會的本意只是規定出那些確屬急需的學科，然而中國列出的這一清單所包括的專業如此廣泛以致不論中國是否急需的所有學科盡在其中。許多學生回國後根本無法就他們所學專業進行研究，因為中國還根本沒有這一類的研究項目。

我的一個當事人是J-1持有者正在攻讀博士學位，專業是超導實用物理。中國目前在這一領域裡尚無重大研究課題。中國院校也無計劃發展超導物理學。在中國院校工作的教授都是政府雇員，並且是固定的，也沒有私人企業來吸引教授們走向新的工作。教授們還健在，那些在國外拿到了博士學位的留學生，連個空位子都找不到。在中國工作機會尚且還談不上更談什麼急需？這一學科根本就不應該列在清單上。我的另一位當事人是個教師，她在中國是教英語的。她用私人的錢在西海岸的一所大學讀書。現在她居然也在清單之上，儘管中國教英語的大學比比皆是。像英語這樣普通的學科也在清單上實在毫無道理。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提供的清單，新聞總署全盤接受，而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否真的全都急需或者真的缺乏這些學科的相關人材，甚至對這份清單的合法性都從未慎重考慮過。中國最需要的是工程技術人員而不是高科技理論研究人員。

如果國會的本意是為給第三世界國家提供它們所需要的特別技能人才羅列這種清單的話，那麼這個好意已經遭到了損害，因為中國一

方面缺乏使用這些技能的能力，另一方面又濫列清單至使一切學科皆包羅其中。

規定清楚地指明：在這張專業清單列出之前就已經獲得J—1簽證的學生不受此單的約束。該單公佈之日爲一九八四年七月十二日，然而在此之前來美的學生在收到新聞總署自一九八五年以來所發的續延IAP—66通知時仍被該署核定屬清單所列範圍之內。

三、政府的錯誤解釋：大多數J—1學生都抱怨他們申請簽證時根本就不准他們面見美國領事官員，政府說日後將派人到他們的所在地發放政府的資助，而實際上無人會收到這種資助。許多學生被告知他們只能持J—1出國學習，根本就不知道還有另一種選擇——F—1。美國的院校也未向這些學生解釋過還有其它的选择。

美國領館在世界上任何其它地方都不允許約見申請簽證者由中間人包辦。領事館通常需要與申請人面談或者與申請人直接聯繫，以便確認其簽證申請的真實性。

如果學生們事先知道拿了這張延期付款的飛機票和名義上的旅費津貼就必須受回國兩年的限制，他們當中的大多數將不情願接受此安排而轉向其它途徑，例如向朋友借貸。

四、困難：根據規定有些學生是具備合法基礎來申請由於困難而免除兩年歸國限制的。新聞總署很不情願爲中國學生提供此一豁免，也不考慮他們已與美國公民通婚並有美國出生的孩子這一事實。有充分證據表明，針對從中國來的J—1學生申請兩年豁免，存在着嚴重的歧視。許多從緬甸、菲律賓、南韓、黎巴嫩來的學生甚至提出困難的理由是由於缺乏現代的生活水準也照例能獲得兩年豁免，而對於中國學生則標準要嚴苛得多。這與正常程序和第

五、第十四修正案的「同等保護」條款都是相違背的。

我們的一個當事人去年在美國生了第二個孩子。詢問中國政府如果他回國將如何處置他這個在美國出生的第二胎，因爲中國實行一胎化政策。回答是如果帶着這第二個孩子回國，他將在工資待遇方面受到處罰，孩子將無食品配給，無醫療福利，無住房及教育優惠。這個人在美國沒有親戚可以托付來照料這個孩子。然而新聞總署認爲這不構成困難，因爲這個家庭既然決定要第二胎，他們自己就該對多生孩子的後果負責。然而，他們忘記了受罪的不是父母，而是這個在美國出生的孩子。最近，有些J—1學生基於害怕由於多生所帶來的政治迫害而成功地申請到了豁免。中華人民共和國甚至強迫女性接受手術如果她拒絕人流的話。

五、有些學生傾向於回國後再來美國繼續從事他們的研究。隨後他們才發現拿不到出境證離開中國，因爲中國內沒有，中國外也沒有旅行自由。有些學生留下身爲美國公民的配偶及兒女回國兩年，却得不到再次出來的許可。

結 論

根據上述情況，我認爲國會提出解決方案表明國會的態度將有助於解開這一糾結。方案應包括下述方式：

一、國會就政府提供給學生的資助確立一個最低限度的百分比。在交流項目的全過程中政府所提供的資助按理應該至少占此項目全部費用的廿五%。

二、國會對「交流項目」給予明確定義。交流項目始於學生登上國有飛機飛向美國之時

，還是開始於學生真正向有關院校註冊之時？

三、國會澄清其意圖說明爲何要將清單適用於早於清單問世以前就已經到達美國的學生。

四、如果交換學生所學並非其祖國所急需，或者該國還不能爲此提供像樣的工作條件，那麼這個學生就應該從「專業清單」中除去。

五、所有的院校只要是招收外國學生的都在入學許可通知中寫明有F—1和J—1兩種選擇，美國領事和美國校方應向J—1學生講明他們須受歸國兩年的限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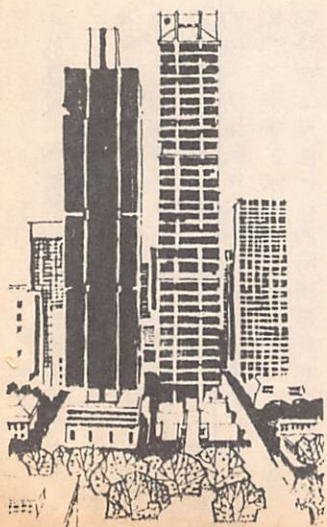
六、國會明確「困難」一詞的定義，最起碼包括在美國生孩子或者與一個需要支撐的美國公民結婚。

我以尊敬的心情向您呈請這一要求，請您考慮促成國會達成對此事的解決方案以表明國會的態度，如果使規則進一步完善與此信相符，與法律精神相符的話，國會則應該有所表示。

特此敬呈

愛德華C·Y·劉

一九八八年九月一日



冷眼對熱潮

——兼談胡秋原大陸之行

「乘槎浮於海」，我移居新大陸已數年，身居海外，心懷祖國，無時或已。對於台獨份子的自絕於中華民族，不以爲然；而對於那些盲目聽信中共統戰，掀起或追逐大陸熱潮的現

象，又心以爲憂。我固然亟想在有生之年能見到中國的統一與強大，能落葉歸根回到自己生長的故園。但豺狼當道，豈能輕易冒此大險？當我與虎口餘生的大陸殘餘親友取得了聯繫，除了爲境況極慘的幾家斷續匯去一點小額款項略表心意之外，內心欲訴的真情實話多有保留。他們也曾來信頻催歸期，我都以婉轉的藉口謝却，「目前還不是適當時候」。看到海外和台灣許多朋友紛紛前往大陸探親訪友，心頭何嘗不爲之波動？幾經冷靜思量，我還是止步不前。實在我太信不過中共了，不管他們怎樣甜言蜜語，喬粧打扮，我都把它當作陽謀或陰謀。前科累累嘛。「一國兩制」，這使我想起中共「建國」前的「新民主主義」。當年中共用新民主主義團結「四個朋友」（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一旦得了政權，相繼就搞「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革命」，用「無產階級專政」代替了「人民民主專政」，把「四個朋友」踩在腳底下，甚至對爲中共奪取政權作出巨大貢獻的大陸民主黨派也當作專政對象（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等多人至今沉冤未雪）。周鯨文先生的「我爲歷史作證」一書對此有血淚的控訴（周先生曾任大陸「民盟」中央副秘書長），我就不必多說了。這正像一個偷雞賊在未得手之前，不惜撒下一把把米糧加以引誘，等到鷄一入籠，就隨意宰殺，還說「我們是共存共榮」。

這是我青年時期的親自見聞，終生難忘；同時，某些中共黨員（包括毛、林、江在內）及民主人士的有關中共本性、策略的著作，也加深了我對中共的認識。我之懷疑中共，否定中共，是無可動搖的，極端「頑固」的。正如許多先進所指出：對中共不能光聽他們講什麼，主要的應看他們做什麼。

抗戰勝利後，重慶各界組織一個延安訪問團；團員中有一位是新民報總編輯趙超構先生，他曾就此行寫了一本「延安訪問歸來」。書中關於中共製造的「勞動模範」，字面上稱之爲「功利主義」；實則暗示讀者那是十足的愚民政策加奴隸主義。對延安的思想政治教育，趙先生明白地指出，共產黨搞的是文化專制主義，他們堅持除了馬列主義，世界上沒有別的真理。中共不但自己把馬列主義奉爲全人類唯一的真理，排斥一切思想、文化、學術，還要把別人強制改造成他們一樣。趙先生此說，對當時猶是學生的我不啻上了深刻的一課，迄今四十餘年依然清新如昨。不幸趙先生自己在中共當權後却未曾記住他對中共的印象，而受盡了凌辱迫害。

胡秋原先生的某些著作和他在台創辦的中華雜誌，是我長期喜愛的讀物之一。一九五七年大陸知識份子在「鳴放」運動中的鏗鏘發言，當時中共先爲「引蛇出洞」，後來又作爲「反右派鬥爭」的反面教材，曾在其黨報一公一開刊載。台灣將它們彙集出版成書，胡先生在「高興神往之餘」，爲此書寫了一篇萬言長序，內容十分精闢，且富文采感情，可與大陸知識份子的言論媲美。略引數行如下：

「知識份子所以爲知識份子，必愛真理、正義、自由。否則不會有知識，亦不成其爲知識份子。而共產黨者，除瘋狂權力外，六親不認的。」

「中共和毛澤東算得什麼東西呢？今天大陸知識份子及許多中共黨員斥其爲秦始皇。這自是客氣之言。他怎麼能比秦始皇呢？……毛澤東呢？這不過合朱溫、石敬瑭而爲一，靠地工、靠鼠偷狗竊狐媚以取天下；而更醜者，靠『一邊倒』以取天下的。這不過是以趙高之才

，為張弘範之役，而適贏贏政之位的。然其肆毒中國，又豈僅暴虐焚坑而已呢？」

從大陸知識份子的「右派」言論，「我們不僅知道共黨是一殘暴東西，而且是一無能東西。……今天大陸知識份子之反共，已不是共黨侮辱虐待屠殺知識份子問題，而是根本不容許共黨禍殃民問題。有了這一種自信，中國真有救了。」

「我不能詩，然讀奇文和危言讜論之後，高興神往之餘，勉成四句：『可笑纖貪兒天驕，豈知文士更嫵姚？一時右派真人傑，八表風流掃偽朝。』什麼風？那是中華民族泱泱之大風；那是自由民主浩浩之雄風；那是我空海陸三軍跨海騰空之長風、疾風；那是我父老兄弟姊妹死生契濶之後，重逢相抱、携手建國之慈祥愷悌之仁風、愛風……」

胡先生的宏論，進一步提高了我的思想。三十年來，我對中共一言行，時刻警惕，自勉勉人。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宣佈之後，有人感到興奮緊張，認為中共浪子回頭了，大陸人民解放了。我不以為然。告訴這些朋友，中共此一公報，比「文革」的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固然「右」得多；但仍不如一九五六年的中共「八大」決議和一九五七年「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那樣理性。「八大」決議聲稱要將人同人的鬭爭轉向人同自然界的鬭爭，即停止階級鬭爭的破壞，轉向社會主義民主建設，以改善人民生活。但他們做了一點嗎？根本沒有。「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後來中共自己承認是「陽謀」，更不用提了。從中共的過去可以看見它的現在和未來。對其「三中全會」公報，也不能輕信。果然，十年過去了，中共對其「三中全會」公報做到多少？不是十分昭昭嗎？

最近從報上看到胡秋原先生挾中華民國資深立法委員的頭銜作大陸之行；他竟是懷着跟中共談論中國統一問題而去的。這使我感到過份突兀了。如果胡先生是抱着「入虎穴」的目的前去，就值得欽佩；但從胡先生作權威狀的言論來看，不能不令人失望與惋惜。

首先胡先生將兩岸的不能統一，竟和「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絕對對立」拉上關係，劃上等號，這是遠離常識的不通。誰也知道，台灣實行的是中國自己的三民主義，而非西方的資本主義；中共在大陸實行的是地道的馬列主義，而非真正的社會主義。甚至在胡先生的著作中，也從未認為中共是社會主義者。除了前面所引胡先生的幾行序文外，他又於一九七四年在另一書的序文中（胡先生似乎喜愛為人作序）如此說：「列寧和史達林對中國輸出革命，在中國建立了中國共產黨。中共效法俄共，在中國從事奪權或革命。黨內亦有權力鬭爭。……這說明共黨只是一群權力動物，他們一切為了權力，特殊的權力；不僅不對人民負責，而且只以人民為名，壓迫人民。……他們既無能力治國，也未嘗想到治國。這說明馬列主義引於中國，只能造成這種權力動物以人民為芻狗的權力鬭爭。」

胡先生的意思已經夠明白了，一群只以人民為芻狗的權力動物，他們是社會主義者嗎？儘管現在中共猶說他們搞的是「中國式的社會主義」，以分別於俄共；又說「社會主義初階」；但是他們却牢牢地抱着「四個堅持」不放，雷打不動。可見中共仍然是胡先生前此所說的那個樣子的政權。只有細枝末節的修修補補，而無根本的改變。照樣是一群「以人民為芻狗的權力動物」。

按照馬列主義建立的共黨政權（無論中共

或俄共），他們賴以維持自己特殊權力，統治人民的，主要是兩把刀子：一把是社會主義所有制，即生產資料公有制；另一把是無產階級專政，即共產黨專政。「四個堅持」歸納起來，不過就是這兩把刀子。正是這樣，十年來他們進行的改革，進行的四化建設，完全是為了緩和大陸社會的矛盾，麻痺大陸人民的反抗情緒，歸結是為維持自己的特權統治。因而決不放棄生產資料公有制（個體經濟只是社會主義所有制的補助），決不實行「第五個現代化」的民主政治。換句話說，中共的改革仍不是「對人民負責」。在這個事實前，我懷疑胡先生跟李先念有共同的語言（雖然二人是鄂東的同鄉）。除非胡先生也像郭沫若那樣公開承認自己以往的著作都是沒有價值的廢物，這又另當別論了。

胡先生這次在大陸還強調：四十年來，大陸已進入核子俱樂部，有能力成為強國。這充份說明了胡先生已經沒有什麼民權、民生觀念，而只有希特勒式和毛澤東式的英雄主義了。但大陸之有核武器，除了為中共在國際上「爭光」外，畢竟對中國人民有害無益。中國大陸人民是付出了無數人命代價（僅「大躍進」時期就餓死了幾千萬）和長期挨窮受苦的代價換來的。當年蘇聯第一個人造衛星上天的時候，一個共青團投書黨報：「衛星上天是不錯，可我却缺衣少食，還欠了債。衛星對我有什麼用？」想來大陸人民對中共的核武器必有同感；因為他們都不是自願「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而是在專政鞭子下被迫犧牲的。如果胡先生光只着眼於中共，而不着眼於大陸上的父老兄弟姊妹們，那就不必說了。不過三十年前胡先生批評中共「不僅是一殘暴東西，而且是一無能東西」的話，也是空話了。

看來看去，至少當中共仍在牢牢抱着「四個堅持」之際，去寄望中共行仁政，實無異與虎謀皮，他們並沒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嘛。中共所猴急的「統一」，無非是吃掉台灣的另一說法。他們目前一副溫良恭儉讓的面孔，對前去大陸探親、訪問、旅遊的海外和台灣同胞，包括胡秋原等等在內，表現得那樣親切、熱烈、和善，正是由於有台灣存在的緣故，正是由於台灣富裕、堅強的緣故。很難想像，一旦台灣被中共「統一」了，吃掉了，胡先生還能再次得到中共好臉色嗎？只希望不要落得多年

前的中共「四個朋友」那樣的看待就不錯了。前幾年，蘇聯反共作家，古拉格群島作者索忍尼琴對台灣各界講：「你們中國人幸而有一個台灣存在。台灣是中國人的希望。」言下不勝懇切羨慕之至。我們有幸在台灣過了多少年安寧日子的人，千萬不要自暴自棄啊！千萬要珍惜啊！

在中國，無論在大陸或在台灣，胡秋原先生是個受到議論的政治人物。有「政治神童」之稱，二十出頭就當了陳銘樞福建人民政府的部長。不滿三旬又做了國民參政員。此後又作

了一輩子的立法委員。至於何時由反國民黨一變而為國民黨員則不甚悉。數十年來不甘寂寞。儘管如此，我是把他當作文化人物而欣賞他的（抱歉的是沒有像某些朋友那樣親造胡府，執弟子禮，請他作序），而避開他那政治人物的一面。沒料到胡先生臨到晚年又出了這麼一手政治奇招，竟忘了他自己曾說過什麼，表示過什麼。此舉關係二千萬台灣人民的禍福，關係到大陸十億人民的希望與絕望，能不慎重而重之嗎？

一九八八年九月廿日

鄧之友

美國的特點：容納與容忍

中國在毛澤東統治下的約三十年間所出版的攻擊、辱罵、歪曲和誹謗美國的書、刊、文章的數量大概要壓倒世界其他各地在這一方面所出版的總量。

生活在毛統治下的每一個中國人，包括不懂事的學童及目不識丁的農村老嫗都得不三不四地罵幾聲美帝國主義，儘管他們並不知曉美帝國主義為何物。

共產黨員不必說，就是最開明的人士，如

費孝通和李沛甘（即巴金）也都曾在艾奇遜白皮書討論會上列舉美帝罪行，嚴加聲討。美帝真可謂臭矣。

本文想簡單談一下美國。但 開放政策，對美國的了解，我們知道，美國並不像共產黨宣傳的那麼糟糕。

美國的特點，即美國與其他任何國家明顯不同之處，是什麼呢？美國的特點是兩「容」，在物質領域內的容納與在精神領域內的容

美國的好運就在於：物質的東西不少，精神的東西也未見缺乏。為什麼？因為它能容納

打開一部美國通史就可以看到美國是由世界各地的人奔向美洲大陸而創立起來的國家。它從一開始就是一個開門國家，而且隨着時間的推進，這個門也愈開愈大。

在所有生產力中，人是最可貴的生產力。美國恰巧有意或無意地吸收了各種各樣的人。從形體來說，有黑白黃棕；從意識形態來說，

有真正的九流百家。如果把毛澤東的「查三代」拿到美國來，肯定會使人笑痛肚子。但仔細一想，美國人恐怕最不怕查三代，因為查到最後，人們會發現百分之九十九的美國人祖宗都是赤手空拳的開拓者。

不錯，美國憲法規定總統必須是土生土長的美國人，但在其他崗位上是沒有這種限制的。華盛頓總統的財政部長亞力山大·漢密爾頓就不是土生土長的；傑弗遜總統的財政部長艾伯特·加來廷是一位瑞士移民。這說的是較古的；就當代而言，曾任國務卿的亨利·基辛格是德國移民，曾任國家安全顧問的布熱津斯基是波蘭移民，德拉瓦州的副州長吳仙標是中國移民。至於第二代以下的移民已成爲當然的美國人，其出任要職者就不可勝數，譬如說，今天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杜卡基斯就是一位希臘移民後裔。

以上說的是政界，至於商界和科技文化界，就更不用說了。紐約的商業主要操在猶太人和意大利人手中，夏威夷是日本人的勢力，加利福尼亞有一股不小的華人勢力，韓國人佔領了全美的蔬菜市場，連剛到美國不久的越南難民，也東一塊西一塊地佔了不少地盤。雖然美國老在叫嚷驅逐墨西哥偷入境者，但加州、德州等地的西語民族却有增無已。

說到科技，美國更有意識地搶奪人才。它從希特勒德國連哄帶綁，招了一批火箭專家。它毫無顧慮地培養了楊振寧等四名華裔諾貝爾獎金獲得者。

反過來看看蘇聯，它決不會去使用（更說不上培養）一名非自己人來擔任國家科技機密工作，中共更無此雅量。這是因爲共產黨本身帶有很大派性（它自己美其名曰階級性），因此，連自己人也不信任。蘇聯所以要迫害薩哈

羅夫，中共所以要迫害馬寅初，甚至包括一些無辜的小知識份子。

說到勞工，美國的吸收集量更驚人。有一個時期，波蘭等東歐人和意大利等南歐人幾乎充塞了美國的鋼鐵業和紡織工業。在十九世紀中葉，華工會充塞築路業。這兒要說句公道話，當時的反華工勢力決不是資本家，而恰巧是共產黨所稱道的「階級弟兄」美國本土工人。正是這些工人反華最起勁，因爲他們認爲華工搶走了他們的飯碗，壓低了他們的工資。「階級感情」原來如此。

還有一個突出的黑奴問題。當奴隸當然是悲慘的、不人道的。但這個問題也要從比較角度來看，即橫的比較和縱的比較。橫的比是把美國國土內的黑奴與非洲森林內的黑人相比，何者爲落後，何者爲先進。歷史的評價標準是生產力而不是慈悲心腸，美國總統安德魯·傑弗遜爲美國黑人建立了利比里亞，但黑人願前往者寥寥無幾。以後又有人提倡黑人遷非，但根本行不通，因爲黑人（不論是奴隸還是解放了的奴隸）不願離先進的美國前往自由的非洲。

中共宣傳家最喜歡宣傳美國黑人的悲慘遭遇，並以大好人的姿態出現，抱怨美國黑人的地位改進太少太慢，恨不得黑人馬上趕上白人的地位。但我們要問中共，中國西北地區和西藏地區的農牧民生活悲苦，你們爲什麼不馬上把他們提高到上海人和北京人的生活水平？中共自己不是說這要考慮歷史因素嗎？很對，就應該考慮歷史因素。就歷史而言，應當承認美國黑人地位改進並不慢。筆者就居住在黑人區，可以看出，黑人的生活水平要比北京中國科學院的研究員的生活水平高得多。

在今天正在進行的奧運會上，美國黑人

選手大出風頭。筆者在電視屏上看到獲女子七項運動金牌的傑基·克西，站在領獎台上，看到美國國旗上升，她不禁熱淚橫流。但中共宣傳家却另有說法。他們看到美國黑人不得意時，說這是受資本家統治之迫害。看到美國人出風頭時，又說資產階級故意培養二、三個黑人貴族以作欺騙。中共宣傳家總是有理。

除了人的容納，還有財的容納。所謂財主要指的是商品和資本。在美國可以買到世界上的任何產品。任何其他國家都沒有這種魄力。最近一、二十年來，美國開始大量吸收外國資本，其中最明顯的是日本資本。不少美國廠商已把工廠出售給日本資本家，或者與日商聯營。美國不但怕外資入侵，而且歡迎外資入侵，豈不怪哉。

再其次要談制度的容納。共產黨一貫自稱對社會主義擁有專利。只有它的社會主義是真的，其他任何社會主義都是假的，老大房只此一家。但我們若擺脫共產黨這種理論霸權主義，而把對全社會有利的制度歸結爲社會主義措施。那麼，我們可以說，從法蘭克林·羅斯福總統起，美國已開始容納社會主義了，第二次大戰後，具有國家社會主義性質的措施大爲擴大，如醫療保險、老年保險、小學生免費午餐等等。

這兒不妨插句題外話。英國的免費醫療制和科威特阿拉伯國家的醫療和大學制，都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措施。當老百姓確實受益時，你却斥之爲虛偽，豈不可笑。我們主張老百姓福利第一，而不是「是否符合馬列定義」第一。現在來談美國的第二個特點：容忍。容忍是精神領域內的事，是人的品質和品格問題。最好的制度也要靠人來執行。法治的最後決定權也仍然是這些個或那些個人。所以，人的品

質總是佔第一位的。

本來中國在幾千年前就有百家爭鳴，百家爭鳴就是容忍的表示。遺憾的是，後來的君王焚書坑儒，徹底破壞了言論自由，並使其「永世不得翻身」。直到五四時代，言論自由才能有翻身的跡象，但僅曇花一現，緊接着的是蔣介石和毛澤東的個人大獨裁，不容異己，消滅異己，其用心之險惡，手段之毒辣，達到了登峰造極，中國真正地成了魯迅先生所悲嘆的無聲的中國。

共產黨會說：美國的言論自由是虛偽的，當你發表危及它政權的言論時，它就不給你自由了。

假定此話是真（其實此話並不是真），我們仍然要倒喝一聲：朋友，在你們那裡，連發表不危及你們政權言論的自由也沒有啊！胡風的言論一點也沒有危及你們的政權，就關押了三十多年，把他逼成精神病。馬寅初的言論一點也沒有危及你們的政權，馬上被撤職挨批。所謂言論自由當然是指反政府和反官吏的言論自由。離開這一條而去談言論自由豈不成了無的放矢。這是判斷一個國家是不是有言論自由的主要標準。毛澤東把言論自由定義為同一階級、同一立場和同一意見的範圍內的言論自由，很少有比這一定義更荒唐的定義了。

言論自由的典型代表該推法國的伏爾泰，他說，「我反對你，但我更要用我的生命來保衛你發表反對我的言論的自由。」美國的開國元勳之一托馬斯·傑弗遜繼承了這種觀點，傑弗遜當總統時曾備受反對派的各式攻擊，包括惡毒的人身攻擊，傑弗遜內心是很痛苦的，但他決定容忍，決不採取任何法律或行政的反擊措施。

傑弗遜對美國的言論自由樹立了一個良好

的榜樣。美國至今是一個言論十分自由的國家。毛派理論家說，美國的電台電視報紙等等都操縱在資本家手中，窮人沒有發表意見的自由。這句話似是而非。我們完全承認，窮人不能獲得報紙或電台來發表意見，但這不是一個沒有言論自由的問題，而只是一個意見的傳播受限制的問題。如果他願意，窮人可以到海德公園（任何街頭的代名詞）去發表反政府言論，不會因此被抓或被批。很可能他只有二、三個聽眾，甚至沒有聽眾，關鍵是他可以講話，沒有恐懼。這是華盛頓與莫斯科的根本差異，是區別有沒有言論自由的主要標準：這標準簡單而言可以叫做 FREEDOM FROM FEAR。在斯大林面前，沒有一個中共官員敢說一個不字，但他們却說美國的言論自由是假的，真是滑天下之大稽矣。

再譬如說同性戀，中國人聽了這個名詞就會起一身雞皮疙瘩。但在美國，同性戀可以公然過街，並可組織團體，保衛同性戀的利益。這一切都是容納。

世界上沒有完人，也沒有十全十美的制度，我們說容納容納好，決不是說它十全十美，只是說它利多於弊，而且是利大大地多於弊。容納和容忍使美國變成一個偉大和自由的國家。因為容納和容忍，人的行為空間大了，往往會產生一些副作用。這是一個令人痛苦的辯證法。只有上帝可以超脫這個辯證法，但宇宙間並不存在上帝。

傑弗遜的門徒詹姆斯·麥迪遜看到傑弗遜受到惡毒誹謗，心中也很難受，但他安慰傑弗遜說：言論自由與誹謗中傷是一個同生體，後者是前者的派生枝，但是是一個不可切除的派生枝，因為你如果切除該枝，主莖就必然要死亡。

自由的訣竅在於勇敢

—「中國大陸政治避難者協會啓事」

準備尋求、正在尋求或已經得到美國政府政治庇護的中國人，組織起來！
我們要能發揮更大的力量；我們要幫助自己和一切苦難中的同胞獲得自由；
我們要爭取世界民主人士的關注和支持，就只有組織起來！

在這個協會中，我們將：

- 交流有關政治庇護的經驗；
- 提供政治庇護必要的資料和知識；
- 爭取各界同情人士的聲援；
- 加強與專業律師的接觸和聯繫；
- 動員新聞界的支持和輿論的力量。 翻譯中英文文件。

一年來，本會曾幫助某些人士獲得了政治庇護，我們具有成功和失敗的經驗
打算尋求政治庇護的人士，請與我們聯絡，我們將為你提供諮詢服務。

追求自由的大陸人士，請加入我們的組織，團結就是力量，未來將屬於勇敢而自由的靈魂！（首次來信請付諮詢費 \$ 20 元）

通訊處：Chinese Political Refugee Association 聯繫人：王思蜀（會長） 葉常華（理事）
Box 99 Private Mailbox Center 80:50 Baxter Ave. Elmhurst, N.Y. 11373
朱永祥（理事） 李連維（理事）
劉翔（理事） 閔仙儀 理事





第三集 靈光

人類已經進入太空時代。

那一批批率先登上月球的宇航員們，大約也是這個時代最得意的佼佼者。可是，他們幾乎都是歐羅巴人。

王贛駿博士是世界上第一位進入太空軌道的華人。他在航天飛機上七分鐘就掠過了神州大地。於是，他成爲炎黃子孫的驕傲。故土對他的迎接是何等隆重呵。

可能連中國人自己都快忘記了，將近五百年前，明朝有個叫萬虎的人，把自己綁在四十七支土火箭上，想飛上天去。他在一聲巨響中被炸得粉碎。應該說，那是同五百年後的「挑戰者一號」一樣悲壯的。難怪天文學家們要用萬虎的名字，給月球上的一座環形山命名。

公元一世紀前後，東西方有兩位大天文學家同時在世。羅馬帝國的托勒玫創立了他那偉大的地心說，而東方漢帝國的太史令張衡，製造了一台水運渾象，那簡直就是把托勒玫的地心說變成了模型。但是，渾天學說離地心說，畢竟還差一步。就這一步，中國人再沒能邁過去。

那會領先了上千年的中國文明之光，怎麼到十七世紀以後就暗淡下去了呢？一個如此聰明的民族，爲什麼會變得遲鈍和衰老起來？我們昨天曾經擁有，今天才發現失去了的，究竟是什麼呢？

文明的源頭已經湮沒在一片混沌之中。能讓我們記得起來的，是春秋晚期那個百家爭鳴的偉大時代。孔子、老子、墨子、莊子、韓非子等等，諸子百家，燦若群星。偏偏在那個時代裡，東西方都出現了聖賢大哲。

當孔子周游列國的時候，在喜馬拉雅山的那一邊，釋迦牟尼創立了佛教。

當齊宣王創辦稷下書院、匯集各派學者的時候，柏拉圖也在地中海的雅典辦了一個學院，亞里士多德就在那裡學習。

今天的哲學家稱那個時代是世界文化的軸心時代。那時產生的各種思想，至今還影響着人類。

公元六十五年，一個中國皇帝夢見了釋迦牟尼，這便引起了喜馬拉雅山兩側的人類兩大古老文明的相遇，導致了將近八個世紀的文化大融合。一位西方學者曾經這樣說過：人類的奇遇中最引人入勝的時候，可能就是希臘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國文明相遇的時候。

（洛陽龍門奉先寺盧舍那大佛）

這張豐腴秀美的臉龐、這雙奪人心魄的眼睛，這副雍容大度的氣派，使至今每個第一次

站到它面前的人，都會在霎那間被震撼。

這顆頂着螺旋髮髻的舉世聞名的巨大頭顱，而今幾乎成爲中國佛教藝術乃至東方文明的象徵。然而，據專家們考證，它的那隻鼻子是典型的古希臘雕法。遠隔重洋的東西方，就有如此異曲同工之妙。

盧舍那以君臨一切的氣度端坐在這裡，它是一座東方的雅典娜。它是一個當之無愧的峰巔。它那神秘的、若有所思的微笑，仿佛正是一個決不拒絕外來文化的民族在自信地微笑。這就是盛唐氣象。

（演播室。學者談盛唐文化精神）

葉朗（北京大學教授）：明代戲曲家湯顯祖稱唐代是「有情之天下」，這就是說，唐代社會有助於文化的發展，更適合人性的發展。李白如果不是生活在唐代，天才就得不到發揮。看一個民族的自信心、生命力和創造力的表現，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看它對外來文化的態度，是拒絕的，還是開放接受的……。

舉世無雙的盧舍那，永遠說不完道不盡的盧舍那，是我們的奇迹和驕傲，但是，今天當我們面對它的時候，是否認真地想過：是一種什麼樣的力量和精神造就了它的完美和博大？我們爲什麼再也造不出第二個來呢？

如果說，文學藝術是在唐朝達到高峰的，那麼中國的科學技術則是在宋代最成熟。尋找中國科技史的軌迹，往往會發現各項發明創造的主焦點都在宋代。

人類第一批炸藥的試驗場就是宋金交戰的中原大地。最遲在公元一千年左右，中國人已經能夠用弩炮來發射「炸藥」了，可萬萬沒有想到，同樣是中國人，八百年後竟會在洋人的

堅船利炮之下，一敗塗地。

公元七五一年，中國同阿拉伯的穆斯林在塔拉斯河大會戰。唐朝的慘敗使中國再也沒能回到中亞去。但這場戰爭却在科學史上意義重大。數萬被俘的唐朝人給阿拉伯人、西方人帶去了造紙技術。接着，活字印刷術、羅盤和火藥相繼從中國傳到中世紀黑暗的歐洲，在那裡石破天驚。中華民族智慧凝成的偉大發明，竟使歐洲封建社會贏得了繼希臘以來又一個技術發展高峰。正是因爲站到了這個高峰上，西方到十七世紀便把一直遙遙領先的中國，拋到後面去了。

然而，四大發明在它們的故鄉却是命運不濟。最早點燃了那征服星空的火焰的中國人，沒能成爲最早飛向宇宙的人。火箭和火炮幾百年一貫制，至今還只發揮着驅鬼避邪和熱鬧喜慶的功能。紙和印刷技術這種不可估量的通訊傳播手段，在史集浩翰、藏書成風的中國，一千年也沒能釀成知識「爆炸」，到頭來還是西方反過來向我們輸入了鉛印技術。儘管沈括早在公元十一世紀就在「夢溪筆談」裡描述了羅盤針和磁偏角現象，可中國從來沒能成爲海上強國，倒是西方列強依靠羅盤針的指引逼到了我們的家門口……到底是一種什麼力量如此捉弄中國人呢？

（演播室。學者談近代科學革命爲什麼沒有發生在中國）

劉青峰（中國科學院副研究員）：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發達，其實主要是技術發達。四大發明都是技術發明，而且不是一般的技術，是

和國家大一統有關，與封建地主經濟相適應的那種大一統型技術，如通訊、水利和軍事等。它給中國古代科學戴上了枷鎖，它很難實現轉移。另外，從文化角度看，中國古代的有機自然觀、直觀外推式的思維方法，還有一個倫理中心主義，可能都對中國古代科學有影響，這方面我們研究得還很不夠。

今天回想起來，十六、十七這兩個世紀，的確是令中國人十分心酸的二百年。西方人研究星辰、人體、杠桿和化學物質，中國人則研究書本、文字和故紙堆。因此胡適曾說道：中國的人文科學所創造的是更多的書本上的知識，而西方的自然科學，却創造了一個新世界。

於是，十七世紀以後，那個「新世界」要來叩一叩古老東方緊閉着的大門了。擺脫了中世紀蒙昧主義的基督教，以充滿活力的姿態，帶着一種全新的文明，從海上上來了。如果說，一千五百年前是中國皇帝主動去請印度高僧的話，如今的「西方高僧」却是不請自來的。

這位深目高鼻、滿臉胡須而又一身儒服打扮的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他在一五八二年來到中國，一六一〇年死於北京，墳墓至今還在北京。過去相當長一個時期裡，我們一直把他說成是「西方文化侵略的工具」。其實，既然中國歷史能夠給予支謙、鳩摩羅什那些印度傳教者以很高的地位，爲什麼就偏偏要歧視這位「西方高僧」呢？這恐怕正是因爲對這第二次外來文化的衝擊，中國已經沒有往日漢唐那樣的胸襟和氣度了。

（圓明園大水法那獵犬逐鹿的噴泉水霧）這裡曾經是清代的皇帝與后妃們最喜歡來玩的地方，這座舉世聞名的皇家公園是乾隆十

二年由意大利人郎世寧設計的。

皇上和娘娘也厭倦了東方式的亭台樓閣和皇苑中的假田園風光，願意到這兒來看看西洋景。中國的皇帝似乎也絕不會拒絕西方式的享樂的，這情形，頗像今天我們有些人雖然要批判西方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自己却絕不會拒絕受用那些超豪華轎車和高級消費品一樣。

糟糕就糟糕在清朝皇帝們還要用高大的石牆把這園起來，派手持大刀和梭標的八旗軍隊看護住他們的夢境。他們還要把國門也給鎖起來，把幾千里長的海岸綫和通商口岸也統統關閉，讓大刀、梭標、土炮和血肉之軀去抵擋隆隆駛來的鐵甲兵艦。

結果，夢毀了。

現代的中國人，常常很喜歡憑吊北京的兩處歷史遺迹：

他們中間一些人，總把長城視為強大和興盛的象徵，登上長城，就揚眉吐氣，天下也為之渺小；而來到圓明園這堆不堪入目的石頭殘骸面前，他們痛心，他們切齒，當然，他們也發憤，他們要雪耻。親愛的同胞，您思考過這兩處遺迹之間的因果聯繫嗎？

中國科學技術和文化靈光，能夠幫助西方創造了歷史的新紀元，為什麼來自異域的文化科學之光，在中國始終只是若隱若現呢？

中國正在思索。

青年們正在詰問歷史。

（古老悠久、文物繁盛的中原大地）

這塊土地的西南角上，長眠着中國歷史上三位彪炳史冊的傑出人物，他們身後的待遇却

是那樣懸殊，在中國歷史給予這三個人的尊崇和冷漠之間，仿佛就把歷史的奧秘展示給我們了。

（南陽城西臥龍崗上的武侯祠。殿宇亭台，雕梁畫棟，蒼松翠柏，碑刻題記，蔚為壯觀）

（南陽東關醫聖祠。張仲景那個「長沙太守」的頭銜，在墓碑上赫然冠於「醫聖」尊號之前）

三個人裡最為寒酸冷落的，要數南陽城北的張衡墓。張衡是一位世界級的大科學家，而且還是東漢屈指可數的大文豪之一，在當今國外的一些著名學府裡都有他的塑像，可是在他的祖國，到底不過是一個科技知識分子和作家的形象，引不起人們格外的敬重，死後有一堆黃土足矣——張衡墓至今仍寂寞地躺在南陽石橋鎮一方農田的角落裡，與他作伴的，只有莊稼和青草。要不是他曾經當過幾天太史令和尙書一類的御用文人官，恐怕連這堆埋骨頭的土丘，也未必能延挨到今天吧。

有誰見過一生布衣的大科學家祖冲之和宋應星的墓塚嗎？

二十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而今雖然終於免除了「臭老九」的厄運，身價仿佛比過去也高了些，但經濟上的窘迫寒酸和精神上的扭曲壓抑仍然伴隨着他們。他們英年早逝的噩耗不斷傳來，沉重的負擔正在把最優秀的中年知識分子一批批斷送掉。

更為可怕的是，在這個最尊崇孔子牌位的文明古國中，教師的地位竟淪落到非常卑賤的境地，老的一代已經蠟炬成灰，油燈將盡，新的一代却再也不肯去步他們的後塵。教育危

機成爲中國最緊迫的危機。一曲「神聖憂思錄」，使多少中小學教師和知識分子悄然淚下。

這些可以把閃閃爍爍的靈光變成太陽的人們，身單體薄，面容削瘦，在斗室中構想着人類文明的銀河系中那些必將屬於中國人的新的星座。

人類中沒有任何一種職業的人，比他們更需要自由的空氣與無限的空間。

如果給他們的精神插上一座黑色十字架，或者壓上一段灰色的長城，那麼，靈光將永遠不會變成太陽！

但願歷史不再捉弄中國的知識分子。這是我們今天深深的祝願！

第四集 新紀元

（大英博物館。馬克思一邊看書，一邊用腳在地上蹭着）

十九世紀中葉，當資本主義所召喚出來的大工業正在歐洲方興未艾之際，一個猶太人已經在大英博物館裡解剖它的秘密，宣告它的死亡了。

這位偉大的導師是很謹慎的。他只對未來勾畫了一個藍圖。他設想共產主義社會，應當是生產力高度發展，財富充分湧流，勞動不再是謀生的手段，勞動的消耗不再構成商品的價值，因此商品貨幣關係將退出歷史舞台。

一九一七年，阿芙樂爾號巡洋艦一聲炮響，便似乎宣告馬克思構想的這個未來社會已經在俄國出現。然而，當時俄國還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農業產值在國民總產值中高達百分之五十七點九，工業產值只有美國的百分之七。

於是，在十月革命前，普列漢諾夫就同列寧發生了一場激烈爭論。

這位被稱為「俄國馬克思主義之父」的普列漢諾夫，堅持馬克思關於歷史不能跳越其必要發展階段的思想，不主張過早奪取政權，認為對社會主義的急於求成，會使經濟遭到最慘重的失敗。

普列漢諾夫的懷疑，雖然被十月革命的勝利打得粉碎，然而，他向列寧的挑戰，却並沒有被歷史所淹沒。經濟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國家，不能跳越商品經濟發展階段而獲得成功，這個普列漢諾夫劃出的巨大問號，半個多世紀以來，始終纏繞着社會主義陣營。

鐵腕的斯大林，在三十年代靠着剝奪農民和壓低社會消費水平，強行高積累，竟使蘇聯工業獲得了令全世界瞠目結舌的飛速增長。反對他這種作法的布哈林，則被當作「人民公敵」而槍決。但是，「斯大林模式」也讓蘇聯付出了沉重代價，以致斯大林逝世後，蘇聯就吹響了改革的號角。

這股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這一天，終於把中國也推進了社會主義國家改革大潮之中。這個帶着滿身傷痕剛剛從動亂中爬起來的國家，這個還帶着幾千年傳統包袱的民族，在改革中將要解決的難題，比蘇聯和東歐各國都要複雜得多、艱難得多。

十年前，當我們終於打開封閉的籬牆重新回到世界上來的時候，在「窮過渡」的貧困和文化專制的寂寞中生活了很久的中國人，是多麼驚訝地發現：資本主義的西方和日本竟那樣發達，人們竟生活得那樣富裕！

或許正是這個強刺激，讓我們又揀起了一

個已經淡忘了多年的老話題：意味着巨大財富的工業文明，為什麼沒有在中國歷史上出現呢？

雄漢盛唐的光景不必去說它了，但即使到了一千年前文弱的趙宋王朝，中國的經濟特別是城市商業，也還是世界上最繁榮的。當北宋汴梁和南宋臨安已經是百萬人口的大都市的時候，歐洲最繁華的商業中心城市充其量也超不過十萬人。難怪威尼斯的商人馬可·波羅到了中國，竟會樂而忘返。

然而，讓馬可·波羅如此驚訝和羨慕的中國文明，此時已經在衰退之中了；歷史偏偏更鍾情於他那遠在地中海海岸的故鄉，那個剛剛從一個捕魚晒鹽的小村落發展起來的威尼斯。這是一個沒有農業的國家，它甚至算不上是一個國家，而是一個沒有領域的城市，一個商人共和國。它的政府就是一個股份公司，首領就是總經理，參議院就是董事會，所有威尼斯人都是股票所有者。於是，它成爲資本主義文明最早的發源地。

當明朝實行閉關鎖國、太平洋西岸一片寂寞的時候，從地中海沿岸孕育起來的世界商業大革命，正向西洋、印度洋、太平洋移動。歐洲逐漸由中世紀的蒙昧野蠻，走向世界中心舞台。海洋文明在這天賜良機的歷史關頭，毫不遲疑地發揮出它那開拓、擴張的內在活力和文明優勢。

（東印度公司的鴉片船。虎門硝煙。荒蕪的大沽炮台）

世界既然已經變成一個統一的市場，中國就逃脫不了捲入世界商品流通範圍的命運了。工業先進的西方是決不肯放過如此巨大的一個

商品傾銷地、投資場所和原料產地的。因此，在十五世紀末地理大發現以前，中西方的衝突還沒有發生的時候，中國已經失去了一次發展資本主義的千載良機。資本主義就再也無法從中國內部產生，而是從海外來欺負中國了。

自古以來中國經濟就具有一條自己的發展道路，其中一個明顯的特點，就是能夠養育衆多而稠密的人口。一八〇〇年，當西方到處掠奪海外殖民地時候，中國這塊土地正養育着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有的學者並不認爲中國文明沒有產生工業化就是一種「失敗的文明」。他們很欣賞這種農業文明的低水平的田園牧歌情調。

（貧瘠的黃土高原。破爛的窑洞。呆滯而菜色的臉）

然而問題在於，這種文明是怎樣養活着中國人的。直到一九八〇年，在距蘭州市僅四十公里的一個公社裡，人均口糧只有四十斤到一百斤；三分之二的農民，家中土炕上沒有炕席，平均三個人擁有一床爛棉絮；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冬天沒有棉衣。

一位陝北的老農告訴我們，去年由於干旱而小麥減產，青黃不接的時候他們只能靠土豆度日。一輩子過着這樣的窮日子，他竟選生了三個兒子四個女兒，如今已經有了十幾個孫子和外孫。

由於人口的與日俱增，更由於「人是世間第一寶貴的」、「人多力量大」等等顯然不明智的說法，使稀缺的土地變得愈加珍貴，使多種資源變得更加緊缺。相形之下，壯健的筋肉多於貧脊的土地，嗷嗷待哺的生命反而變得輕賤。時至今日，人口負擔成爲中國一切難題中的最大難題。它造成的惡果，不知道要讓多少

代中國人去咀嚼？

在廣大的落後農村，中國農民素質中普遍存在着創業衝動微弱、風險承受能力很低、依賴思想和聽天由命觀念濃厚等等問題。難怪有的學者感嘆道：面對這樣的人的素質，不要說政策上還有諸多限制，就是大經濟學家凱恩斯活轉過來，又能奈之若何？不是資源的匱乏，不是產值的高低，也不是速度的快慢。人的素質差，才是所謂「落後」概念的本質。而人口素質的下降，恰恰又是由於人口數量的猛增造成的。這真是一種惡性循環的農業文明。我們還有什麼理由要贊賞它和迷戀它呢？

這種並不美妙的田園牧歌情調，有時還會爆發出令人難以置信的熱昏病。在那顛狂的大躍進年代，「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產」的神話，把北方的小麥吹到畝產七千多斤，把南方的水稻吹到畝產五萬多斤，上至寫過「實踐論」的偉大領袖，下至科學家 and 一向講究實際的中國農民，居然都會相信這種神話。在九六〇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也居然家家都砸了鍋，關了門，幾億人都到公共食堂吃大鍋飯，似乎共產主義就這樣來了。這個從經濟「烏托邦」走向政治危機，最終導致社會大動亂的歷史悲劇，難道不正是一種農業文明的必然結局嗎？

睜開眼看看我們民族在這個星球上的處境吧！世界銀行的年度報告顯示出來這樣一些數字：中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在一百二十八個國家中，總是徘徊在倒數第二十位前後，同索馬里、坦桑尼亞這些非洲窮國作伴。中國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出口商品結構、教育衛生投資，還不及亞洲四小龍。一九六〇年的

時候，中國國民生產總值和日本相當，到一九八五年只佔日本的五分之一；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在一九六〇年時超過中國四六〇〇億美元，到一九八五年竟超出了三六八〇〇億美元！我們總以為我們還在長進，殊不知人家的長進比我們快得多！這種差距如果按現在的比率發展下去，有人作了一個很可怕的比喻：再過五、六十年，中國將重現鴉片戰爭時的狀況——外國人擁有洋槍洋炮，中國人只有大刀長矛。難怪有人要大聲疾呼：弄不好，中國將被開除球籍！

這片浩瀚的西太平洋，近百年來會不斷地給我們這個大陸送來恥辱和苦難，而今天，它那波詭雲譎的洋面上，却仿佛湧動着強烈吸引我們的巨大財富。日本正在向美國和亞洲四小龍提出調整經濟結構的建議。西太平洋正在成為世界經濟的新舞台。命運正在把又一次千載難逢的機會賜予我們。沉默了幾百年的沿海地區，這條中國人的黃金海岸，帶着久被壓抑的飢渴，率先衝向太平洋。

中國人此刻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急於走進世界市場。但是，這個民族畢竟被封鎖得太久了，它對於商品經濟的海洋，是那樣的陌生；而它參與國際間競爭的實力，又是那樣的單薄。世界產業結構大調整的時機，也許是轉瞬即逝的，我們已經來遲了，並且準備得也是那樣匆忙和不成熟。

我們今天終於懂得了要去搞外向型經濟，可我們擁有的唯一優勢，只剩下廉價的勞動力，這種勞動密集型的低技術加工產業，是難以構成持久的競爭勢頭的。

我們今天也終於懂得了要去參加「國際大

循環」，可是我們在盯着人家的市場的時候，却又捂着自已的市場，總擔心「肥水外流」，似乎忘記了人家肯來投資，無非也是看中了我們的市場。要讓中國走進世界，同時就要讓世界走進中國，否則，我們將再一次坐失良機！如今，發展中國家都一門心思去賺發達國家的錢，但是，當他們還不具備一個像樣的國內市場的時候，這個國家的經濟常常是畸型的。

北京一個公共汽車司機的月收入大約是一百五十元，而一個出租汽車司機的月收入可以高出五、六倍甚至十幾倍；在一家著名的腫瘤醫院裡，任何一位醫生的收入，都超不過門口賣烤白薯的老太太。「開腦顱的不如剃腦袋的」，「彈鋼琴的不如搬鋼琴的」，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收入倒掛，「先天下之憂而憂」的人「後天下之富而富」，這一切不公平的根源，乃是社會缺少機會平等的競爭機制，缺少一個共同的度量衡——市場。只有發育健康的市場，才能把機會、平等、競爭這三者掛起鉤來，而這，恰恰是我們這個具有最古老的文明的民族所最不熟悉的東西。

當競爭沒有以機會平等為前提的時候，看起來是符合商品經濟規律的價格放開，反而會造成經濟活動的紊亂和失調；舊體制與新體制的摩擦，也抵消着雙方的積極因素；官僚主義、封建主義和以權謀私種種弊端，反而彷彿找到了一個共同的「度量衡」，統統通過物價反映到社會上來。在一個平均主義傳統深厚的國度裡，物價的失控，又必然導致人民情緒的恐慌，甚至發生社會震盪。倘若我們因此而失去了大多數人對經濟改革的支持，中國將重新陷入停滯。八百年前的王安石、九十年前的譚嗣

同，他們的遺恨是多麼深重呵！

（演播室。學者談經濟改革）

厲以寧（北京大學教授）：我曾經說過，經濟改革的失敗可能是由於價格改革的失敗，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必須取決於所有制改革的成功。所有制改革要解決一個關鍵問題，就是我們頭腦中的公有制，是一個傳統的公有制，要由傳統的公有制改變為新的公有制。商品經濟是一個自然發育過程。它形成市場後，國家所調節的市場就是一個完善的市場，這樣的話，所有制改革和市場的發展是結合在一起的，黃河流域的經濟就有希望。

一個曾經創造了人類最成熟最燦爛的農業文明的偉大民族，一個恰恰因為這種農業文明過於爛熟而顯得步履維艱的古老民族，當它站在工業文明的門檻上時，有時竟會顯得像孩子一樣幼稚、慌亂和不知所措。但這不要緊，只要終於邁到了這個門檻上，下決心邁進去，這個民族就能重獲青春！

大陸電視紀錄片「河殤」

全國讚好、王震說不行

中共停映禁止影帶出口

中共高級「領導」指責電視紀錄片「河殤」詆毀中國人民後，中共八日採取行動限制這部引起爭議的紀錄片的發行播映。

中共國家副主席王震上週在中共中央委員會的開幕會議中發表談話時，猛烈抨擊分成六集播出的「河殤」。中共國營的「中央電視台」在今夏播出這部紀錄片兩次，引起全國稱賞和激烈辯論。

這部紀錄片指責中國未能及早向西方開放門戶，造成中國文明趨於沒落，也使發源於黃河流域的中國文化陷於目前的危機。接近這部紀錄片製作人的消息人士說，中共海關八日已開始禁止這部紀錄片的錄影帶出口，或者在中國大陸各省發行播映。

「寧夏日報」說，王震九月二十七日在當地演講時，表示「河殤」把我們偉大的中華民族和我們的黃河描繪得毫無優點。

他說：「我認為，這部影片是在詛咒黃河和長城，詆毀我們偉大的中華民族。」

消息人士說，屬於保守派的王震一直在遊說一些年紀較大的中共領導人，包括鄧小平，敦促他們與他合作取締「河殤」。

據悉，王震最近在另一個場合中說：「我鬪爭了這麼多年才能治理國家，可是我現在却碰到這一幫教授和研究者，我這輩子還沒有這麼生氣過。知識分子很危險。」王震出身農家，參加過中共的長征，也是鄧小平最親近的夥伴。

王震的談話已在中共作家、藝術家和學者之間引起恐慌，他們之中有許多人曾在去年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遭受尖銳批評。

中共人士說，王震的談話可能顯示中共即

將對作家和思想家展開新的鎮壓，以阻止他們向馬克思主義挑戰，或者把有關中國歷史和文化的辯論推向中共限制的範圍以外。

中共禁演「河殤」的行為在留學生中引起強烈反響。柏克萊加州大學愛華社於十七日公佈對「河殤」影片進行意見調查的結果，顯示該片獲得近乎全面的支持，留學生對於河殤被禁出口感到強烈不滿，並對日後回中國大陸的前途產生嚴重的憂慮。

愛華社是由加州大學一群中國大陸留學生所組成，該社於十五、十六日放映電視紀錄片「河殤」並進行意見調查，獲得一百多位同學的迴響。其中百分之九十九的留學生認為該片為「作者態度積極、認真、嚴肅，立論科學，論據有說服力」，百分之九十七認為作者創作動機是「從歷史和文化的角度揭露現存體制中的弊端根源所在，從而找到振興中華的根本途徑」，百分之九十六的人在看了之後，感到「震驚，但同意承認民族落後的現實，大家一道尋找途徑，使中華民族在世界舞台上重放光彩」。

對於中共國家副主席王震猛烈抨擊這部廣泛引起討論的影集，以致「河殤」被禁映及停止上市，百分之八十三的人認為「反映了中國民主與法治制度不健全」，百分之十七認為「領導人可以這樣講，但最好不要用行政手段來禁演」，而幾乎無人認為這種做法「及時粉碎一小撮教授和研究者反黨反人民的陰謀」。同時，對於王震所言「知識分子是危險的」，高達百分之九十九的人認為「聽了以後對回國的前途感到憂慮」，而若此言屬實，百分之九十三點八的人認為「他不適於繼續做國家領導人」。

「河殤」

三思錄

呼延民

一思：現實憂患的悲涼濃縮

「河殤」電視片集，既不是華夏歷史的羅列，更不是電影蒙太奇藝術的探索。它是檄文，是宣言。它為行將沒落的第二次浪潮的陸權農業文明送葬，它為無可阻擋的第三次浪潮的海權工業文明催生。它莊重宣告：如中國社會不能送死迎生，那麼大洪水就在明天！

看表面，它陳述的是周期動亂歷朝興衰：黃勝炎、周克殷、秦滅楚；實質上，畫龍點睛的是現實社會的深刻危機。

它列舉數字證明，最近二十五年來中國在繼續大躍退，被日本拉下了五倍，被美國拉下了八倍之遙。它悲憤於中國總是陷於「新舊王朝」循環的周而復始的命運之中。它感慨超穩定的大統一幽靈依然在神州大地遊蕩，「封建主義、官僚主義、特權思想、腐敗現象的古老社會頑症」，「頗有些像黃河每年帶來的泥沙，在一天天地淤高下游河道，漸漸積累危機」。因而，它大聲疾呼：

中國將被開除球籍了！

「腐敗的制度所導致的必然失敗，並不能靠技術來挽回」，因而「中國的許多事情，似乎都必須從『五四』重新開始」，開始「科學與民主的雙重歷史大合唱」。

牛耕和文革的鏡頭疊在一起，畫外音播出王秋赦「運動來了」的喊聲。

——既然有人把國家的一切功勞歸於自己，那麼他自然也就無法卸脫使祖國淪為世界乞丐的歷史罪責。能說「河殤」不是現實憂患的濃縮嗎？中國向何處去？這一切「誰之罪」？文化界問過天（太陽與人），問過地（黃土地）在反污和反自由化後，天籟無聲地吼沉寂。現在大河自問自答了。

但「河殤」的基調是悲涼的。

莊子說過，凡人死了，要「鼓盆而歌」。夭折或死於外者曰「殤」，屈原悼念為楚國而犧牲的勇士，寫過「國殤」，氣勢是雄壯的。

「河殤」是祭奠那些為黃河（華夏）文明而獻身殉難的志士們的。既是達觀送死，喜極迎生，悲從何來，涼又何故？

其一，過時的騎士和超前的英雄，兩者都是悲劇，然而後者在於「壯」而前者在於「涼」。在中國，狂熱的前者多而清醒的後者寡。困於條件限制，「河殤」無力去頌後者（如「四·五」英雄、「北京之春」英雄、「八六學潮」英雄）而只能去鞭撻前者，是故「北風其涼」。

其二，棄舊和圖新，正如變異需以遺傳為基礎，兩者都有着揚棄的過程。本來是無所謂

「文化虛無主義」和「全盤西化」的帽子的。但又因「符號象徵」、「借文化打政治」，破舊唯恐乏力，述新又難以盡言，只得側重一面，就有了無窮的苦衷。悠久的歷史，燦爛的文化，忍痛蓋棺論定。於是在無可奈何的壯膽神色裡，總難免透着點阿炳二胡旋律似的淒婉。

其三，專制主義傳統是如此厚黑，同時「中國歷史沒有給中國人造就出一個中產階級來推動科學與民主的勝利」，「中國文化也沒有培養出公民意識」；唯一能澆灑黃土地的知識份子，又「很難有統一的經濟利益和獨立的政治主張，他們幾千年來都是一種附庸」，「他們也不可能成爲一個結實的社會實體，用鋼鐵一般的經濟實力對舊的社會進行武器的批判」——瞻念華夏前程，能不悲涼！悲涼之源，正來自於對邪惡的深沉恐懼。在高大綿互萬里的城牆前，作者們自信力是不足的。

「河殤」臨結尾，在批判專制主義話題中，峰迴路轉，忽然給觀眾留下了一個「有趣的故事」。故事涉及民主制度的討論。羅斯福問宋美齡，中國政府在戰爭期間如何處置罷工。宋美齡以一個優美的殺頭手勢作答。接着，電視就戛然而止。解說詞是：

專制政治的特點是神秘性、獨裁性、隨意性。

民主政治的特點應該是透明性、民意性、科學性。

真是警鐘長鳴。對此，不妨聯想一下八七年春天鄧小平在鎮壓學潮時的講話，聯想雅羅澤爾斯基（鄧的老師）是如何對待改革時期的波蘭團結工會的——雖則這本來可以用疊印的蒙太奇手法來處理的。

至此，「河殤」是怎樣來看待中國問題的癥結的，結論確實很清楚了。「誰之罪？」能

說「河殤」沒有指出摧殘中華的被告罪犯嗎？

二思：傳統文化的合理反思

在「第三帝國的興亡」的扉頁，作者寫道：希特勒是德國的「劫數」。也就是說，作為德意志民族災難的希特勒，自己却正是這個民族歷史邪惡面的產物。這很合黑格爾的「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這樣的光輝哲學命運。

難道中共的出現、掌權、統治蔓延長達四十年，不是中國社會歷史傳統文化的淵藪嗎？我們經常聽到一些達官貴人盛讚本國老百姓「善良」，以至於聽任他們作威作福魚肉愚弄，以至於生活在九天九地之下還忍辱負重，盼望着天子聖明清官再現！要是中國知識份子膝蓋沒有這樣軟，要是中國老百姓夠勇敢，恐怕不必抬出周恩來作擋箭牌，早在「四·五」之前就可以把當代秦始皇送上歷史的斷頭台了。

直到現在，還有原始部落沒有「單數第一人稱」。中國人之所以變成藍色的螞蟻群，就是因為在民族的人格上缺乏自我意識，只以統治階級的自我作為群的人格。沒有人性的再解放，沒有人的價值觀念的再認識，中華民族是無法振作並掀翻背上的專制主義大山的。對傳統文化進行揚棄從而根本上改變華夏的民族文化心態，正是從我們開始幾代人應從事的偉業。

我們從來只聽一些志士仁人告誡，說首要的問題是政治上的民主自由，一切從言論自由開始做起。但是，民主作為一種權利——把人當作人，首先在於這些人要懂得自己是「人」，才會去爭取人的權利。當一個民族已被壓扁，在人格上扭曲異化，只知以當奴隸為樂，甚至身為奴隸而不自知時，他們反而會「誓死捍衛」統治者的專制制度哩！

不必重提一八六一年沙皇「解放農奴」時

一些農奴的惶惑痛苦史實，只要回想一下文革，各派是如何捍衛紅太陽，牛欄裡的人們是如何互相批鬥揭發就可以說明問題。有一位著名的美國漢學家曾問我：「自然災害時期，全村人外出討飯，是否覺得恥辱？」我的回答是：「他們麻木了」。因此，中國人過去才愛喊萬歲，創作「東方紅」，盼望「大救星」。其它污泥濁水更不必一一例舉了。

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有什麼樣的階級就有什麼樣的黨，正像有順民才會暴君一樣。其實，不必說農民，連知識份子中也有佼佼者（且不論周谷城、周培源之流的文丐政娼以及海外的某些幫閒文人），從來就存着焦大的忠誠，當右派幾十年，還在唸叨「娘打兒子不怪」哩！當你看到「河殤」中特寫的叩頭跪拜，人群的一張張痴癡的臉，張大的嘴，難道不對人的素質感到揪心嗎？

一定的權利是一定的經濟及與之相應的文化的產物。為了追求人民的民主權利，尋「根」溯源，對華夏文明全面反思，是更深層次的批判。

近半個世紀來中國人民的血淚史，正是中國傳統文化積澱的惡性發作史。「河殤」沒有直指四項基本原則實際上它是作為災難的必然前提被省略了而已。退一萬步而言，假如民族文化心態不改觀，那麼去掉一個專制政黨，中國社會的土壤一定會讓女媧再為本民族捏一個供着。冠以「民主」的黨派在這樣的社會中是會腐爛變化的，以甲黨的專制換乙黨的專制，難道不正是封建社會的改朝換代嗎！

批判文化傳統，決不是捨難求易，也不是「曲綫救國」，是歷史的必須，完全合理的。

三思：放和收的啓迪

最近，「河殤」被下令禁映了。「河殤」

的始放終收，正是中國十年改革的縮影，反映了中共進退維谷的處境。

近年來，中共套在四項原則的框架內摸着石頭過河，因而使所謂的「改革」，如走鋼絲，如扭秧歌。執政的共產黨的自我異化這種世界範圍的歷史趨勢，正如「河殤」解說詞所說的，像「一柄達摩克利斯之劍，高懸在……頭上，……却不知道它什麼時候會落下來！」，中共的異化，有兩種前途。「惡異化」；就是沿着公僕轉為主人的斜坡滑下去，最終變為中世紀的教會，變為阻礙社會生產力的腐朽勢力，在長期維持政權的殊死階級鬥爭運動中，使整個中國社會腐爛。這是中共保守派和所謂改革派都力圖規避的噩夢。另一途「良異化」，就是丟棄四項原則，作出資本主義道路的選擇，自身則和平演變為社會民主黨。這正是中共部份明智者和國內一批上層知識份子夢寐以求的結局。（四千萬黨員中，不乏真誠的改革者，他們想做的事業，是超越王安石、譚嗣同的）。

這條避免社會大動亂的和平道路，按「河殤」中厲以寧的設想，就是培植中產階級，改變所有制，形成經濟的實體力量獨立成份。有了經濟實力和獨立階級的憑托，就會產生新的政治承擔者，中國知識份子才能真正挺直腰桿子。所以「河殤」解說詞才說「比知識份子更有現實力量的，或許是這些相貌平平、談吐也不驚人的新型企業家們」。甚至在這些小商店的老板們中間，在這些急急忙忙趕路的生意人中間，在這些離開土地四處攬活的農民中間，正在積聚的新的社會能量與衝動。一言以蔽之，「河殤」寄希望於中國出現強大的資產階級，這是作者們開給華夏民族的治「河」良策。

從七八年三中全會到八六年學潮，中共改革派在自身危急時，就像光緒召喚維新派一樣，借用過人民的力量。經改遇到瓶頸，就只好搞政改；政改翻了車，就「借文化打政治」。需知，八六年夏開始席捲中國的「文化熱」正是應改革擱淺之運而生的，是朝野兩種力量的同路。現在，趙紫陽要深化改革，要使中國投入「國際大循環」，自然歡迎一本「改革ABC」式的啓蒙普及讀物，於是「河殤」就放出來了。

但是，中國文化界之活躍，已不是黨官們完全控制得住的。思想家和文藝家們會「因勢利導」尋機反映本階層的自我觀念。這就難免要吐出半句真話，就必定會打到要害處，造成主政者開始所未料及的社會反響。於是乎，「河殤」就收起來了。但是，至少「海洋文明」已作為「資本主義」的借代，在憲法修改四原則之前就「開放」給十億人民，使之能明火執杖招搖過市，功也就不朽。

這又使我想起中國文化界流傳的一個笑話：審查「芙蓉鎮」樣片時，「喬木同志打了個盹」，所以開了綠燈。現在，老漢們的瞌睡醒了，所以「河殤」的紅燈亮了。

時上，在社會改革的收放進退之際，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結構、信仰危機的泥沙大量沉積，各因素支流的洪水正湧向出海口。三、五年內，如處置失妥或因天災人禍使之隨機同步，就會演出「黃河」的特大洪峰。

中國老百姓從今春開始已有了大災變的預感（如上海老年市民所說的「聽到了四九年圍城時的砲聲」），他們已有了中共被取代的心理準備。此時，「河殤」公演，撥動了民族魂。於是，某些頭頭就如熱鍋上的螞蟻，惶惶不可終日了：大洪水要來了，怎麼辦？

被塗黑的飛機殘骸

凌英

中國民航CA30一客機於八月卅一日在香港啓德機場跑道附近墜海失事。六名機員及一名乘客不幸溺海喪生。

翌日，客機殘骸却出現了一個耐人尋味的怪現象。機身上所有標誌，包括五星紅旗及「中國民航」四個大字均莫明其妙地被人用漆油塗黑。中國民航發言人表示這是中國政府對空難事件「一貫的作法」。香港民航則拒絕置評。究竟中國政府此一作法，用意何在，頗令世人費解猜測。中國人有「家醜不外揚」的面子問題。可是在這種情形下，中國民航要藏醜遮羞，能做得到嗎？其實空難一發生，消息不脛而走，再加上現代新聞媒介驚人的傳播速度，人們很快地會瞭解到空難的真相，不用說要弄清究竟是那家航空公司的飛機出事。中國政府異想天開，藏醜遮羞，不是多此一舉嗎？

失事第二天，人們一早起來從電視螢屏上看不到飛機殘骸任何標誌。只見機身上遠遠近近是一塊塊半新不舊、不方不整的黑漆痕跡，黑鴉鴉的一片，實在很不雅觀，難以入目。看起來這倒很像當年紅衛兵到處亂塗、亂畫、亂貼的感覺，使整個事件無形中籠罩了更神奇、更恐怖的氣氛。中國政府的這種作法弄巧成拙，實在是幼稚可笑之至。近年來，世界民航史上不知經歷了多少次大大小小的空難事件，看起來這樣的處理方法還是前所未聞的吧。

香港民航處在此事件中顯然在九七年的壓

力下，屈服於中共的強求，違反了國際空難慣例。在空難專家到場調查之前，隨便讓中國民航人員擅自搬動及處置失事飛機殘骸，這實在是一個不明智，理應受到批評的作法。

中共建黨建國之後，爲了屢次政治上鬭爭的需要，經常肆意塗改具有歷史性的照片，篡改及歪曲歷史事實。由這事件中顯然看出這「一貫」的作風，時至今日仍是盛興不衰的。不難想像，假如此次失事不發生在香港，而發生在中國內地的話，中國政府一定也會使出其「掩蓋事實，封鎖新聞」的「慣技」。可惜香港此時此地仍未屬中國政府所有——起碼目前離九七年仍有一段時日，故中國政府還不敢明目張膽，爲所欲爲地干涉香港的自由新聞。但它又不甘心看到災情，五星紅旗及機身上任何標誌在資本主義世界的新聞媒介的注目報導下，屢次裸現於人們眼界裡。認爲這樣會大大地損害其「偉大完整」的形象。所以，在這種心態之下才傳出了這種空前絕後的怪聞吧。

寄言中國政府當局，以後若此類事件再次發生，最好還是把 DAVID COPPERFIELD 那位擅長隱形而聞名世界的美國魔術大師請來。只要他使出其隱形絕招，不是可以把整個失事飛機殘骸一股腦兒從人們眼界裡搬走，而消失起來了。這樣做不是更爲乾淨、徹底嗎？堂堂一個大國，唆使小嘍囉偷偷摸摸的作法未免是太見不得人的雕蟲小技吧。

略論中國傳統文化

達海



一個社會要進步，沒有批評家是不行的。柏楊在他的著述中例舉了中國人的種種陋習，促使我們檢討自己，是件好事。柏楊指出中國人懶、髒、亂、愛說假話、大話、空話、毒話，會促使中國人向勤、淨、實轉變，注意只說真話、好話。柏楊指出中國人不團結、殘忍，同樣有助於中國人完善自己。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柏楊的文章引起那麼多人深思，對社會的貢獻是不容置疑的。

一、衣食與榮譽

中國人的確醜陋。但我認為，中國人之醜陋，與中國人的血統和文化傳統都沒有多少關係。中國人的醜陋，是中國經濟和文化教育落後，尤其是經濟落後的反映。一國的經濟發達程度，自然資源、水陸交通都是重要的決定因素。但是最重要的因素，是國民的質量。戰後的日本，滿街乞丐和娼妓，垃圾桶裡的食物也有人搶。那時的日本人，可謂醜陋。這是日本的民族性嗎？當然不是，這是日本人一時被經濟條件逼得醜陋了。日本是有戰前發展的基礎的，國民素質比較高。所以，日本的經濟復興

有必然性，「醜陋的日本人」隨之消失也有必然性。

真的，無論是在現時世界上還是在歷史上的經濟。宋代是中國經濟繁榮的時期。「水滸」裡描寫宋江來到潯陽樓，見「門邊朱紅華表柱上兩面白粉牌，各有五個大字，寫道『世間無比酒，天下有名樓』」，便上樓來「走到靠江一座閣子裡坐了，憑欄舉目，喝采不已」。酒保「一手托盤上樓來，一樽『藍橋風月』美酒，擺下菜蔬時新果品醇酒，再幾盤肥羊、嫩鷄、醜鵝、精肉，盡使朱紅盤碟」。宋江的風度雅趣，看來不是與他同代的歐洲騎士可以相比的。他也沒顯出和懶、髒、亂有什麼瓜葛。武大郎不過是賣炊餅的市民，武松來了，他也能「打點一間房」給武松住。我在大陸時，我家和鄰居十多口人共用一個小廚房，生爐子燒飯，總是烟火薰天，髒、亂就不用說了，燒飯燒得精疲力盡的，誰又能不懶？有什麼辦法呢！憑父母的微薄工資若去館子吃上一只醜鵝，全家大約要兩、三個月揭不開鍋了。管子說：「衣食足而知榮譽」，講的正是經濟狀況與精神面貌相輔相成的關係。窮苦人養家糊口已是

很辛苦了，對他們的言行舉止，人們不應再求全責備。

二、中西傳統之比較

現在不少中國人，動輒講中國的「五千年文化」怎樣害人。他們看到今天的中國人醜陋，便以為中國人一向醜陋，並抱着這個成見從「傳統文化」裡找根源。中國的傳統文化裡當然有弊病。可是，如果要證明這些弊病是中國人今天醜陋的根源，我們總要看看西方的傳統文化是否優越些吧？這種比較，否定中國傳統文化的人作得太少了。

柏楊曾以中國史書上對統治者的神化，來說明中國文化有毒。確實，中國史書上，未來的皇帝好幾位都是天龍托夢而生的。夏朝的皇帝，活到一百幾十歲的多得是。孤立地看，這確實迷信、愚昧、落後。現在，我們且看看西方文化。「聖經·創世紀」第廿五章說：「亞伯拉罕享天壽，在高齡一百七十五歲的時候死了。他的兒子以撒和以實瑪利把他埋葬……以實瑪利死的時候一百三十七歲」。「聖經」講到耶穌降世時，又有天使托夢，又有天父呼喚

。這些，是不是「毒文化」呢？不要忘記，「史記」已經沒有幾個中國人讀了。中國人讀的「論語」，是一位「不語怪力亂神」的老夫子之作。而「聖經」則仍擺滿了西方的每間教堂。

不少中國人，尤其是大陸中國人，認為中國的文化太殘忍，缺乏人道主義精神。其實，孔子的「仁者愛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和「有教無類」，如何不是人道主義？相比之下，「聖經」上說的將禮拜天幹活的人用亂石擊死，將埃及人的孩子殺盡才不人道。羅馬教堂燒死了那麼多異教徒，直到十七世紀還燒，又何談人道！中國的小脚、宦官固然不人道，美國人將黑奴打上烙印、戴上枷鎖販運，難道人道嗎？

西方的人道主義有兩種。基督猶太教的人道主義，以前只對教徒適用，近幾百年來才擴大到非教徒。文藝復興時期出現的非宗教的人道主義，其歷史也不到一千年。大陸人談的人道主義，屬於這後一種。他們應當了解的是，這種人道主義既不是西方文化固有的一部份，也從沒在西方文化中占據過主導地位。

中國文化傳統中的弊病，西方文化傳統中幾乎都有對應。卡里古拉皇帝荒淫無度，經院學者沒有創造性，中世紀的城堡閉關自守，威尼斯商人勾心鬭角，如此等等。中國五千年的文化既然不比西方幾千年的文化落後，又比誰落後呢？

西方的崛起，只是近幾百年的事情。其先進的東西，在我看，主要是科學技術和民主政治制度，也就是「五四」時所說的「賽先生」和「德先生」。在倫理上，中國的孔子完全可以和基督教匹敵，談不上誰先進，誰落後。現代科學技術，從哥白尼的日心說算起至今有四

百多年，從牛頓的微積分算起至今是三百年。蒸汽機引起了工業革命，而瓦特發明蒸汽機不過是二百年前的事。現代民主政治，發源於盧梭、洛克、孟德斯鳩等人的思想和美、法等國的實踐。這些思想和實踐，也不過是二百年前的事。二、三百年前，西方總的說來並不比中國強。古希臘的民主大概是唯一的例外，但古希臘的民主只有有地位的人才能參與，和現代民主並不是一回事。由二百年的落後推出五千年的落後，認為祖先落後了還不能自覺，這種觀點，是十分荒唐的。

大陸有一種流行的說法，叫「清除封建殘餘」。中國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壞東西不少，清除一下是好事。但大陸清除封建殘餘，却犯了兩個毛病。第一個毛病，是把「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等好的傳統也清除了。第二個毛病，是對先人不公，把什麼壞事都往中國歷史的帳上記。比如，中共若不廢除中國的考試制度，大陸封官許願的風氣就不會這麼壞。分房走後門，本來是中共共產共出來的，也被戴上了「封建」的帽子。

三、決定論和不可預知論

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有毒的人，大體是這樣論證的：中國落後了，所以中國的傳統文化有毒；中國傳統文化中這些東西不好，所以一定是這些東西造成了中國的落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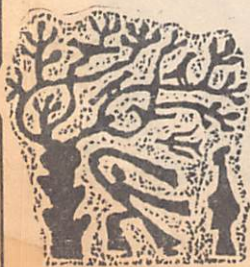
這個論證的錯誤之一，如前面已經講到的，是沒有將中國的毒與西方的毒作比較分析。作了比較分析後，我們就會發現，我們並沒有能力看出中西文化傳統的優劣。這個論證的錯誤之二，是假定了人類歷史是按決定論發展的，有果必有因。

西羅馬滅亡後，西方文明衰敗得很厲害。李淵父子創建大唐時，歐洲人過的是半野蠻生活。相信決定論的人若是生在那個時候，一定要說中國的三千七百年文化如何比歐洲文化優越了。現在看來，那時的人這樣說，顯然是倒果為因了。然而，今天說中國五千年的文化有毒，又何嘗不是倒果為因呢！

我們看不出中西在文化傳統上有優劣之分，就表明歷史的發展有隨機性，是不可能準確預測的。至少，人類還不知道怎樣去準確預測。有隨機性，並不是不可思議的怪事。量子力學和統計物理學表明，連原子、分子表現都是有隨機性的。說歷史的發展有隨機性，因而並不違反科學。這是其一。其二，相信決定論會使人喪失主動性。中共宣傳唯物史觀，真正的動機，是要使老百姓相信共產主義是命中注定的。所以，決定論是麻醉人民的鴉片；除非有明證，我們不要去相信它。

四、結論

中國人需要改變柏楊觀察到的種種陋習，也需要放開眼界，科學地、歷史地、全面地看問題，保持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自強不息，一個民族才有希望。



「苦戀」的作者白樺在加州演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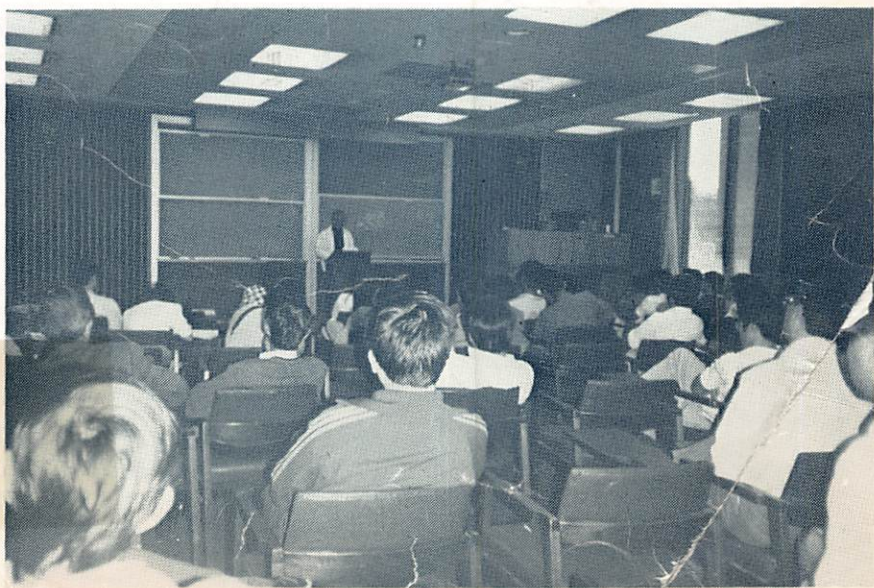


自古以來，中國詩人、作家的命運多乖舛，如屈原投水，李白自殺，魯迅早逝。但中國人注重文學作家的程度，却是世界之冠。中國文學對中國人民的影響，遠超於世界上任何國家。

中國人崇拜書，所以自古以來的皇帝都怕文字。因為書上的文字是金科玉律，毛澤東最瞭解這一點，因此他出的書也最多，人手一冊。

現代的作家對中國的現狀只敢談遠因，不敢談近因，因此使中國文學受到極端的限制，他認為中國文學未來的出路，是知識分子打破沉默，發出正義之聲。

任何一個偉大的作家，都是堅守自由主義者。他們的自由並非身體的自由，而是心靈的自由，即使在監獄裡也能寫出不朽的文章。



中國民聯聯絡站遍佈全球

紐約總部、編輯部信箱改爲：

P.O. BOX 701400 TRAINSMEADOW STATION
FLUSHING, NY 11370-9998

港澳聯絡站：

香港九龍旺角
郵政信箱 79047

日本聯絡站：

日本東京都小金井市郵便局
46 號信箱

澳洲墨爾本聯絡站：

G.P.O. BOX 376 F
MELBOURNE, VIC 3001
AUSTRALIA

歐洲巴黎聯絡站：

B.P. 169
77315 MARNE LA VALLEE
CEDEX 2 FRANCE

歐洲西德聯絡站：

POSTFACH 1725
8050 FREISING
WEST GERMANY

歐洲荷蘭聯絡站：

DEVELSTEIN 518
1102 AK BIJLMER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加拿大蒙特利爾聯絡站：

P.O. BOX 574 STATION B
MONTREAL, QUEBEC
CANADA H3B 3K3

加拿大溫哥華聯絡站：

P.O. BOX 94052
RICHMOND B.C.
CANADA V6Y 2X2

美國舊金山聯絡站：

P.O. BOX 146446
SAN FRANCISCO,
CA 94114-6446

美國洛杉磯聯絡站：

P.O. BOX 565
MONTEREY PARK
CA 91754

美國華盛頓聯絡站：

P.O. BOX 4558
ARLINGTON, VA 22204

美國休斯頓聯絡站：

P.O. BOX 710784
HOUSTON, TX 77271

美國夏威夷聯絡站：

P.O. BOX 8718
HONOLULU, HI 96815

美國肯塔基州聯絡站：

3385-OTTER CREEK DR
LEXINGTON, KY 40502

美國內布拉斯加州聯絡站：

P.O. BOX 80082
LINCOLN, NE 68501

美國路易斯安那州聯絡站：

P.O. BOX 19427
BATON ROUGE, LA 70893

美國西雅圖聯絡站：

P.O. BOX 95802
SEATTLE, WA 98145-2802

美國芝加哥聯絡站：

P.O. BOX 16061
CHICAGO, IL 60616-0061

美國匹茲堡聯絡站：

P.O. BOX 7122
PITTSBURGH,
PA 15213

■主 辦：中國民主團結聯盟

(CHINESE ALLIANCE FOR DEMOCRACY)

■編 輯：中國之春雜誌編輯部

NY 11370-9998

■通訊處：(美洲) BOX 701400 TRAINSMEADOW STATION, FLUSHING,

(香港) 香港九龍深水埔基隆街 236 號閣樓後座

(日本) 東京都小金井市郵便局 46 號信箱

(歐洲) ALLIANCE CHINOISE POUR LA DEMOCRATIE

B.P. 169 77315 MARNE LA VALLEE CEDEX 2, FRANCE

(澳洲) G.P.O. BOX 376F MELBOURNE (3001) AUSTRALIA

■電 話：(美洲) (718) 429-6777; (718) 507-4739 『香港』 3-872506

■零售價：(美) 2.50 美元 (加) 3.00 加幣 (港) 10.00 港幣

SECOND CLASS
POSTAGE PAID
FLUSHING N.Y.
ISSN 0735-8237

POSTMASTER: Please send address change to CHINA SPRING 67-17 Woodside Ave. Woodside, NY 11377